最后的文化挽歌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连载目录
- 车辐：“他是不可救药的老天真”
- 车辐小传
- 自学成才做记者
- 宣传抗日画漫画
- 随缘自适度浩劫
- 善吃懂吃写美食
- 陈志华：残损的乡土建筑在呻吟
- 关于乡土研究：我们和叫花子住一起(1)
- 关于乡土研究：我们和叫花子住一起(2)
- 关于建筑保护：中国旅游是竭泽而渔
- 关于历史问题：下放时我能挑240斤
- 关于社会文化：风水妨碍了真正的科学
- 来新夏：我们扫地那些年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
- 来新夏小传
- 辅仁求学
- 南方都市报：其他老师呢？
- 研究北洋军阀史
- “文革”受难
- 难友穆旦
- 申泮文：不违心，怀斗志，明朗倔强应万事
- 申泮文小传
- 投笔从戎，参军抗日
- 西南联大恢复学籍
- 押送西南联大公物北归
- 援建山西大学化学系
- 南开名人旧事
- 杨敬年：扎根大陆，决不漂洋过海
- 杨敬年小传
- 放弃从政

- 牛津岁月
- 何陈之争
- 老骥伏枥
-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1)
-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2)
-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3)
-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4)
-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5)
-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6)
-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7)
-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1)
-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2)
-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3)
-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4)
-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5)
-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6)
-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7)
- 方平：搞翻译要像袭人那样一心一意
- 诗人岳父邵洵美(1)
- 诗人岳父邵洵美(2)
- 莎翁精神在心中(1)
- 莎翁精神在心中(2)
-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1)
-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2)
-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3)
-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4)
-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5)
-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6)
-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7)
-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8)
-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9)
- 何满子：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 何满子小传
- 抗战前后(1)
- 抗战前后(2)
- “胡风事件”

- 出版工作
- “右派”生涯
-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1)
-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2)
-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3)
-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4)
-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5)
- 黄永年：做学问不赶时髦写文章要补空白
- 黄永年小传
- 师从学者吕思勉
- 缘系童书业千金
- 潜心治学读好书(1)
- 潜心治学读好书(2)
- “败坏”书香门第，带出“卖艺人家”
- 黄宗江小传
- “败坏门风”学戏剧
- 大学生涯以爱为主
- 参加抗日剧团
- 离而未休于军中

连载目录

车辐
陈志华
来新夏
申泮文
杨敬年
范用
方成
方平
高莽
何满子
胡秀英
黄永年
黄宗江
黄宗英
贾植芳
金耀基
鲲西

车辐：“他是不可救药的老天真”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摄影：刘忠

特别感谢冉云飞先生提供支持

吴祖光说，他是“成都的土地爷”，在抗战年代为落难文化人找好吃的。

黄宗英说，他是“车大侠”，曾用自己祖上留下的坟地安葬早逝的演员。

流沙河说，他是“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含冤入狱11个月居然还长胖了。

车辐小传

车辐，1914年生，成都人。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文艺写作，职业记者。先后出任《星芒报》、《民声报》、《四川时报》、《人物杂志》、《华西晚报》等报刊记者、编辑。著有散文集《采访人生》、《川菜杂谈》、《车辐叙旧》、小说《锦城旧事》等。四川烹饪学会理事，人称“饮食菩萨”。

有一位台湾作家说，到了成都，不见车辐，就跟没有到过成都一样。我到成都，第一位采访的人物是车辐先生。

见车辐前，先见了和他同住一个大院的流沙河和冉云飞。流沙河先生也是我准备采访的人物，寒暄之后，马上说：“你一定要先采访车老。”旁边的冉云飞解释：“这是礼数。”当晚由冉云飞请吃四川火锅，听他大侃川菜之妙，“我所知不过车老的皮毛。”他说。酒酣耳热之时，冉云飞拨通了车辐的儿子车新民的电话，定下采访时间。冉去飞说：“车老现在身体不好，说话时要靠车新民在旁边翻译了。”

两天后的清早，我坐在车辐杂乱无章的书房里，几乎只能听懂他谈话的十之一二。请冉云飞翻译，也只能意会大半。后来不得不由车新民在旁一句一句地翻译。车辐说：“以前我口齿清楚，大家喜欢听我摆龙门阵，一桌子的人都听我讲话。”

车新民告诉我，几年前，老人家坐在一个小矮凳上，一不小心滑倒了，造成骨折。年事已高，骨质疏松，不能动手术，只能坐轮椅。现在，老人家每天7点就起床，看书报，写东西，午睡后又是阅读写作。只在天气好时，才到外面走动。

安坐家中，车辐念想的是各地的老朋友，写信甚勤。最近，他出版回忆性散文集《车辐叙旧》。谈起这本书，车辐拿出一封何满子来信的复印件送给我，信的大意说：“接奉大著《叙旧》，喜欢感谢之至。阁下一生，阅人之多，当代文人中实罕见。此篇确是现当代文艺界的绝好史料也。”

老人家还送了一张1993年他品尝“大千味苑”后写的字条，原来是回忆当日所食的菜单。他爱到外面品尝，也喜欢在家里请客。据唐振常说：车辐请客有一特点，每上一菜，举箸之先，他必详为讲解，自卖自夸，滔滔不绝，讲此菜之妙，讲他每每与众不同的烧法，边讲边吃，他自己吃得比客人多。郑拾风生前常说：“车辐请客，菜都是他自己吃了。”

2006年，从不做寿的车辐首次破例。原来，4月时黄宗江专程从北京到成都来看望车辐，闲聊时劝他：“岁数大了，你可以做一做寿嘛。”谈兴正浓的车辐随口答应，一旁的车新民听了，心中暗喜，当即顺水推舟。于是小规模邀请亲友，既庆祝车辐夫妇93岁寿辰，又纪念结婚73周年。车辐夫妇共有8个孩子，流沙河曾调侃：“他说他太太是航空母舰，上面停了8架飞机，却不说飞机是谁制造。”

采访结束时，老人家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给我看。摄影和收集照片是他的爱好之一。相册中有黄苗子、冯亦代、黄宗英、黄宗江、周海婴、方成、流沙河、马识途、盛中国。他还拿出一张和王明合影的老照片。第二天，我和洁尘等人喝茶，洁尘问我有没有看过车辐的相册。她说，以前车辐随身带一部相机，见了她们这些年轻女孩，必会看清人数，然后说相机里还剩几张胶卷：“别浪费，我和你们一人合影一张，拍完刚好拿去洗。”其实相机里往往刚装了胶卷。

自学成才做记者

车辐4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养育。7岁读私学，读《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声律启蒙》、《四书》等。车辐后来所读的大成学校号称“四川最后一家孔家店”，因看到同班同学的不规矩行为，说了出去，反被说是造谣，责令退学，回家大哭了一场。车辐回忆：“我亲身体会到的是：那时四川为封建军阀统治，他们横行霸道，杀人如草芥，欺压老百姓，刮地皮，奸淫估霸，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在彷徨中偶然读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从此与进步书刊结缘，并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旧社会的认识。”步入社会后，车辐从事新闻工作，“在旧社会吃新闻饭，先生敬业十分，成名绝非浪得。衣袋内揣一个小本本，遇到一鳞半爪，立刻记下，以备采访之用。为人又好事，喜交游，管他三教九流，一混就熟。所以出去采访，每每旗开得胜，短消息，长特写，莫不精彩可读。”（流沙河《车先生外传》）

南方都市报：你的母亲做菜好吗?

车辐：我们自己家的人做的菜都很好。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就很喜欢美食?

车辐：自己喜欢那几种家常菜。我的炒兔丁炒得挺好。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在成都读书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车辐：从《三字经》、《人之初》，一直读到《四书》读完。学校叫大成学校，把孔子当作圣人，后来我被学校辞退。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被辞退了?

车辐：大成学校把孔子当圣人，但是学校有男女关系，摸摸搞搞，我看不惯，说出来了。学校就说我乱说，败坏大成名誉。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10多岁，初中二年级，我回家哭了。以后就完全自学。

南方都市报：自学都读了什么书?

车辐：什么书都读，鸳鸯蝴蝶派等等。邹韬奋编的《生活》有很大的作用。以后我念马列的书，念不懂，硬读，当成一种宗教信仰。那时候封建社会、军阀社会、袍哥社会，我看不惯。很多人打麻将，我也看不惯。我不抽大烟，不打麻将。

南方都市报：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

车辐：在《西南新闻》当记者，很短的时间。我在报馆出来以后，认识了社会上很多文化方面的朋友，遇到一些好人，很幸运，兴趣相投。经常读邹韬奋的《生活》、林语堂的《论语》，后来就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后和几个朋友办了文艺刊物《四川风景》，后来这些杂志都寄到延安去了。我当了中华全国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理事。

南方都市报：你20岁就结婚了?

车辐：当时社会风气是早婚。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你已经是“追星族”，采访白杨是在游泳池旁边?

车辐：我在游泳，谢添带着白杨介绍给我，我穿的游泳裤向下滑了，他指着我。这个事情给他们印象很深。我现在活到93岁，跟年轻时锻炼身体分不开，包括游泳。

南方都市报：白杨那时候是不是很红?

车辐：当然很红，全国都红，到大后方当然更红了。我们是“追星族”，他们文化人到成都来，还是地下党领导的。

南方都市报：有人写文章说，你以前参加新闻发布会，都要坐第一排，因为招待的糕点很好吃?

车辐：我那时候做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华西晚报》，不赶风头。从来就没有坐过第一排，糕点我吃多了，干吗要吃他们那个糕点呢?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都把这个传闻当真了。

车辐：那是人家乱写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当记者主要是做社会新闻?

车辐：我也写杂文、散文，在陈白尘的《华西晚报》发表，讽刺当局。当然倒霉。

南方都市报：陈白尘的风度如何?

车辐：很平易近人，是做大事的。我和他是亦师亦友，他夫人现在都跟我有书信联系。

南方都市报：陈白尘是范用的老师。

车辐：是的。我跟陈白尘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和范用也成了好朋友。

宣传抗日画漫画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来到后方成都。车辐结识了刘开渠、谢无量、丁聪、吴祖光等人，朋友中有作家、报人、画家、演员，后来多半成名，数十年后，他们到了成都，必来看车辐。吴祖光说车辐是“成都的土地爷”。到成都的文化人找车辐，总有好吃的。有电影演员死在成都，找不到地方安葬，车辐主动用自己祖上留下的坟地帮助安葬。车辐和朋友把王朝闻化妆一番后，送到延安。车辐积极参加了自发的民间抗日美术团体四川漫画社的活动，画了一批抗日漫画，其中有著名的《不可告人的悲哀》。他回忆：“四川漫画社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利用成都的各大报纸，配合抗日文字，在引导抗日民众的情绪、鼓舞军队的士气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南方都市报：抗战时很多文化人来成都，没饭吃，就找你?

车辐：他们在当地没有熟人，他们来了，我就给他们找好吃的。那时候两个演员去世以后，我把我家的祖坟腾出来，埋葬他们。这个事情我忘了，后来陈白尘提起来，我才想起来了。陈白尘到成都来，讲了这个事，在座的人都觉得很惊讶。所以黄宗英叫我“车辐大侠”，他们都叫“大侠”，其实不是什么侠，都是朋友。

南方都市报：你还画漫画，那时候漫画在抗战当中影响很大?

车辐：成都人很迷漫画的。画展一出来，效果很好，还到成都周边县城的地方去办展览，讲演。我跟进步的文化人泡茶馆，丁聪、吴祖光、陈白尘。一些老朋友现在还健在，像丁聪、方成、钟灵。钟灵到成都来，头一天要打电话，我准备好吃的。我到北京，白杨、黄宗英、吴祖光他们请吃饭。

南方都市报：抗战时你跟李劼人先生已经很熟?

车辐：他是中华全国抗敌文协会员，我也是会员。

南方都市报：四川出了很多美食家，像苏东坡、张大千。李劼人先生也是美食家。

车辐：我这个美食家是别人喊我的。李先生开过“小雅”饭馆，跟我谈过一些美食的做法。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在抗战期间有时没有饭吃，还带着朋友跑到人家的喜宴上吃白饭?

车辐：有的。我还带着郁风、张瑞芳骑自行车到成都市近郊吃大蒜鲢鱼，她们说：“老车，你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地方饮食。”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郁风跟黄苗子还没有结婚。

车辐：那时候黄苗子是吴铁城的秘书，是“大腕”。黄苗子要关照关照，所以国民党对我不敢怎么样。

南方都市报：当时知道重庆“二流堂”哪些人吗?

车辐：知道，好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经常跑警报吗?

车辐：警报一拉响，就跑出去。现在我都有成都被炸的图片。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做的报纸是地下党领导的?

车辐：好几家报纸，是地下党领导的，后来到艺专教美术。我在教书时候认识了王朝闻。我跟王朝闻关系很好，我和朋友把王朝闻化装一番以后，送他到延安去了。解放以后他来看我，关系没断。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国民党当局对地下党办的报纸管得严吗?

车辐：当然严了。他们派有特务到报馆里来当记者，我们也跟他周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笑）我周围的朋友跟我接触，特务都要向当局报告。这些报馆的特务，解放后都抓起来枪毙了。

南方都市报：你当记者时写过很多关于社会底层的文章?

车辐：我有几十个化名。突发奇想就有一个化名，陈白尘教的。

南方都市报：流沙河先生说，他在初中时看了你写的《黑钱大盗李健》，萌发了长大当新闻记者的念头。

车辐：后来我也写了一篇谈流沙河的文章，叫《还我文人本色》。

南方都市报：1945年抗战胜利了，许多文化人从成都、重庆回到北京、上海，你当时有没有想过出四川呢?

车辐：没有，家里子女比较多，有8个孩子。我老伴了不起，她是“多产作家”。

随缘自适度浩劫

20世纪50年代初，车辐任职于四川省文联。车辐的办公室挂有一幅成都市地图，他喜欢看城市建设，每次见有新建的地方，必在地图上标出。这一爱好后来让他吃了苦头，“肃反”审干时，他被指为特务，入狱11个月，起初怕枪毙，吓得睡不着。三天后打听到同狱的“反革命”多达数百人，便放胆吃睡。送回文联时，红光满面，还长胖了。补领11个月工资，大喜过望，买酒痛饮，而且赋诗。当工资不够应付家庭开支时，他就翻出郭沫若给他的三封信，卖给公家，获200元，自称“出卖郭老”。1955年反胡风运动来势凶猛，他吓慌了，赶快交出抗日时期胡风来信两封。事后又遗憾没有卖到钱，多次说起。（流沙河《车先生外传》）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你和周围的朋友对国民党怎么看?

车辐：思想上不可调和。我参加“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共产党领导下的活动，我都参加了。

南方都市报：1949年以后很快就参加四川文联?

车辐：头一天解放，第二天解放军常苏民就来找我，常苏民在延安就听说我了，王朝闻他们在延安提起过我。第三天我就把大女儿送去参军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把郭沫若写给你的信卖掉了呢?

车辐：卖了没多少钱。解放过后，有一个好朋友杨波从上海到成都来，住在我家里，没有钞票，我是半卖半捐，只卖了几百块钱。他们知道我家里有郭沫若的信，有点强迫买去的味道。

南方都市报：反胡风集团时，你把胡风写给你的信交出去了?

车辐：胡风给我写过两封信，约稿。反胡风集团抓了上万人，历史上没有这么厉害过。我自己当初也是打手，拥护共产党，打倒胡风。

南方都市报：把胡风的信交出去以后，有没有人抓住你辫子不放?

车辐：我不发言，不写文章。我周围和胡风有关系的人都戴了帽子。我低调处理，就躲过一劫。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因为把成都新的城市建设在地图上做了标志，被抓了起来?

车辐：“肃反”审干的时候，他们说我是美国五角大楼派来的特务，关进去以后，我照样睡觉。关了11月以后，我还长胖了。还补发了工资，感觉突然发财了。现在我经常还出去看城市建设。

南方都市报：“反右”的时候你不说话?

车辐：没有，低调处理。看清了他们的手法，党内斗争比较厉害，我不吱声。所以没有事。

南方都市报：“反右”之后，你周围的朋友都成了“右派”，你还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劳动?

车辐：我跟流沙河一块劳动，他是“右派”，我不是“右派”，但感觉上是“右派”。我喜欢劳动，到“五·七”干校劳动，我喜欢放牛。我在办公室时也喜欢做运动，锻炼身体，后来有些“左”派看我在做运动，就说我要准备复辟了。

南方都市报：“文革”是怎么过来的?

车辐：不经意，很随便地就过来了。我喜欢苏东坡，随缘自适，随遇而安。家里抄家了。还好，我没被打。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没有做坏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没有北京、上海的朋友的消息?

车辐：不知道，断了。都不知道黄苗子和郁风、杨宪益和戴乃迭关在监狱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那些老朋友才开始接上关系。

善吃懂吃写美食

车辐是成都闻名的美食家。他的老朋友唐振常说：“车辐善吃，懂吃，且身经各种场面，广交九流三教，从前时与达官贵人同席，复广识士夫名流，与张大千、谢无量、李劼人诸先生游。三先生皆食家，车辐与之共食，且得其精研饮食文化之精义；又和引车卖浆者流，贩夫走卒之辈同饮食，深知穷有穷的吃法之道。于是车辐之美食，兼得士大夫之上流品位与下层社会之苦食。”（唐振常《吾友一食家》）晚年，三联书店出版车辐美食文集《川菜杂谈》。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写关于美食的文章?

车辐：1938年就开始写，那时候写得少，解放过后写得多。后来三联书店出了《川菜杂谈》，那本书再版了两次。

南方都市报：成都大大小小的饭馆你都去过了吗?

车辐：去了不少，方便，花钱不多。很多饭馆的师傅跟我熟，给我提供方便。一些小的饭馆能酒足饭饱，花钱不多。现在吃不到了。

南方都市报：除了川菜之外，对其他菜系喜欢吗?

车辐：江浙一带的菜，比较喜欢。我到北京，很多朋友请我吃北京菜、鲁菜。

南方都市报：你在北京东坡餐厅还请过冯亦代、黄宗英等一批朋友?

车辐：东坡餐厅老板张达请我去当艺术顾问，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去，张达后来认识很多文化人，是我介绍的。（拿出东坡餐厅聚会的照片给记者看）

南方都市报：以前你会跟成都饭馆的师傅交换意见吗?

车辐：约到茶馆里，大家聊天。

南方都市报：以前经常到饭馆里品尝他们的新菜品?

车辐：有时候饭馆开业，会请我去品尝品尝。

南方都市报：现在到外面品菜还多吗?

车辐：有些饭馆的老板请到外面品菜，有选择地去。现在出去不方便，身体好了才出去。

南方都市报：年轻时喝酒很厉害?

车辐：可以喝5斤黄酒。同一个桌子，“前不干，后不饮”——前面的人不干杯，后面的人就不喝。现在喝一点。

南方都市报：以前身体好的时候，经常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

车辐：有时候请朋友来家里，有时候不方便，就在外面选馆子请朋友吃。

南方都市报：唐振常先生说，你请朋友吃饭，会提前一天把菜单报给人家听。

车辐：唐振常、杨宪益、周而复来成都，我要请他们吃饭。在北京是冯亦代、黄宗英、黄宗江、吴祖光、方成、钟灵、丁聪、沈峻等。

南方都市报：现在跟那些老朋友还有书信往来?

车辐：常常通信，有时一天写好几封信。行动不便，只能通信。

南方都市报：现在每天都写东西吗?

车辐：每天都写日记、书信。从“九一八”到现在，从来没有断过写日记，被关起来的那11个月除外。

南方都市报：怎么在晚年写起小说《锦城旧事》？

车辐：我以前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陆陆续续把耳闻目睹的事情写了两本日记，自娱自乐。后来就觉得应该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

陈志华：残损的乡土建筑在呻吟

陈志华小传

陈志华，1929年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转营建系，1952年毕业于建筑系。当年留母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1989年，陈志华开始研究乡土建筑。

在陈志华教授的述说里，仿佛他可以听见那些散佚在最贫穷、最偏僻的乡村里老建筑的呻吟声，那些熬着风湿一样的残损，以及被时代抠得满身伤痕的乡土建筑发出的叹息。它们在他眼里，是有呼吸的。陈志华满头白发了，仍然一年一年地赶往全国各地的小山村，去探望这些让他牵肠挂肚的老建筑，以及风土人情。

陈老师总是不断地强调：“一定要多写写那些学生，他们不计名利地跟着我跑乡下，没有他们，我什么也干不了。”在清华大学建筑系馆南楼303房的乡土建筑办公室里，陈老师总是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先回去歇着吧，不要累着了。而这位76岁的老人，不在农村第一线的时候，他就每天早上9点准时来到办公室工作。他时不时拿出在农村调研中为当地农民拍的片给我们看，脸上还有回忆带来的笑容，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是最善良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放松，很快乐。

关于乡土研究：我们和叫花子住一起(1)

1989年开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退休，开始研究乡土建筑。他每年春秋两季带学生上山下乡。近年，指导研究生做了浙江省诸葛村和江西省流坑村的保护规划。已经出版了《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婺源县乡土建筑》、《张壁村》、《碛口村》等研究著作。

陈志华在《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一文中，重点论述了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的一些具体措施，他认为：“乡土建筑的认识价值：通过乡土建筑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整个中国；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文化，认识生活。进而认识中国农民直至中华民族。”

南方都市报：这16年来，您搞乡土研究吃过什么苦头?

陈志华：从1989年至今，我和楼庆西、李秋香两位老师，每年春、秋天都会带上一批学生，上山下乡。主要是希望赶在乡土建筑消失之前，尽可能地抢救下一些资料。

这些年也吃过很多苦头。首先是钱的问题。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分钱经费都没有，全都靠化缘。就是采用“卖青苗”的办法，预先把调查卖给台湾的出版社，他们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预支稿酬。事实上，有些工作成果给了他们10年，都没有出版。不过，因为台湾的稿费标准比大陆的高，所以他们给我们一本书的稿费，我们可以用来做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按约交给台湾的出版社，另一个题目便可交由大陆的出版社出版。目前，给了台湾的出版社12本书，出版了4本，而在大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了11本，重庆出版社出了4本，三联出版社出了2本。

前几年在广东的一个侨乡，我们被安排在整条街上唯一的一家供销社小客店里，条件非常恶劣。大家睡的是大通铺，盖的被子都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冰凉冰凉的，也不知道棉絮里是什么东西，黏糊糊的。晚上一熄灯，四壁就有东西在爬，不知是什么虫子。早上一觉醒

来，发现我们去调研，而旁边床铺的则去街上要饭。——原来我们一直是跟叫花子睡在一起的。客店里那些洗脸厕所间都是全敞开的，与我们的女学生的门之间是没有锁的。男同学给她们买了一个插销，当天就被这些叫花子拧断了。男生只好帮女生打了几桶水，才把门给堵住。

吃饭也吃不饱。在广东，15块钱一天的标准其实已经很低。尤其是当地的食堂5点就下班，等我们调研回来，早就没有可吃的了，都是凉饭凉菜，食堂师傅还满脸不高兴。那些男生整天饥肠辘辘，到后来，都去买酱豆腐当菜来下冷饭。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北京到温州，我都60多岁的人了。经常硬座一坐就坐了33个小时。到了杭州，还要换长途汽车。那时候的长途车就是那种除了喇叭不响全身都响的车。问司机多久能到，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骗我们，因为那条公路不停地塌方，谁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到达。据当地的一位主管交通的官员私下说，90年代，从杭州到温州这条路，平均每天出死人的车祸8次。有一年的8月15日，我们单坐汽车就坐了21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是凌晨1点到达温州的，早上7点我们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还经常坐“蹦蹦车”，就是拖拉机改装的一种小车，12个人花25元包了一辆，10个人挤在车里，2个人挂在车外面。我们的工作需要四处跑，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大片，可走的不是马路，而是机耕路。如果下雨，烂泥就很深，“蹦蹦车”开不动，我们只能下来推。如果不下雨，则漫天黄土，烟尘漫漫，只要前面一有车，后面就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依赖开车的人对路的熟悉瞎开。有一次，我们前面有辆车，路上完全烟尘弥漫，都成了睁眼瞎；忽然烟尘没有了，我们反而纳闷了。一看，原来前面那辆车掉进河里了，幸好河床是干涸的。

一整天下来，大家身上的衣服都成了黄颜色。我们雇了一个当地的女孩给大家做饭，可她竟不会用铝锅做饭，总不熟。李秋香老师刚刚在外调研一天回来，不得不亲自给大家做饭。

一次，我们到达潘村已是晚上，天气非常热，四周一片漆黑，全是悬崖。我穿着裂开了大口子的千层底布鞋，“噼啪噼啪”地响。大家找到一个空房子住下，连水都没有，更洗不了澡，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有两个空房间，床上太热，我干脆躺在地板上，地板上都是缝，我只要朝哪边躺下哪边就有汗。那两个女学生在另一个房间还把门窗都锁上，估计更热了。第二天一早，我当务之急就是花了5毛钱把鞋给缝上了。

关于乡土研究：我们和叫花子住一起(2)

我们在村里工作的时候，当地的市政府看到我从北京带着学生过来，住得苦，吃得苦，觉得奇怪又紧张：是不是特务？想干什么？他们不想负起任何责任，便通知乡政府：不许接待他们。市里派了很多人来赶我们走，副市长还亲自过来，要当地不得卖给我们饭吃，不给地儿住。他的理由是：要开人大会了，要把供销社的房间全包了。供销社的小店服务员连夜赶我们走。后来，供销社带我们去住烤碱的地方，男同学住在烤碱的小房间里，女同学和李老师则睡在灶台上。我被安排在一个拖拉机房里，四面全是漏风的，而且还养鸡。我特意点了一下，一共有30多只鸡，地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鸡粪。后来，还是李老师想办法给我找了一间没建完的房坯，四面有墙，尚未封顶，檐上全停着鸟。等我早上醒来一看，被子上落着的都是鸟粪。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

我们到过在宁夏甘肃陕西边界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全都是黄土地，极少下雨。偏巧我们就赶上下雨，一走鞋子就带起一大坨泥，大家就拖着这坨泥走来走去。我们去考察一个土地庙，那里连路都没有，走的都是放羊人走的路。这个村子里非常穷，侏儒很多，形容奇特，因为都是近亲结婚的结果，看着很揪心。有的一大家子人总共只有一只碗。我们还赶上了一次婚礼，就把这个仪式从头到尾纪录下来了。那家人在当地算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了，婚礼的全过程中，只有清清楚楚的6片肉，放在最抢眼的地方，摆在家门口迎亲的板凳上，专门留给舅舅吃（舅舅是娘家的男性，权威很高）。这位舅舅仅是礼节性地吃了一片肉。

我们还看到，陕北米脂人平时吃的就是汤，他们把黑豆砸扁了喝汤。

南方都市报：在这些年里，最让您痛心的是什么事?

陈志华：最痛心的就是那些官员大鱼大肉大吃大喝。就在那个百姓都在喝黑豆汤的那个县，我们到了当地的招待所，那里招待所条件很好，大厅铺着大理石，有中餐厅、西餐厅、歌舞厅、桑拿室、卡拉OK厅，一个也不少。我们刚刚在当地百姓家喝了黑豆汤，赶回县里，县政委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鸡鸭鱼肉，还有虾、王八等海鲜。当地的党委书记居然说：“别看我们这里穷，但这些鸡鸭鱼都是活的，都非常新鲜。”县长不在。他们告诉我们，县长去美国了，考查当地的城市建设了。我还很天真地问：是不是县长回来以后，要调任主管建设方面的工作了？他们说：县长回来就退休了。这是福利，是政治待遇。

你说，我能不痛心吗?

一般在筵席上，我们都是吃两口就走，那些官员就留下来继续吃。在安徽某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当地没有人理睬我们。我看到村里只有一条机耕道，大坑摞小坑，就去了县里，建议修一修，开展旅游，并帮助申请了3万元，帮助这个乡修路。第二年，我们又去了这个乡，机耕道比第一年更破了。乡里没想到我们还会再来，对我们非常客气和热情，非要我们去吃饭。原来，乡政府把修路的3万元拿来在乡政府大院里盖了一个小饭馆。类似这样的情形非常多。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促使你坚持下来的？最让您欣慰、感动的又是什么?

陈志华：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地的农民对我们非常好。在楠溪江，当地连小卖部都没有，更没有地方吃饭，买卖全靠货郎担。但中午走进任何一户人家，推门进去，主人不会问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不问你来自哪里，一定会给你做饭吃。我们住在当地一个养蘑菇的地方，累了就睡，主人还特地拿自己酿的酒与我们共饮，女主人听到货郎的号角就会跑出去割一块肉，用梅干菜烙饼给客人吃。

一次在广东考察，我带着一个女研究生走了几十里山路，当地气温已有40多度了，路上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地面温度估计有摄氏50度，女学生中暑了。挣扎着到了村里头，女学生就找地方躺下了，我

一个人出去转，回来的时候，发现她躺在一张新床新被褥上，一位年轻的姑娘给她打扇子，旁边还放着一碟新鲜剖开的西瓜。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姑娘明天就要嫁人了，女学生躺的是她的新婚的床。8年后我们再去这个村子的时候，这位姑娘已经生了一对双胞胎，已上小学了。

有一次，当地的市政府不欢迎我们来，市长亲自叫上好几个局长，要带我们走。我说：不仅我要去这个村调查，我还要到隔壁村调查！一个博物馆馆长口不择言，说：别人都可以去，就是你们不可以去。李老师马上记下这句话，我要市长签名证实这句话，回北京我就要上诉。李老师在旁说：××部的部长就是我们陈老师的学生！也许听了这句话，他们才没有那么凶了。

我和李老师正要往隔壁村走的时候，5个70多岁的老头追过来，告诉我们不会被招待的，市领导已通知邻居赶我们了。看我们不肯放弃，他们就主动要求陪我们去，带我们抄了一条后门的小路进去，转了一圈后，我拍了不少照片。当时，我心里有气，要求一定要从正面出门。在村门口，村长正带着一伙青壮年在影壁前等着我们呢，还用赶猪的动作要驱赶我们。5位老头勇敢地站在我们前头，护着我们。这件事之后，我一直与这5位老头都保持着联系，经常会去当地看看他们，打打电话。其中有两位已经去世了。中国的农民真好啊，经过了种种打击，仍然善良。

南方都市报：和您一起做的还有您的研究生吗?

陈志华：这些清华的学生素质都很高，十分吃苦耐劳。像我和李秋香老师带的这几位学生，从四川坐火车回北京，今天凌晨5点刚刚到，马上又赶去上早上的课；上完课，就赶到这个实验室来帮我和李老师做整理工作了。平时的学习也十分扎实。虽然是女孩子，但工作更加认真和细致。

关于建筑保护：中国旅游是竭泽而渔

陈志华认为，在文物建筑保护领域，我们缺少专家培养制度。1983年起，他在清华大学新率先开设文物建筑保护课程，但仅一年就办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教育局不批，不发文凭；二是在实际工作中，没人重视，谁都可以对古建筑保护指手画脚。中国虽然号称文物大国，但至今没有一个专家培养制度，甚至未形成文物保护学界。而在国外，光是意大利，陈志华就去过五六个有培养文物保护专家专业系的学校。

南方都市报：您的乡土研究工作开展至今，是否收到了成效？现在的乡土建筑的保护工作是否难度更大了？

陈志华：我们做的工作现在开始受到重视了，但大家的反应还很慢。只有旅游，才真正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旅游的破坏性太厉害了。以前，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做保护性规划，只做研究性规划，但现在看这种大势，也必须做保护了。

1989年春天，我去楠溪江芙蓉村，知道了当地有一座明代的芙蓉书苑。因为当时拍照的胶卷不够，我就想秋天申请了课题经费再来拍照、测绘。结果，就在我们走后不到一周，这座书苑就被失火烧掉了。

1991年秋天，我们到浙江兰溪市的山泉村去，听说那里有一座形制特殊的宗祠，居然还保存着85块历代的匾额。听说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李老师赶到山泉村去，一刻也不敢停留。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走到山泉，焦土一片，宗祠烧光了，匾被烧掉了，我们去的时候，废墟上还冒着袅袅的余烟，还是热的。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造成了对乡土建筑的破坏？

陈志华：对乡土建筑的破坏力惊人。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增加，一到成年就必须分家，分家就必须造新房，就造成建筑生态的破坏。另一方面是旅游，都喜欢把旧的拆掉，再按旧的样子新盖一个仿古的，

充斥着假古董。旅游把文化内涵也歪曲掉了，这是一个大祸害。服务业、商业一来，就面目全非了。现在，周庄的资源全被毁掉了，浙江的诸葛村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控制游客，一天不能超过3000人。

西方把旅游业视为一种文化活动，行万里路是为了长知识；而中国的旅游业的出发点就是拉动内需，就是直奔经济目标去的，一开始就是错的，它的发展也只能竭泽而渔，带有破坏性了。

南方都市报：这些乡土建筑的保护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此处可能掉文）

很悲惨，这个工作我干了20年，感觉选址越来越难。现在破坏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只能到少数民族区选址了，这样才可能找到原生态的村落。我特意选址选择那些变化大一些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差异都大一些的。这样的调查出来的结果将更有代表性。

每次进了一个村子，我就像进了一座宝山一样，很兴奋。从单栋来说，这些建筑价值一般，但从整个村落而言，它们就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独一无二。我们可以通过乡土建筑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整个中国；认识历史，认识社会。不研究乡土建筑，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同样，不研究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历史。

用这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建筑，我觉得很过瘾。但我们的工作还不够深入，还不是标准的人类文化学，否则的话，应该在每一个村落都住上一年，住上一个轮回，才能更充分地了解。我们招收的学生都必须去实地考查，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北京有哪些做得较好的文物建筑保护?

陈志华：文物建筑是建筑的精华部分。就在你来采访的前一天，文物局开会的时候，有人说，北京没有一个文物建筑保护得好。外地还有一些保护得好的例子，但北京没有。文物局局长也没有办法。比如，故宫现在的文物没有地方放，想调到景山存放都行不通，因为两

者的主管是不同的。故宫只能往下挖地下室，虽然都知道这样很危险。

南方都市报：您呼吁过哪些具体的文物保护?

陈志华：我主要是在做农村的乡土建筑保护。

关于历史问题：下放时我能挑240斤

陈志华的专长早期是讲授苏维埃建筑史和建筑设计初步，后来讲授19世纪末叶之前的外国建筑史，偶然兼教低年级的建筑设计。并且，年年带学生测绘颐和园建筑，并带学生到建筑工地劳动，学会木工、瓦工、石工、钢筋工等操作。“文化大革命”时因被诬陷遭到残酷迫害。

此外，陈志华更是外国建筑史的专家。他关于外国建筑方面的论著有《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之前）》、《外国造园艺术》、《北窗集》、《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外国纪念性建筑中的雕刻》，以及译作《建筑艺术》（苏联大百科全书条目）、《俄罗斯建筑史》、《古典建筑形式》、《风格与时代》、《走向新建筑》、《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装饰就是罪恶》、《勒·柯布西埃》等书。

南方都市报：您研究了40年的外国建筑和园林，为何却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搞起了乡土建筑研究?

陈志华：我从小在农村，对农村很有感情，一直想做乡土建筑方面的调查。说是1989年开始做研究，其实是那时候我才退休，此前因为一直在大学教书，关得死死的，没有自由，没有条件。我们的教学任务很多，也不提倡教师搞学术研究，也不提倡写文章。

以前高校里不开放第二职业。清华大学有一个建筑研究院，教建筑设计的专业老师可以轮流做建筑设计，但人多机会少，连他们也未必排得上，我这个教建筑历史的，就更轮不上了。我们做研究不做设计的，都很穷。人家说我们“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南方都市报：除了研究，您做过什么具体的建筑工作?

陈志华：早在毛泽东年代开始，清华大学就有了建筑研究院。1958年是大跃进时期，人人都在写诗，连大学教科书都由学生来写，说是要“劳动人民占领舞台”。我有一个朋友在建筑研究所的历史研究

所里工作，他们要写教科书，就跑去调查民居。这听起来是好方案，但后来没有办法展开调查了。因为好一点的民居不是地主的就是富农的，而且，这个调查不能纳进庙宇、祠堂、学堂，只选取贫民的民居。那还有什么可调查的？结果做出来的调查非常技术性，只是找一些民居特例，完全回避主人的身份，不谈历史，不谈文化，这种纯技术层面的东西只能叫个案汇编而不可能全面，束缚很多。

南方都市报：您当初为何选建筑这一行？

陈志华：我在1947年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当时，我读社会学就是想从事新闻行业。1948年冬天，清华大学解放了。1949年，解放军进城了，我刚念完大二。当时，《论人民民主专政》刚刚发表，种种迹象表明态度，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原则都犯了忌讳，文法学院没法继续了。我觉得学社会学没什么可做了，就打算转行学理工科。可我的兴趣又在人文，两相结合，就选了建筑学。事实上，到1957年社会学的师生都成了大“左”派，几乎全军覆没，幸亏我“滑头”，及早逃掉了。

南方都市报：您参与过颐和园的古建筑的测绘工作？

陈志华：颐和园的测绘工作是教学任务，我从1953年开始年年带着学生去做测绘声绘色，一直坚持干到“文革”。在“文革”后我还做了两年的这个测绘工作。目前，颐和园大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我带着学生去测绘的。

南方都市报：“文革”中您是为何受到不公正待遇？

陈志华：我是标准的牛鬼蛇神。当时，全国人民没饭吃，允许我写个讲义出版，对我已算是优待了。在讲义里，我引用了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写的两段话，是关于奴隶社会里氏族公社成员作为法老的奴隶的种种苦难。这两段非常革命，非常马列。后来，形势更严峻了，为了节约成本，我又重新整理教材，做了一些删节，就把希罗多德的两段话压缩了，保留了一段。这时，我的一位老同事，就贴我的大字报，说“心中无鬼，为什么要把两段压缩成一段？”（当时批周扬的也

用的是这一条理由）说我用此来攻击国庆工程，也就是攻击三面红旗。当时还有大字报说：喜讯！揪出了建筑系的牛鬼蛇神！

我被下放到在农场劳改，跟大家劳动了一年多。劳动时，我能挑240斤！从1969年夏末，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课，后来才开始有工农兵学员。

关于社会文化：风水妨碍了真正的科学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签订委托合同，委托该所代表中心开展“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这是内地首个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陈志华对此提出了质疑及批评。他认为：“我们搞乡土建筑，对建筑风水进行科学的分析，是为了解释中国传统建筑上的一些现象，……这些在建筑风水里都能找到说法。我们研究建筑风水，是当成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当成科学来研究的。”经新闻曝光后，这一培训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南方都市报：如何实现建筑的现代性?

陈志华：必须另辟新区。全世界的经验都是如此。我还在学生时代，欧洲就已经意识到老城的发展问题了，光是旧城改造无法解决交通问题，基本格局也是错的。

南方都市报：您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吗?

陈志华：知识分子不提意见，叫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任何时候就是推动社会的力量，因为责任在那里。我们不能老当驯服工具。

南方都市报：在您看来中国有没有什么宜居城市？它们有没有普适意义?

陈志华：中国目前有些中小城市不错。大城市太混乱，弱势群体受尽欺负。在北京，即使是中等收入的人都不宜居。国家的投入都给有钱人服务，各种问题都是中等以下收入的人群来承受。现在，高速公路造到城里来了，老百姓和孩子出门更难，有私车的人倒是方便了；有钱人占领了基本农田的土地，但一旦粮食短缺，头一个倒霉的却是农民。

目前，中国一边是穷人，一边是有钱人，有钱得我们想象不到。有学生告诉我，中国已出现了1.6亿一幢的别墅。凭什么?

南方都市报：您是做建筑史的，风水学在中国建筑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吗？您为何反对?

陈志华：因为我对风水学有所了解，所以认为风水是骗人的东西。在古代，通常是通过科学选址之后，才借用风水做一些辅助性的确定工作，它只是在细节上起调整的功能作用。风水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并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9月初的有关部门与高校合办的“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这是与利益驱动有关。

在我看来，风水妨碍了真正的科学，混淆了研究的方向，另外还使一些骗子大发其财。

来新夏：我们扫地那些年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

·他是陈垣、启功和范文澜的弟子。
·研究北洋军阀史，成了他“文革”期间的罪状之一。
·他治史严谨，反复增补，五十年著一书。
·年过八十仍笔耕不辍，拥有众多“粉丝”。

来新夏小传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1949年入华北大学历史教研室，为范文澜研究生。1951年至南开大学任教至今。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现为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

在见到来新夏之前，先在网上查到了他发表的大量学术随笔，比如在《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光明日报》上，来先生的文笔活泼犀利，一点都看不出是个80多岁的老人写的。以至于有人发表文章表达对他的敬慕，名字就叫做《晚景能否来新夏？》

“我也有很多年轻粉丝的”，来新夏很自信地告诉记者。他和很多人成了忘年交，比如杨玉圣。在他塞得满满的书架上，有一帧来新夏50多年的良师挚友启功先生送的硬笔字：“人到八十老更忙”，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来新夏的晚年繁忙景象。他现在每天工作6小时，两天出一篇文章。电脑的显示器刚刚换成了液晶的，他就是想以此保护眼睛，多写几年。来新夏还担任着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经常参加各种方志会议和活动，比年轻人还忙。

20世纪80年代是来新夏在“文革”受困后的第一个春天。“我确实有那么一瞬的辉煌，好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我要洗刷掉我身上的污水，证明我能做事。”来新夏先后担任了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系主任、学校出版社社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各种职务纷至沓来。他还到处奔走呼号，一手创办起了图书馆系。

而80岁的时候，来新夏又用笔耕来继续这种创造力：“我是到了晚年才突然觉悟了。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给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

馈给大众。”来新夏的坚定执拗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成就了他目下的火热晚年。

辅仁求学

来新夏1923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祖父来裕恂开蒙读书。祖父为晚清经学大师俞樾的高足。

来新夏的中学时代是在南京和天津度过的。在天津读高中的时，得到著名史学家谢国桢之弟谢国捷的指点，并撰写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这篇文章后来经陈垣指导修改，成为来新夏的大学毕业论文。来新夏于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靠着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的资助而坚持了下来。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从小是受祖父的影响比较大?

来新夏：对。我祖父来裕恂是清朝末年的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师范科，鲁迅当时也在那里。留学期间我祖父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还担任了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在日本的时候，他读到日本人写的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志要自己写一本，回国后他在潜心4年写了《汉文典》，还有《中国文学史》等很多著作。

虽然祖父很早就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但革命成功以后没有谋取官职，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很多朋友都做官了，像沈钧儒、马叙伦，都是他很好的朋友。1928年的时候呢，马叙伦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因为看着老朋友生活不是很好，就让他去绍兴县去做知县。但我祖父这个人不大会做官，做了半年，不仅没有发财啊，反而把自己一些积蓄给赔进去了。因为一些公家的活动他也自己掏腰包。所以到了6个月以后他说，我没钱可赔了，于是就挂官辞职走了。他一辈子就干了这6个月的绍兴县县长。当地人给他的评语是：书生本色，两袖清风。

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我影响都很大。我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他指导我读了很多蒙学读物，什么《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直到我离开祖父和父亲到了北方，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我应该读什么书。很幸运。

南方都市报：你是1942年进入辅仁大学的。那时的辅仁是什么样的情况?

来新夏：那时候的辅仁正处在一个高峰时期，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陈垣、余嘉锡、张良煃、朱师辙都是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北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很多老学者不愿意去日本人管制的伪北大、燕京大学那些学校教书。而辅仁大学当时处在一个超然的地位。因为它的背景是德国的教会，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日本人也不愿意得罪德国人，所以那个时候对辅仁就放宽一步，干涉得比较少。

辅仁是个小而精的学校，校舍并不大，但是学风很朴实。当时我们每个班也就十几二十个学生，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亲自授教，师生关系很密切。当时辅仁的史学特别强。校长陈垣先生就是史学大家，目录学家余嘉锡也都亲自给我们授课。

南方都市报：你上辅仁的时候似乎条件很艰苦?

来新夏：是呀。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北方基本是敌伪教育，西南联大我们又过不去，因此辅仁是大家都想进的一个地方。当时我们考辅仁不容易，差不多20个人里才考上一个。

那时社会经济很差，家里也比较困难，我在辅仁是4年连续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奖金可以维持生活。记得每次获奖都会有一个奖章，上面刻着一个“勤”字。

南方都市报：你记忆里，陈垣是个什么样的人?

来新夏：陈垣先生是我的业师，亲自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虽然是校长，但还要亲自给学生上4门课。他对学生要求很严。你都想象不到，他布置的作业他不但必定亲自改，而且一定要自己也写一篇，然后和学生的一块儿贴在教室里，让学生自己体会：你写得如何，老师写得如何。每个题目他都这么做，这样子的老师可以说现在是找不到了。

另一方面陈先生有个好处，就是他不记仇。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组织一个欢迎新生入学的联欢会，我那时功课好，是我们班的班长。所以是我和另一个同学编排节目。其中一个我们自己很得意的节目，就是把所有老师在课堂上行动语言的缺点演出来。比如陈先生吧，他讲课的时候喜欢在讲台上来回遛，另外他有一把长胡子，他喜欢一边走一边讲一边捋胡子。有同学就上来做这个动作，大家就都笑了。另外像余嘉锡先生，就是一点都不苟言笑，大家就把他演成木头人的样子。还有老师有些磕巴（口吃），有些老师讲话时腿一蹦一蹦的，我们也都照着演出来。台下的同学都笑得不行了。

因为是师生联欢，老师们都坐在下面呢。陈先生当时并没有发作，但我看出他脸色不好看了，心想“恐怕是糟了”。第二天果然就把我们传讯到办公室去了。他说，你们这是戏弄老师。人应该学会尊重人，一个人如果不尊师，想学好是难乎其难的，总之跟我们讲了很多为人之道。我们也认错了。但过了几天?的论文再送给他看，他丝毫没有因为我调皮犯错就不搭理我，仍然很细心很认真。

南方都市报：其他老师呢?

来新夏：比如说张星烺，他是中西交通史专家，那时候做辅仁的历史系主任，长得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据说他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40岁的时候坐火车去青岛，张宗昌的兵看他头发那么白，居然给他让座。他苏北口音很重，对学生很亲切的。余先生学贯中西，讲课的时候英、德、法语的词都会出现在黑板上，所以我们记他的笔记是很困难的。

余嘉锡那时候是中文系主任，我选修了中文系一年级的目录学，就是他上课。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了，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讲义的，但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对学生很严。有一次期末考试他给了我一个“B”，我要靠奖学金生活嘛，很在意成绩，就斗胆跑去问余老师。结果他说：“我读了半生的书，只得了半个‘B’。”后来高年级的同学才告诉我，余嘉锡平时给学生一个“C”都不容易，最高分就是“B”了，我一听，很后悔自己太鲁莽。

南方都市报：启功那时候是你们的国文老师?

来新夏：是，启功跟我关系是最密切的，我们保持了有50多年的师生关系。他那时教国文和绘画。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启功老师就叫我每周日到他家里改善生活，每次去都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吃饭。有时候衣服掉扣子、破口子了，老太太和启师母也帮我们补补钉钉。

我（20世纪）60年代接受审查的时候，很多人都疏远了，启功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1996年有一次，我去启功家看他，他叫我过去，跟他挤在一张沙发上。他忽然问我：“你几岁了？”我说：“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我73了。”他忽然哈哈大笑地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都是‘坎儿’，这么一挤一撞，就都过了‘坎儿’了，这不值得大笑吗？”

南方都市报：“文革”时候启功有受到冲击吗?

来新夏：他也被打成“右派”嘛。不过他有一个好处，他字写得好，红卫兵就把他留下写大字报，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大字报，没有下放。现在都还有人开玩笑：当初要是把启功写的大字报保存下来，现在可就值钱了。

启功虽然后来名气那么大，但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家里就两间房，一间是书房兼客厅，只有用了几十年的旧书桌、旧藤椅和旧沙发。另一间卧室里只有一张旧单人床。有一次我去探望启功老师，他正在睡午觉，我探头一看，看见他缩在小床上，感觉很心酸。但他却很乐于助人，什么公益捐款，资助贫困学生，他都很积极。

研究北洋军阀史

辅仁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担任中学教师。随后被选送到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分配至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

正是在做范文澜研究生期间，来新夏得以参与整理大批北洋军阀原始档案，从此跟“北洋军阀”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专攻北洋军阀史，50年内先后写了3本相关的书，这也成为他在“文革”中遭批判的重要原因。

南方都市报：解放后，你还做过两年范文澜的研究生。范文澜是怎样一个人?

来新夏：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范文澜在中共内部的地位很高，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当时做华北大学副校长、历史研究室主任。他这个研究室就是后来的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我们上研究生那会儿是供给制嘛，我们都是集体住。就是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第一所房子，那时还没楼呢，只是平房。

那时候范文澜住在前院，研究生都住在后院。那么你这个学生要想出来你必须经过他的窗户底下。他那个窗户是落地玻璃窗，窗子很大，他的写字台就摆在窗子前面。他天天在那儿念书，所以你一出来，看见老爷子在那儿坐着，你就不敢出去了。有时候你刚想溜过去，他一抬头看见你就问，“哎，你干什么去啊？”你说，“哎，没事！我出来走走。”这样搪塞一下。

那时我们都20多岁，谁都想出去玩玩，散散心。我们就在王府井，是繁华地区嘛。他就不让，在门口看着。而且他规定，那时候每周末会给学生发电影票，他就通知后勤办公室，研究生一律不给发票，就这么严格。我们写的文章也都不大乐意拿给他看，因为拿给他看的，没有一个不被挨刺的，都是这不对那不对。不过后来想想还是受益匪浅。不是这么严格管理，当时我们就荒废掉了。

南方都市报：你就是在做范文澜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北洋军阀史的?

来新夏：对。因为1949年刚进城以后，范文澜先生在的研究室接收了一批北洋军阀个人的信札，另外还从政府各部门移交了一批北洋时期的文件。包括信札、电报、部下的报告啊，等等都搜集起来了。范先生就安排我们7个20多岁的研究生来承担整理文件的任务。

那时候是非常艰苦。当时文件都是一麻袋一麻袋拿来，那时条件很差，我们每个人除了发个口罩以外，再发一套灰布的旧制服，每天在仓库里弄。当时整理分两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把土抖落干净了。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非常脏。里面有老鼠巴巴（粪便），有尘土，一个麻袋倒出来全都是土。我们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戴眼镜的这眼镜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全身都是土。

这是第一步。这是信，放在信一堆，文件放文件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分类，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次整理的时候就很细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写明这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谁要勾结谁，写出概要性的东西。这时就研究内容，按专题分类。

我们7个人都住在一起，晚上干完了活聊天，就说我今天看到什么有趣的，他看到什么。我很幸运，其他人研究没有这个原始条件，我恰好接触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这个研究后来就成了伴随我一生的研究。

南方都市报：后来“文革”期间你的罪名里边，恐怕研究北洋军阀就是一个吧?

来新夏：嗨，我的罪状可多了。其中一个就是说我写军阀史。说你放着人民的历史不写，非要去研究军阀，可见你跟他们气息相通啊。另一个，我写过一出京戏叫《火烧旺海楼》，在天津上演几个月长盛不衰的一个戏。这出戏当中我写了一个清官。结果人家说清官是

维护封建统治的，甚至当时有一种论调说清官比赃官还坏，因为赃官是破坏统治的，清官是美化政权的。

最初写北洋军阀史的时候我就有过顾虑。因为人家说军阀史是黑暗的历史，恶人的历史。但在我看来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没有恶哪有善？北洋军阀我一共写了3本书。1957年，在荣孟源先生推荐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翻译为《中国の军阀》，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补充了很多史料，写成《北洋军阀史稿》，增加到34万字。2001年，增补大量资料，又出了第三部《北洋军阀史》，105字，两厚册。一次比一次详细和全面，所以人家说我是五十年著一书啊。

“文革”受难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来新夏就作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进了牛棚。之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劳动。来新夏笑着说，他现在身体很硬朗，还要“感谢”“文革”所赐。在长期劳动改造的年代里，来新夏成了一个劳动好手，学会了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直到现在还会赶大车。而且也是在下放期间，他安心地写了好几本著作。

南方都市报：“文革”里面你是第一批被批斗的?

来新夏：“文革”来说呢，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想到会搞成这个局面。南开大学的“文革”是1966年8月7号正式开始的，我们南开有一句话是“八七开花”。那天最热闹，到处敲锣打鼓，造反游街，我们开始进入牛棚。刚开始我们还很紧张，不过到后来就越来越不紧张了。因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又进来一批，一会儿又进来一批，也就习惯了。

第一批的时候我就被剃了阴阳头，被拉去游街，要戴高帽子。我排在后面，轮到我的时候，我头大，那个高帽子一戴上就掉下来，一戴又掉下来，所以那个红卫兵小将也烦了：把这个拉出去，下一个！结果下一个脑袋小，一下就戴上了。我就挺幸运的没戴高帽子。（笑）

那时什么批斗、游街、劳改、喷气式飞机、罚站、拳打脚踢，我什么都受过了。后来让我们劳动，打扫校园，扫厕所。我们也有贡献，我们扫地那些年，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到了1970年我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劳动4年。在这4年里边我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我甚至现在还会赶大车。那时满工分10分，我能挣到9.5分。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

来新夏：1968年以后，造反派有了不同派别，相互打派仗，我就被“绑架”过两次。一次是深夜把我架到地下室，让我揭发交代王光美的罪行。我和王光美是辅仁大学不同级的同学，素不相识。他们就对

我棒打脚踢，没办法，我只好写些她爱穿绿衣服，爱打扮之类的来搪塞一下，结果一个红卫兵小将大声骂我“不老实”，把我蒙上眼睛，押回了住处。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把我押到一个会议室。坐在上面的是我教过的学生，他对我做了一番“阶级分析”以后，说我多占了人民财产，要我上缴1000块钱支持革命。文革开始以后我每个月只有12块生活费，哪里有1000块钱。刚好口袋里有一个只剩3块5的存折，就交上去了，表示我说的不是假话。没想到那个小将一下就发怒了，一脚踏在椅子上，撕掉存折，叫我“滚蛋”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闹“文革”的都是大学生吧?

来新夏：来抄家、批斗的，有自己教过的学生，有年青的同事，有南开附中的学生，甚至还有一些南开的子弟。你们现在都不懂了，说那时候学生怎么那么对待老师呢？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不是有个大家赔礼道歉的事情吗？现在学校有些老师当年就是红卫兵，见到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觉得是无所谓，他们也是愚昧时代里被愚弄的人，红卫兵说起来也很无辜，他们荒废了那些宝贵的时光。你说他们得到啥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我说不需要这样，向前看，你要算旧账算得完吗?

南方都市报：你的很多书都是下放时候写出来的，那时候怎么看书写作呢?

来新夏：晚上写啊。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得感谢“四人帮”，就是当时下放劳动让我身体锻炼得很健康。而且农民啊，中国的农民真高明，他绝对不来批斗你。他说这些人现在这里藏一藏，将来还有用呢！所以他也不来理你管你。所以除了每天跟着农民下地干活，晚上回来以后都是你一个人了。我在这4年里面整理了3部旧稿，写了一本目录学方面的书。

难友穆旦

“文革”当中，来新夏与穆旦成为一对难友。他们一起劳动、聊天，一起洗刷南开大学的游泳池，这一段经历使来新夏对穆旦的个性和“文革”厄运有深刻的了解。他说，穆旦近年来日益被研究者关注，但很多文章却不提及穆旦的坎坷遭遇。他在《怀穆旦》一文中说“穆旦所遭的厄运，我都耳闻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时期的遭遇则我是唯一的见证人。为了让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后死者应该担负起这种追忆的责任。”

南方都市报：也是在“文革”的时候，你和穆旦成了难友?

来新夏：是呀。其实我很早就认识穆旦了，但是我始终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1953年他从国外回来，到南开外文系教书时我就认识他了，因为穆旦的妻子周与良跟我是辅仁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她念生物我念历史。当时学生不多，全校的学生差不多都认识。但穆旦很内向，他也从来不谈自己写诗的事情。所以我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就读过穆旦的诗，也很早就认识查良铮，但就是不知道是同一个人。

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俩一起进了牛棚了，我这才知道。那时候呢，大队里大家彼此都不愿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你怕我打小报告，我也怕你打我小报告。因为他天天让你汇报思想，后来没什么可汇报了。“你自己没有，那你旁边的人说什么了没有？”——所以呢，大家都保持沉默。

后来牛鬼蛇神越来越多，一个队放不下，就分组。我和查良铮分在一组，就是“一对黑”吧，专管洗刷南开大学的游泳池。就我们两个人。游泳池有一个好的条件是怎么呢，就是大家都游泳的时候我们就坐到旁边去了，等大家休息或者散了，我们才拿墩布擦啊扫啊什么的。所以呢谈话的机会就多。就是这会儿我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他才跟我说了，谈他的家世啦，谈他的诗啦，谈他的遭遇。平常他是不敢谈，但这两人嘛，我想告他也没旁证啊，所以顾虑就少了。

南方都市报：他当时的“罪名”是什么?

来新夏：远征军啊，他给远征军当过翻译。给美国人做过翻译那时候就是特务啊。但其实啊，是有一次《红楼梦》的讨论会，有些同事的过激发言得罪了当时的系领导。穆旦虽然没有发言，但他和那几个发言人平时来往密切，那个领导人就以“准备发言”的罪名，把他罗织进“反党小集团”了，他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受到追查。这就是所谓的“外文系事件”，当年在校园里曾经引起过震动。

所以他一直是很苦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谈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他1953年回国，1954年就被整了，1958年就被判了。过去学校里头谁有问题都是党委的决定，唯有他，还有一位杨敬年先生吧，是法院派人来开庭正式判决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使用”，做整理图书、抄录卡片和清洁卫生那些杂役的工作。

南方都市报：你记忆里边穆旦是怎样的一个人?

来新夏：穆旦是个很内向的人，那时候劳动休息大家蹲在一起，我是说话比较多的一个，而穆旦常常是一言不发，看着别人说话，神情忧郁寡欢的。他还悄悄地嘱咐我少说话，果然，不久我不小心流露的不满就被别人打了小报告，受批判了。穆旦的劳动态度很认真，而我总有抵触情绪，经常被革命群众斥责，他还来开导我。后来我读到穆旦的全集，感到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才和他在游泳池劳动相处时候的形象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他有诗人的气质，但又像一位朴实无华的小职员，有一种“敛才就范”的姿态。

南方都市报：那他生前看到平反了吗?

来新夏：算是推翻了原来的判决。但是正式宣布是在他追悼会上才宣布的。这个事情非常恼人，头一年已经定下来给他平反落实了，一直到他死的第二年南开大学才正式宣布。他妻子周与良把他翻译的《唐璜》埋在了他的墓里。我觉得他很悲惨。虽然他身后很荣耀，最近这几年还特别红。但是人都说了，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但穆旦生前那杯酒是苦酒啊。

南方都市报：“文革”之后，你任了很多职务?

来新夏：（20世纪）80年代被启用后，我确实有那么一瞬的辉煌，好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学校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系主任、学校出版社社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纷至沓来。当时我就是要洗刷掉我身上的一些污水，证明我能做事。我一手创办起图书馆系，到处奔走呼号，到教育部打了无数的申请，把这个系创了起来。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都80多了，还在报纸上发随笔，很多人都不相信你有那么大年纪呢。

来新夏：呵呵，这是我到了晚年突然觉悟了。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给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而我们原来学术圈里?那些东西没有人要看，是不是? 所以我把我消化的知识，用人们能够接受的文字，用随笔的形式反馈给他们。我的随笔信息量很大，和作家的随笔不一样，不是单纯的吟风弄月。

我刚把计算机换成了液晶的，就是想保护眼睛，多写几年。现在每天工作6小时，两天出一篇文章，发在《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光明日报》。有很多年轻人写信来，他们不认为我是8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粉丝呀。

专题撰稿：本报记者田志凌

摄影：特约记者韦承金

申泮文：不违心，怀斗志，明朗倔强应万事

·他是我国当代无机化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而如今90岁的他还会亲自给本科生上化学基础课。

·他80岁开始学电脑，5年后即凭借《化学元素周期系》多媒体教科书软件获国家级奖项。

·他已出版专著和教科书70余卷册，4000余万字，是中国著译出版物最多的化学家。

申泮文小传

申泮文，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当代无机化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申泮文生于1916年9月，广东省从化县人。幼年时父亲即为谋生携全家北上。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此后历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山西大学化学系主任、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校长等职。目前为南开大学新能源材料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储氢材料专题组顾问。申泮文同时还是知名的翻译家，是我国化学家中著译出版物最多的一个。

见到申泮文之前，南开的一位老师这样跟记者描述：“90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头脑之清楚，反应的敏锐程度，比年轻人还要好。一起吃饭，老先生侃侃而谈，爽朗极了。”

见到申先生之后，感觉到这位老师说的简直半点不虚。老先生身材瘦而硬朗，声音洪亮，记忆极其清晰，讲起往事来条理清楚，反应敏捷，一个停顿都没有。完全和年轻人一样。

在南开大学化学楼的一楼大厅里，悬挂着5位中科院院士的大幅照片，足以用“英俊”形容的申先生是最醒目的一个。可是老人仍然自我调侃：“要不是当年‘文革’中我比别人早一点开始研究工作，放在今天，我那点成果根本评不上院士！”

最值得一提的是，申泮文可能是中国年龄最大的教师，直到今天，90岁的他还给本科生直接上化学基础课，带着5个博士生、6个硕士生，每年还要为2个本科生修改毕业论文。他80岁开始学电脑，85岁凭借《化学元素周期系》多媒体教科书软件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申泮文对南开感情最深，尤其热心于给大一新生讲解老南开的历史，做爱国爱校的教育。1987年，是这位院士第一个在南开校园的大钟路上挂起历史图片，纪念日军轰炸南开校园50周年“受难日”。1986

年南开大学开了一个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此后申泮文就管那天叫“南开学校复兴日”。

至今在南开校园，学生还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瘦高白发的老人，骑着自行车，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地往返于化学楼和北村之间，去给学生上课，去演讲，去指导博士和青年教师做科研。老人性格的明朗倔强表现在他一生的经历里，年轻时为了不违心加入党派，卷铺盖逃离单位；“文革”当中不服被批判，和别人赛写大字报；两次逃出牛棚，两次都被抓回来，还挨了打。至今看着老人讲述往事时高昂的声音，仍然充满了热情的斗志。

投笔从戎，参军抗日

1935年申泮文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他在班上成绩一直是第一名，获得每年300银元的奖学金，解决了经济困难。但仅上了一年大学，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南开大学校园毁于日军的野蛮轰炸，申泮文的大学生涯只得中断。

身受国破、校毁、辍学之痛的申泮文，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毅然投笔从戎，南下参加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并参与前线战争，亲眼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溃败。

南方都市报：你在南开只上了一年学?

申泮文：对，后来战争爆发了嘛。我还记得，是“七七事变”过了3个礼拜，7月28日，日军在海光寺架起大炮，炮轰南开大学。先是炸图书馆，后是宿舍。那时我家就在学校旁边，我亲眼看到的。好在是暑假期间，学生都疏散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怎么想的要去参军呢?

申泮文：因为学校被毁了，不能上学了。那时天津北平都被日本占领了，大量的学生就成了流亡学生。有的学生通过陆路的就到陕北去了；有的走海路就到南京去了，因为当时毕竟是国民党在领导抗日嘛。

我去南京呢，是因为当时南开大学有个办事处在南京。我就投奔南开大学办事处去了。到了南京以后正好国民党军官学校在那里招人。军官学校里的一个教导总队，它是专门给国民党军队短期训练士官的，叫“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军官教育队”。它招人的目的是要办防化部队，要学化学的人。我一看正好，就报名去了。参加了以后到南京溧水县紧急训练一个月，由德国军官训练我们。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上了淞沪会战的前线?

申泮文：我才参加训练了一个月，这时候上海的战事紧张了，就派我去前线，在教导总队的队部里做后勤工作。当时上海已经败退到

淞江一线。那次上海战争国民党投入的部队是很多的，各个地方的部队也都赶过来，广西的、广东的、四川的，那时有30万大军在上海第一线。

可是我去了只有两个礼拜，日本人就从杭州湾登陆了。登陆以后一包抄我们大军的后路，第一战区就紧急通告全线撤退。当时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带着近30个伤病员，步行退回后方。

南方都市报：30万大军都撤退了？

申泮文：这一退啊就乱了。这一路上到处都是败退下来的散兵啊，没有秩序了。满山遍野的散兵，日本的飞机就在后面追着扫射。有些士兵被打中在路上，还没有死，见到我们就说，长官长官，你给我一枪吧，别让我在这受罪了——就这样惨。而且我们退下来的时候，原来说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有一道中国“马其顿防线”，结果都是假的，都被国民党的官员贪污了。有一些假的战壕，根本没用。

这样子我就跋山涉水，步行回到了南京。回去以后我去问我的长官，我还能不能学习做防化兵啊，他说不行了，那我就只好走。回学校去继续读书。那是我一生中情绪最低沉丧失信心的时候。

西南联大恢复学籍

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又感到个人和国家前途都一片黯然，申泮文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变成了濒临精神崩溃的孤鸿。

他辗转至长沙，进入临时大学化学系继续学业。由于中途插班和身心交瘁，他的多门选课都没有成绩，被学校宣告退学。这时临时大学奉命内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在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的帮助下，申泮文随团至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主任的杨石先特许他恢复学籍。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去找到学校的?

申泮文：我离开南京的时候，离南京陷落和南京大屠杀只有半个月。我去长沙找我的老师杨石先。当时南开、清华、北大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也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杨石先老师在做长沙临时大学的化学系主任，我就找到他，他准许我复学了。

南方都市报：杨石先后来也是西南联大的化学系主任。

申泮文：对，他后来还任过南开大学校长，是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杨先生是我的恩师，我这一生多次受过他的直接帮助。我上大一的时候他给我们讲普通化学，那时候我成绩很好，每次考试总是全班100多学生里面成绩最好的，所以杨先生对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后来我复学也好，“文革”后从山西调回南开也好，杨先生一直都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候给我帮助。

杨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肃而正直、处事公道的人。在西南联大那么多名教授里，别的系都换了很多次系主任，只有化学系8年一直由他担任系主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仅专业强，而且能将那些知名教授都团结得好，一碗水端平。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随学校到了昆明?

申泮文：在长沙临时大学，我因为退下来的时候跋山涉水，两条腿感染了，情绪也很低落。我就在宿舍里病着，到卫生室打针，没有

参加学习，也没有参加考试。第二年学期考试我没参加，就没有成绩。学校就出了布告，把我除名了。所以到了1938年2月底，长沙临时大学要迁昆明，我没地方去了，就去找我们学校的黄钰生先生。黄先生说，那你就跟着走吧。我那时已经不算临时大学的人了，黄先生和她夫人梅美德资助我按自费参加旅行团去昆明的。到了昆明后，杨石先老师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他特许我恢复学籍。老师们给我机会，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后来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学业。

南方都市报：你们当时是走路去昆明的吗?

申泮文：当时所有的师生一共分成3路走：经济困难的、身体好的、经过检查可以步行的同学就步行去；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学校给一部分补贴，从长沙坐火车到广州，然后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现胡志明市），然后走越滇铁路到昆明。还有一部分是坐汽车从广西那边过去，这部分人比较少。

我们步行团有300人，十几位教授，全部是男的。走了湘黔滇三个省，走了68天，1600多公里，4月28号到的昆明。

南方都市报：每天走几个小时?

申泮文：有长有短，有的一天走40里，有的走60里路。最长的一天走了120里。

南方都市报：吃饭、睡觉怎么解决?

申泮文：我们队伍里有两辆汽车，把大家的行李交运。车子先走，一批人打前站，到了当地以后就找住的。我们住过路边老百姓的房子，也住过庙、学校什么的。吃的嘛，我们也带着伙夫，带着锅灶。他们坐着车先到，到了当地就买米买菜，烧好开水，埋锅做饭。我们到了就洗脚，吃饭。

我们那时虽然很穷，每天好像有8毛钱补助，但当时那个环境里钱算是很多了。所以我们路上老百姓家里有猪就买头猪杀了，就当场做肉吃。所以当时我们是天天有肉吃的。然后头天晚上伙夫做好了米饼

子，第二天就每人煮个鸡蛋，一个米饼子带在身上，当作路上的干粮。

南方都市报：到昆明以后生活如何?

申泮文：开始还是不错的。那时云南用老滇票，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有一个兑换率，滇票是不值钱的。我们每个月伙食费6块钱就够了，所以到那里去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舒服。到后来就困难了，后来物价飞涨，国民党钱币贬值，老师们都出去卖东西。我那时经常出去给昆明当地考大学的高中生做家教，谋些生活费。

南方都市报：当时联大的氛围如何？你好像写信批评过一个讲西南联大的纪录片?

申泮文：对，这个纪录片第一个对整个西南联大历史不了解。只是找了几个老教授谈谈，很多著名人物他们没有涉及。特别是光谈文科，理科没谈，尤其没谈到工学院。西南联大的工学院对国家后来的贡献是很大的。

另外一个，政治上它特别夸大“一二·一”运动。其实这是个很混乱的东西。西南联大前面8年没有外边的政治干扰，学校内部是非常和平的。学生能够自由思考，自由讨论，自由选择。所以大家能够一心一意地学习，培养出大量的人才。可等到最后的一年，抗战胜利，要回北方了。当时兵荒马乱，路途遥远，回来不容易，就停了一年。

这停了一年就发生了问题。一个是外部，重庆政府派人颠覆了云南龙云的政权。他们也带了一个特务队伍迫害联大。为什么迫害联大呢？因为联大内部也有一批陕北派来的学生。这批学生呢，也是“左”派幼稚病吧，冒险主义，在里面鼓动，挟持了全校师生，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其实没有必要，外部情况改变了，抵抗它没有必要，还有一年就完了。等于是拉全校师生做他们极“左”的人质。结果就出人命了。闻一多被打死了，学生被打死了。

我的观点啊，那是没必要的。现在强调说西南联大是当时民主的堡垒，那时是什么样的民主概念，那是大轰大嗡的，无政府主义的民

主，对现在来说没有任何可以启示的价值。

押送西南联大公物北归

1940年申泮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在川甘滇等地从事了5年的教育工作，直到抗战胜利，申泮文才在黄钰生和邱宗岳两位老师的推荐下回到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

就在当年秋天，他受命承担了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迁的公物押运工作，一路上历经波折。1947年7月，申泮文和他的同伴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跨越3500公里的押运任务，将300多吨公物完整无缺地运回平津，为西南联合大学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

南方都市报：毕业后你在昆明工作，好像有个不愿入国民党的事情?

申泮文：当时杨石先和朱汝华两位老师介绍我到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室任助理员。进去工作了3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研究室属于军事部门，要求全部工作人员集体参加国民党。我认为学自然科学的没必要参加党派，就借口说当初聘我来的时候没有说明，就拒绝了。因为这个原因我跟单位领导的关系越来越僵，后来我就趁全所的人去茶馆的时候，卷铺盖跑了。跑到兰州去找我哥哥，经历了一段动荡的生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黄钰生和邱宗岳先生介绍，我才进入南开大学化学系工作。

南方都市报：才刚进入南开，就交给你一个押送公物的任务是吗?

申泮文：对。抗战胜利了，西南联大结束了，三校要迁回北方。这个过程很长，因为旅途遥远，从1946年5月到1947年7月才全部完成。一共有两次公物运输，我就负责后面一批三校公物复员北上的联合迁运。

那是1946年7月，委派我当主任押运员，北大的王大纯和清华的黄胜涛当副主任押运员，我们一共有7个人，负责300吨公物北迁。

南方都市报：这些公物都是什么东西?

申泮文：北大和南开的主要是图书，清华的主要是工科的仪器。还有少量的是三校教职员的行李衣物。公物都装在鸠工制造的一定大小的木箱里。我们的路线是从昆明用汽车运到长沙，长沙用船运到上海，上海船运到天津，最后清华、北大的公物用火车运回北京。原来预计是3个半月完成，但是一路上出了好些意外，前后用了足足一年的时间，让我们这些天真的年轻知识分子深受教育啊。

南方都市报：遇到什么困难了？

申泮文：很多阻碍。最严重的一个事情，是当时运公物的汽车有100部，司机很杂，其中就有两个司机私运鸦片从昆明到长沙。他们把鸦片藏在公物的箱子里。我们后来才听人说，原来在昆明贩卖鸦片的人与长沙的“缉毒”人员之间是互通信息的，有“警察和小偷”之间的联盟。司机一出发，告密信立刻就传到了长沙，汽车牌号、烟土在哪个箱子里都有很具体的情报。所以我们的车一到长沙就被扣住了，很快就搜出了鸦片。这一下就麻烦了，我们每来一车公物都要接受搜查，在长沙足足扣了大半年。

南方都市报：那就一直在长沙等着？

申泮文：是啊。冬天长沙多雨，很冷，我们只好在宿舍里烤炭火聊天，我和王大纯都因为烤火一氧化碳中毒昏倒过。这还不算什么，还出了人命。清华的一个押运员叫王树才，因为半夜宪兵突击搜查他们住的小旅馆，反复盘查他，吓坏了导致精神失常。我们让他随船先回北方，但在路上他就跳江自杀了。

在长沙的时候还来了两个《湖南晚报》的记者，想敲竹杠，我没理他们。结果第二天《湖南晚报》就用头版头条登消息，说三校复员公物私运鸦片被扣押。消息出来就被《中央日报》转载，到处议论纷纷，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邱宗岳先生写信来追问我，措辞很严厉。后来我们马上去《中央日报》等几家报社，用大号字刊登启事，说明私运鸦片纯粹是司机做的，和我们无关。这样长沙的谣言才平息了。

南方都市报：那最后有没有损失公物？

申泮文：我们这一路上一共就损失了两箱东西。被查出鸦片的，一个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的箱子，里面原来都是手抄的藏经；还有一箱是清华大学工学院的仪器设备，全部设备都被拿空了，里面被司机装上了满满的鸦片。其余的物品都完好无损。等我们1947年7月终于回到天津的时候，三个学校都已经在北京和天津分别上课一年了。

援建山西大学化学系

解放后，申泮文筹建了南开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并任主任。1959年，他主动要求参加援建山西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为“申家村”反动集团。他只有关起门来搞译著，以及走遍山西对风化煤腐殖酸资源进行了普查并绘制了一张分布图。这些工作，使1977年赴太原参观访问的杨石先为之叹息和动容，并于1978年把申泮文二度调回南开大学工作。1980年，申泮文被选为中国第一批中科院院士。

申泮文还是中国著译出版物最多的化学家，已经出版专著和教科书70余卷册4000余万字，其中两部教材荣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怎么去了山西大学?

申泮文：那时是我炒南开的鱿鱼。那时的南开已经不是原来的南开了，“左”得太厉害了：思想改造运动，杨石先先生居然两次检查通不过；“三反”运动，黄钰生先生被污蔑为南开大学贪污集团总头目，被调离南开大学，还有人说是“清理了老南开”。黄先生的冤案足足30多年，我后来一直帮他奔走，1986年才平反了。坦白说，我1982年入党，就是为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

后来的“肃反”运动、“反右”斗争，各种事情都已经让我灰心了。1959年山西要复建山西大学，教育部指定南开大学理科4个系每系要抽调3位教师。化学系指定了王继彰副教授，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又拖家带小的，根本不应该去。我想来想去，觉得南开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所以就主动要求去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学校里的运动是怎么样的?

申泮文：举个例子。1955年学校里搞“肃反”运动，各单位组织学习政策。大家围成一圈坐着讨论问题。突然就有预先布置好的人大喝一声，某某人，你站起来，交代你的历史和罪行！大家没有心理准备的，就一下子惊呆了。那个被点名的也被吓得脸刷白，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严！我没被点名都被吓得心惊肉跳。我

们无机化学教研室就有一个同志无辜受审，后来发现是搞错了，但人也已经被下放到外单位去了。

南方都市报：“申家村”反动集团是怎么回事?

申泮文：山西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1966年6月份化学系打出“申家村”反动集团开始的，把一群青年教师和我拉在一起说是反动集团，我是“村长”。其实内幕我很清楚，是校党委两套班子之间矛盾的激化。所以我是不怕的，别人贴我的大字报，我也去贴，一张一张地回击，还在报头注明“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字报，你一张，我一张。”

后来“工宣队”来了，我们就进了牛棚，经常遭到体罚虐待。我从牛棚逃跑了两次，两次都被抓回来挨打。他们审问我，说你要跑到哪里去？我说：“我要到北京找毛主席告状，我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不能这样对我！”其实我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但那时候只能这样说，不然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

南方都市报：但那段时间你还是做了不少研究工作?

申泮文：那是后来了，“工宣队”查明我出身好，历史清白，所以让我恢复了正常生活。我就带着一些老师学生到乡下支援农村，推广腐殖酸肥料。我们创造了从山西的风化煤里提取腐殖酸的方法，培养了很多年轻技术员。这期间我游遍了山西，调查各地的腐殖酸资源，绘制了一张分布图。

我有很长一段泡在图书馆书库里查阅期刊，1975年在《国外科技动态》发表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化学元素周期系理论的发展》和《国际原子量的变迁》等文章。那时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在做研究，我比别人都早了一步。这些文章就被老一辈的科学家注意到了。我后来听说，钱学森先生看到了我的文章后说：“现在大家都不写文章了，写点这样的文章不是很好吗？”后来钱学森来山西，还专门召我去谈论国防科研方面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这些研究也是后来你能回到南开的原因吧?

申泮文：1977年的时候，杨石先先生到山西，顺道来看我们。他到了我家里，看到墙上挂着山西风化煤腐殖酸资源分布地图，地上堆着我刚刚出版的《无机合成》，他是很感叹的。因为那时候谁都没法做研究工作了。到了8月我就听到消息说教育部要调我回南开。后来知道是杨先生向国务院打了报告，以恢复重组南开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名义，要求调我回去。

后来1980年评选国家第一批中科院院士的时候，南开大学化学系一下就产生了5个院士，当时很轰动。我也能列入其中。其实跟“文革”那些年里我比较早地恢复研究工作有很大关系，当时就引起了前辈科学家的注意。不然现在看来，我那时做的研究，跟现在的研究者做的根本没法比。

南方都市报：你是译著最多的化学家?

申泮文：翻译和编教材我都是做得很多的。1964年毛主席发表讲话，说学生学知识越多越愚蠢，要求精简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教育部就指定我和山东大学的尹敬执主编了一部《无机化学简明教程》，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不过这本书只用了一年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教育部又组织编撰《无机化学》教材，还是我和尹敬执统稿定稿，这本书由高教社出版，后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通用的教科书。

南方都市报：你也翻译了很多国外化学类书籍?

申泮文：翻译工作占了我工作生命的近三分之一。1988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里称我是“有能力的集体翻译组织者，以快速和文字流畅著称”。我第一次翻译是1952年，当时全面学习苏联，全体化学系老师突击18天学俄语，然后集体翻译苏联教材。那时正是我胃病最严重的时候，瘦得屁股上没有肉，坐不住。我就抱个垫子去天天组织翻译。1978年高教社征求翻译100万字的英美化学教材，其他学校认为翻译要两年，我根据经验提出4个月可以完成，大家都吓了一跳。那时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翻译经验，而且手上有好几支训练有素的翻译队

伍。把所有稿子分下去翻译，最后回到我这里一个人修改整理，我们最后用了4个半月。

南开名人旧事

作为老南开，申泮文对南开的掌故如数家珍，对老校长张伯苓、名教授雷海宗等人，他都有一番自己的看法。

南方都市报：在南开那么些年，你接触过张伯苓校长吗?

申泮文：很熟悉。那时候有那种一家子很多人在南开上学的，我们管这个叫“南开世家”。我们弟兄姐妹7个人，有4个上南开中学，两个上南开大学，两个上南开小学，所以一家人跟南开关系很密切。

我哥哥大我12岁，他跟张伯苓的二儿子是同班的，他们关系很密切。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家离张伯苓家很近。我哥就经常带我们到张伯苓家里去，跟他们家人关系很熟悉。我管张伯苓的几个儿子叫“哥”。

1950年张伯苓从重庆回来，他到南开大学来访问。到化学系就是我接待他的，他一看我就问，你哥哥哪儿去了？当时精神还挺好的。

南方都市报：那时他已经不是校长了吧?

申泮文：不是了。后来有很多传说，有一个说法是1950年他到南开中学去，南开中学校长不让他进校。这是错误的，没有这回事。前任南开大学校长纪文郁向我证实的，我问过他。他亲眼看见当时的南开中学校长，带着张伯苓在校园里转。所以在我国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的南开校友里传这个事，其实是错的。

还有一个事，是传说南开校庆，张伯苓穿好衣服要去参加校庆，结果人家告诉他“你不要去了”。你想想，解放后极“左”路线，那时候哪个学校会纪念校庆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那时历史虚无主义，国民党时期的东西都是坏的，还会让你纪念校庆吗？南开大学什么时候开始纪念校庆啊，1986年给张伯苓开了一个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从这次开始才有了校庆，我管那天叫做“南开学校复兴日”。

南方都市报：您还了解哪些南开的名教授？比如历史系的雷海宗先生。

申泮文：雷海宗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时候，有一种说法：联大名师如云，但如果没有听过雷海宗、潘光旦的课，这联大就白上了。他上课的时候，200人的大教室从来都是座无虚席，窗户打开，窗户外也站满了听课的人。他讲课从来不带一张纸，讲起课来，从来不会错。后来他被打成“右派”，我还在党组织征求意见的时候表示反对，我说，雷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有待发展的论点，这是学术问题，因此就定为“右派”是不合理的。

南方都市报：他被打成“右派”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申泮文：“反右”的时候引他说话，“引蛇出洞”嘛。他就说“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马列主义呢也有待发展”，就这一句话给他定了极“右”。其实这个极“右”早就给他记下了，是从昆明来的，别人不知道，我最清楚。

那是抗战快结束的时候，外蒙古独立了。这个事情呢当时西南联大地下党的人都很高兴，奔走相告，说外蒙古率先进入国际大家庭了，率先解放了。好像等中国解放了它也就回来了。但这是根本不对的。当时我在西南联大，我好几个同学都是地下党员，他们高高兴兴，我就不同意。我跟他们争论，说蒋介石、宋子文是卖国的，为什么把好好的土地让出去？他们还跟我辩论，说我不懂政治。

后来在云南有一次反苏游行。当时苏联军队进了东北，在东北干了一些坏事。雷海宗就参加游行去了，在队伍里打着小旗子。西南联大的教授里头就他一个人参加了这个游行。因为他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你苏联为什么要割占我们中国的土地？他必然是反对这一点的。所以那时候早在昆明地下党就已经给他定了“极‘右’”。后来院系调整的时候就把他从清华调到了南开，当然这对南开的历史系是大好事。他“右派”的帽子是直到他弥留之际才摘掉的。

采写：本报记者田志凌

摄影：丁峰

杨敬年：扎根大陆，决不漂洋过海

·他曾考入黄埔军校，却两次放弃从政。

·他是牛津学生，曾有去美国的机会，但他坚持留下为祖国做事。

·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翻译与写作，翻译《国富论》时已经90岁。

·他的长寿秘诀：心态要平衡，头脑要常动，常学新东西，身体要锻炼。

杨敬年小传

杨敬年，1908出生于湖南汨罗，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1936年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45年作为第八届英国庚款留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至今。解放后，奉命创办南开大学财政系，是全国最早在大学里讲授和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之一。

著有《人性谈》、《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翻译有《国富论》、《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著作，其中大部分译于“文革”期间。

去南开采访之前，首先碰到了杨敬年的一个学生，现在是天津市的高级官员。他告诉我，一定要去采访杨先生，老先生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牛津博士，本有可能成为国民党高官；两位文化名人曾围绕他展开一场“何陈之争”；经历战乱，“文革”受困近30年；90岁高龄时译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成为畅销书，等等。

这位老学生充满崇敬之情的讲述，让我对采访充满了期待。杨敬年住的房子是南开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兴建的“教授楼”，已经很破旧。除了孙子一家，他自己的小房间里挤满了书、桌子、电脑和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床单都旧了，但很干净。墙上是去世的老伴放大的照片。我们上楼的时候，看到老人站在门口微笑地等着我们，走的时候又一直站在门口目送。

他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是：心态要平衡，头脑要常动，常学新东西，身体要锻炼。这位已经98岁高龄的经济学者，据说在两年前还每天围着学校的湖疾走健身；每天凌晨3点起床写作，刚写完一部20多万字的回忆录；会用电脑，正打算学习五笔输入法；头脑清楚，慈祥谦和，喜欢侃侃而谈。

听说我是从广州来的，杨敬年主动问我：会说白话吗？1951年他曾自动辞去南开大学财政系主任的职务，到广东南海县参加土改工作7个月，至今还记得一些粤语：“那时候我们去的一群人都听不懂，觉得简直像外国话一样，我还好一些。湖南人嘛，离广东近。”

放弃从政

1927年杨敬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恰逢大革命时期。他考进了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步兵科，准备参加革命。刚进去3个月，许克祥在湖南反共，即“马日事变”。出身贫苦的杨敬年出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朴素的感情，自动离开了黄埔军校，考入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书。

南方都市报：你是1936年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但之前好像是在国民党的大学?

杨敬年：对，我在中央政治大学读的行政系，这个系是培养学生做县长的。当时我们的毕业生就是做国民政府的县长、行政督察专员，以后做民政厅长这样一条路。但我不愿跟他们走，我准备考留学出国。那时留英庚款啊，是要求大学毕业工作两年或者研究两年相关学科，才能申请。当时全国只有南开大学招经济学的研究生，正好是两年毕业，也有奖学金，所以我就考到南开了。

南方都市报：你不想当官?

杨敬年：去国民党的学校读书，我不是为了做官的。当时考中央政治大学很难的，20个人才取一个。好多人考就是为了求个一官半职，我呢是因为它4年都不要钱，是公费，我家里困难嘛。读完了我就打算出国学习。如果当年走这条路，那我现在就在台湾了，我的好多同学后来就在台湾，都是高官厚禄。

当时中央政治大学是国民党所谓“二陈”“CC系”在控制，就是陈果夫他们。蒋介石是校长，陈果夫是管理学校的。陈果夫他们用人就是说，你得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是条龙我也不用你。我这个人脾气又倨傲，所以不愿意跟他们走。这是我第一次放弃从政的机会。后来又有一次。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后来还做过孔祥熙的秘书?

杨敬年：我在财政部当过秘书，孔祥熙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嘛，秘书有很多的，我管海关总署、统计处等很多单位。我在南开只读了一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这班研究生都没有读完。又是世界大战，好几年都没有向外派留学生。我就同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老师在重庆政府工作，先后跟着方显廷、张纯明和何廉老师，在重庆待了很多单位，其中一个就是财政部。

那时就是为了谋生，但我还是想出国，每天早晚读书，白天在办公室没事也读书。我这性格不适合做官。当时也可以做官一直做下去。那时候国民党的官分五等吧，选任、简任、委任等，我那时也差不多做到简任了，就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但我还是想留学，去读读书。所以这就是第二次放弃从政。

南方都市报：你们在南开的时候好像闹过退学，有这事吗?

杨敬年：我们这班有9个人，燕京、清华、北大、辅仁、南开，就我一个是南方来的。我来的时候，前任所长何廉刚到国民政府去任职，方显廷代理所长。我们进来以后，南开当时经济系是三天一大考，五天一小考，非常严的。对研究生也考，我们都是外校来的，不习惯这种考试。我们就要求改革，方显廷不答应。我们就说要卷铺盖走，要集体退学。当时学校采取“分化”政策，像燕京来的学生，让燕京的老师去劝，但还是不行。方显廷只好答应了，改为考两次，期中一次，期末一次。后来何廉在南京听到这消息，非常痛心啊。其实不是我带头，只是我是班代表，也可能我年纪大一点，当时我已经28岁了，班上有什么事情方显廷都找我去协调。

南方都市报：那时的生活怎么样?

杨敬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的钱都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我们每个月有50块钱补助，很不错的，当时大学毕业生也就是这么多工资。政治大学毕业的特别高一些，70元工资。当时面粉也就是两块钱一袋吧，最好的皮鞋四五块钱一双，毛料西服二三十块钱。所以50块当时是很高了。

南方都市报：战争起来之后，你是怎么离开学校往南边走的?

杨敬年：“卢沟桥事件”的前几天，方显廷有次找我，说你们这班研究生谁在天津有家？没家的跟我走，反正我有饭吃，你们也有饭吃。我们这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因为那时初到天津，每天有日本飞机在天上飞，地下到处是日本兵，老早就是那个情况，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这回是真的严重了。

所以我和两个同学就提前外出考察，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和经费，去浙江、江西和湖南三个省考察。我们到南京没几天，南开大学就被日本人炸毁了。那时何廉在南京嘛，我们就去看他。他说，既然都出来了，就继续考察吧。

我们就到杭州考察了两个县，金华和南溪，头一次在杭州碰到日本飞机。我们住的青年会在楼上，我们还到屋顶上去看飞机。杭州不是有个飞机场吗？日本人就来炸。后来我就回湖南老家了。老家穷啊，差不多没饭吃的，所以转年我就到湖南民政厅去工作，中央政治大学的人都在那里。

南方都市报：后来又去了重庆?

杨敬年：我在湖南民政厅工作没两个月，方显廷四处打电报找我，我就跟着他到了贵阳工作，每个月100块钱。后来张纯明来信请我到重庆行政院去工作，说他那里给我是200块钱一个月。方显廷一看，这待遇相差也太远了，就跟我说，你去吧，我不能耽误你前程。

我离开贵阳的时候，正是日本飞机炸贵阳，死了几千人哪。我住的房子也被炸了。我们早上坐汽车刚走，中午我的房子就被炸了，所以我就逃脱了一劫。到了重庆，张纯明安排我在行政院的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做调查员。后来又换了很多单位。

牛津岁月

1945年，杨敬年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ＰＰＥ）”。在牛津３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并于1946年率领留英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考到英国留学的?

杨敬年：留学我考了两次，1939年考第七届英国庚款，我就差0.9分没考上。因为有一项专门制作占5%，我没送。我想送它干吗？每门课多考几分就行了，没想到竞争那么激烈。钱伟长就是这一届的。这一耽误下来就是6年，因为打仗，都停招留学生了。等我出国就到了1945年，第八届庚款。

南方都市报：第八届出去了多少中国学生?

杨敬年：往届都是20多个，但我们那届庚款出去有100多个人。除了20多个庚款的之外，还有考上英国文化协会和实业协会奖学金的学生。因为之前几年都没有招收嘛，积累下来了，是国民党的教育部代为考选的。

我们1945年8月4号从重庆动身，日本还没有投降呢。坐火车到加尔各答，又到孟买去坐船，在火车上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印度我们等了两个月的船。我们坐的船是战后第一艘民用客船，用货船改造的，船上都是复员军人，我们100多个中国留学生就睡在舱底的吊铺上。

南方都市报：在牛津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杨敬年：我们每个月的补贴有30多英镑，在牛津、剑桥的要多一点，因为学费贵啊。英国有个伦敦各大学管理委员会，每个月由这个管理委员会把钱打到我们的银行账户里面，我们自己去取。钱是很富裕的，所以我们读书时没有打过工。

我在学校住过两个学期，可以说是贵族生活。从早上起来吧，就有个老头，实际上是院里的管事，给把你窗帘拉开，叫一声“GOODMORNING，SIR”，意思就说“你得起床了”。上午就有妇女来给你扫地，收拾被子。到傍晚，这个老头又来了，给你把窗帘拉上，说“GOODEVENING，SIR”，给你把被子打开；到睡觉的时候他又来了，说“GOODNIGHT，SIR”。非常客气，但实际上他在管理你，督促你按时起床、学习、睡觉。

战后大学生都复员回来上课了，人就很多了，我们就搬到校外了。但也必须在学校有登记的房东家里租房。毕业拿学位和开学典礼房东都可以去的，如果房东说你不行，你的学位也拿不到。所以管理还是很严的。

何陈之争

“去美国之前，何廉在金城银行给我留了一点金子，说：‘敬年，你还年轻。’意思是让我好自为之。”1948年杨敬年学成回国，陈序经与何廉围绕聘任他展开一场竞争。

南方都市报：你本来是差一点就去了美国，怎么又被何廉叫回来了?

杨敬年：去美国其实也是何廉叫我去的。当时他在美国讲学，跟我通信问我的情况，让我毕业后去美国，先在国会图书馆待一年。但后来张伯苓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长之后，让何廉继任南开大学校长。所以何廉又催我回南开，给我寄了500美元作为旅费，我就回来了。

轮船的经济舱必须在年初就要订，当时我订了一个到美国的，订了一个回国的。等我要走的时候，轮船公司只给我留了到美国的。他说，你都能到美国了，你还要回中国做什么呀？所以我没办法，只好找驻英的大使馆，大使馆里的经济秘书啊、总领事啊都是我政治大学的同学，他们是外交系的，都比我晚毕业。他们那里保留有两三张头等舱的票，所以我回国就很舒服了，坐头等舱回来。

南方都市报：你是先到的广州？听说陈序经想在路上截住你?

杨敬年：那时船不能到中国，因为中国正在打仗，所以英国的船是在香港登陆的。我们到了香港以后，当地报纸的报道就有我的名字了。当时陈序经在岭南大学当校长，他看到了我的名字，就找他一个香港的亲戚来找我，邀请我到岭南大学去玩。

陈序经是我的老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时候他教我们科学方法论。所以我就去了，在他家里住了一些时候，他就力劝我留在岭南大学，说岭南跟牛津的制度比较像。岭南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的地方，风景挺好的。岭南大学有三所宫殿式的宿舍，一座里住两家。他给我安排了一家住。那时岭南是拿港资，待遇也比较好。

陈序经当时刚刚接任大学校长不久。那时国民政府垮台嘛，把好多大学教授接到台湾去了。陈序经是很能留人的，他留了很多名教授在岭南。像姜立夫啊、陈寅恪啊、王力啊，还有协和一大批老师都被他留在了岭南。他也物色一些新从国外回来的青年学者，他也想留我。

南方都市报：那你怎么办?

杨敬年：我不能决定啊，因为我是答应何廉才回来的。当时何廉刚好从美国回来了，船到香港，我和陈序经两个就去香港看他，吃了一顿饭。他们两个谈我的问题，我不在场。事后陈先生告诉我说，何廉不反对你留在岭南，那500美金是金城银行的钱，我们岭南来还好了。所以我就跟着陈序经回到岭南大学。

到了秋季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时王力在做岭南大学文法学院的院长，冯秉铨是教务长，他们两人来看我，还请我在开学典礼上代表教师讲话，我也讲话了。但学生都等着开课了，我的书还在上海，从英国运到上海的。何廉叫人把我的书扣在上海，说，敬年的书慢点给他寄去。我没书不能开课啊，没办法只好又回南开了。

南方都市报：他是想逼你回去吧？后来呢?

杨敬年：后来何廉在南开也只做了两个月校长就去美国了，因为马上要解放了嘛。去美国之前，何廉在天津金城银行给我留了一点金子，说：“敬年，你还年轻。”意思是让我好自为之。金城银行其实是党的地下组织，何廉不知道，金城银行各个分行的负责人都是何廉给介绍的，都是我们研究所的同学。

何廉暗示我要走随时可以走，我当时也有护照。可是我就不想走了，我想就在天津迎接解放吧。因为我从小家里穷，我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都有一些朴素的感情。共产党胜利了，我可以工作了。我心里还暗暗高兴。

南方都市报：你回了南开，后来跟陈序经还有交道吗?

杨敬年：有过几次接触，是陈序经后来调到南开做副校长的时候了。当时中央认为，陈序经的华侨关系太复杂，让他在南方不太好，就调回来。后来给他加了很多的罪，什么特务啊的。太可惜了，陈序经死时才64岁。

我在南开跟他见过一两次，那时候我因为是“反革命分子”啊，受管制啊，我不敢到他家里去，怕给他惹麻烦。“文革”前有一次劳动，我们到各家去装玻璃，那天就到他家里去装玻璃。他问，你怎么不来看我，我说我不好来看你。后来“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们在学校蹲在地上拔草。他刚好从路上过来，说草地挺好的呀，拔掉干吗？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文革”后来的发展情况。没过几天他也受到影响了，两夫妇给赶到一个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他死那天是他爱人出去买菜去了，他心脏病发作，等爱人回来他已经死了。有病也不给他医啊。

陈序经写了很多书，关于华侨历史什么的。我在岭南大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刚回国不要去做官，要写书做学问。他给我看他写的书，那么厚的一摞子草稿。他说，我都是4点钟起来写的。因为他是校长嘛，白天很忙，所以就凌晨起来写书。我现在都是3点起来写作，就是受他的影响。

老骥伏枥

天津解放后，杨敬年被聘为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创办财政系。1957之后即被打为“右派”、“历史反革命”，遭迫害20多年。“这一搞就是20多年啊，这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候。等我落实政策的时候我都70岁了。”1978年落实政策后，在国内高校最早开设发展经济学专业课程。

南方都市报：当时没想过你可能会有麻烦吗?

杨敬年：当时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我家里都是贫农，一点钱都没有，完全是靠公费读书。“大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因为湖南“马日事变”反共我又自动离开，我想这都算光荣历史吧。在政治大学读书，是因为它公费嘛；抗战工作7年，那是谋生，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不算历史问题。我想我没有问题，可以好好工作了。

后来才发现我的看法很天真。老是追我的历史问题，说“你是国民党大学毕业的，在重庆工作过”啊，1957年“反右”时候我就成了“极右派”，后来是“历史反革命”，处理得特别严重，法院直接宣判管制3年。

南方都市报：不过解放之初你还是得到了重用，创办了南开的财政系?

杨敬年：天津解放以后，南开大学当时是军管，我也被聘为校务委员。原来南开有政治经济学院，我就在政治系教书。一解放全国大学的政治系、法律系和社会学系都取消了，南开大学的政经学院只能改成财经学院，但没有财政系呀，就叫我创办财政系，兼任系主任。当时全国各高校的人事都冻结，我想办法聘请到了财政专家陶继侃、李建昌几个老师；又跟中央财政部订合同，请部里的司长和苏联专家来系里讲课，我就带学生到财政部实习。这个系办了5年，培养了一些财政人才。最近听说要重新恢复这个系呢。

南方都市报：再往后就是“文革”了。

杨敬年：是啊。我原来是四级教授，每月拿200多块钱，法院宣判后就让我到经济系的资料室管制，每月给30多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定了100多块钱，三级资料员的工资。

这一搞就是20多年啊，这20年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候啊。从我40岁到70岁：先是“右派”，以后是“历史反革命”，劳动改造、管制，等我落实政策的时候我都70岁了。所以我又工作了20年，我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是这20年里写出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几本书都是这时写的。

那时我家里还出事，我老婆1974年瘫痪，在床上一躺就是24年；1976年我儿子又得急病去世了。所以那时是最困难的，也没什么朋友，都靠我一个人支持下来，我也算是一个强者了。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还去卖过书?

杨敬年：那时候太难了，我女儿和侄女要上学，没有钱，我就想卖掉一些书。当时天津劝业场的旁边有个天祥市场，楼上就收购旧书。可是那个书店为了好卖啊，它只收中文书，我的大部分书都是英文的，我恳请他们能收一点。后来书店同意收购，一本5毛钱，我又舍不得了。因为这些书都是我辛辛苦苦从英国带回来的，就是再苦也不能卖掉呀！后来我没卖。

南方都市报：你后悔过吗，当年没有去美国?

杨敬年：我不后悔。有好多同学问过我，当年去台湾多好啊，留在美国多好啊，少受几十年罪。但我觉得，在国内我多少还可以做些事情，到国外我个人可能好一些。我在台湾的同学都做了很大的官，做大使，做部长，做咨政。我如果去了台湾或在美国就不能给国内大陆做事情，我现在翻译了很多书，教了很多学生，我还是挺高兴了。

南方都市报：你翻译《国富论》的时候已经90岁了?

杨敬年：是呀。当时陕西人民出版社要翻译一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十本著作”，经济学方面就选了《国富论》。他们来找我，知道我年纪大了，怕我不接受。我一看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就接受了。这本

书曾经有两个译本，最早是严复译的，叫《原富》，是文言文。解放后有郭大力、王亚男他们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呢是第三次译。没想到出版以后成了畅销书。出版社也没想到，因为他们十本书里其他的印一次也就完了，这本书印了8次，发行了5万册。

之前做“右派”的时候，我也译了很多书啊。当时又不能做别的，政治上那样，别人也不跟你来往，译书也是一种乐趣吧。当时译书都没稿费，也不能用我的名字。开头译的一本《英国议会》用了笔名“蓬勃”，以后译的一本用“杨严森”，有的书就用“南开大学经济系”，最后一本《银行家》才用了我自己的名字。

链接

何廉：湖南邵阳人，耶鲁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他首创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30?代后期，何廉转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先后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团中央经济处处长。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1948年赴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75年病逝于纽约。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撰稿：本报记者田志凌

摄影：韦承金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1)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他是出版家，曾出版《随想录》、《牛棚日记》、《傅雷家书》。

他是爱书人，主张“读书无禁区”。

他爱交朋友，自称“我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

范用先生的家里有三多：书多，字画多，酒瓶多。但他的话不多，一问一答，言简意赅。

范家的门口有一简陋的木牌，上书“范用”，一看便知是黄苗子的手笔。我竟有点担心会像黄永玉万荷堂门口的“侃亭”题匾一样，为“雅贼”看中。

走进客厅，墙上有众多名家书画。汪曾祺和启功皆非以画名世，但他们的画艺在朋友间有口皆碑，我是第一次看到真迹。谈到汪曾祺好酒，范用请我看一张他和汪曾祺对饮的照片，两人面前啤酒各一杯，对汪曾祺好酒而伤身，范用言下不无憾意。谈到启功平易，范用拿当年“文史馆长”的笑话解颐。廖冰兄为范用画的漫画上说：“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此画已收入新近出版的《我很丑也不温柔——漫画范用》一书中。黄苗子的大幅书法是集前人句的对子：“且共欢此饮，时还读我书。”意境相近的是黄永玉的画，上题：“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聊。”范用说，此画黄永玉共画过两幅，边说边从门后一个普通的缸中取出另一幅，展开让我看。他说：“黄永玉觉得墙上那幅不好，才画了这幅，我却懒得换了。”我说：“墙上那幅画得随意，比这幅画得认真的好。”他笑了。

范用有一习惯，每谈到一本有趣的书，必起身到书房找出来给我看。后来干脆就带我到书房中看个饱。我深信每一位爱书之人在此，必生爱慕之心，许多版本都是难得一见，而且多是作者亲笔签名本！

书房的一角，有张伯驹先生手书的嵌名联：“范画自成宽有劲，用行亦复舍能藏。”范用说，另一张姓的张佛千先生也写过一对嵌名联，一时不知放在哪儿了，张佛千的联语为：“范水模山，胸多丘壑。用行舍藏，室富图书。”

范用家中的酒瓶也为一景：一个架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酒瓶。昔日的酒友，汪曾祺已然仙逝，杨宪益病后戒酒，丁聪受到家长管制，可能偶尔喝点范用专门带去的红酒。现在，范用喝的也是红酒。他的外孙女许月竹写过一篇《我的外公》，文章中说：“他做什么事情都快，看书快，写字快，走路快，吃饭快，就是喝起酒来，慢慢的。”又说：“外公喜欢收集酒瓶，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酒瓶，颜色不同，有大有小，大的很大，小的只有一点儿，都挺好玩，我也很喜欢。”引得叶至善撰文赞赏。

可惜，范用话说多了会气喘。谈至兴起，他要拿出气喘药来喷。言未尽兴，我便起身告辞了。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华军队在上海开火，很快中国军队就溃败西撤，逼近范用的家乡镇江。此时，范用在穆源小学读完小学，刚考进中学，外婆拿出8块银元，让范用到汉口投靠舅公。1938年开春，舅公一病不起，舅婆只好回浙江老家，临行把范用托付给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黄洛峰，从此范用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当练习生。此后，范用曾被派往重庆、桂林工作，在出版社做邮购工作时，多次收到毛泽东的秘书李六如从延安寄来的信，为毛泽东购书。1946年，范用调至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被国民党逮捕。194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新知出版社在香港合并为三联书店。范用称这11年的“三联”生活是“我的大学”。

南方都市报：你才读过4年小学，对穆源小学有很深的感情。

范用：我这一生就念了4年小学，以后就工作了，没有念过书，所以我对穆源小学很怀念。小学的生活是很愉快的，好几个老师都对我很好。我在学校里演话剧、唱歌、贴墙报。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2)

南方都市报：就是因为抗战没有机会读书了。

范用：对，我父亲去世了，我家里没有人，我16岁就出来工作了，我非常幸运，跑到汉口，碰上共产党。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吧?

范用：不知道。到1939年他们叫我入党，我才恍然大悟，这太好了。

南方都市报：在汉口的时候，你还跟后来成了李锐妻子的范元甄一起唱过歌?

范用：那时候有两个小范。范元甄唱《丈夫去当兵》，我唱《卖梨膏糖》。边唱边把糖撒下去，每个糖有一个抗日口号。

南方都市报：后来她女儿李南央写过一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很震撼。

范用：范元甄后来变了。

南方都市报：在出版社里读书多不多?

范用：出版社里书很多，都是很好的书，我是在出版社里学习成长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出版社做邮购工作，毛泽东还通过他的秘书让你给他买书?

范用：通过他的秘书李六如，给他买书。他的书单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字。他什么书都要看。有一回，他要看中国的旧小说，我给他收罗了寄去。在上海的时候我给他买杂志报纸，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他也要，通过地下的运输线，运到烟台，然后送到西柏坡给他。他一生喜欢看书。1949年9月29日，毛主席叫我们去中南海见他，一共40个人，我也去了。毛主席跟我们一一握手，我一生就见过一次毛主席。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成了朋友。

范用：我们是看书的朋友，田家英住在中南海，经常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看到书就拿走，他要看。

南方都市报：他借你的书去看，看完要盖个印。

范用：对。这个印到现在还在。（大笑）我给你看看。（进书房取书）他很喜欢看《艺林丛录》这部书，看完了又不还给我，我向他要回来了，他就盖个章在上面："家英曾阅"。

南方都市报：你还编过蒋介石的书?

范用：对。那是"文革"前一两年，上面给任务要我编蒋介石的全集。我就编，要收集资料，台湾出的、重庆出的、广州出的，我收集一屋子都是蒋介石的书，后来编了25本样本。蒋介石早年在广州黄埔军校的时候，每天晚上要到学生那里去讲话，都讲得很好的，这个人以前是很革命的。后来资料都交到中华书局还是哪里，全拿走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本很好的《蒋介石传》，应该有这样的一本书的，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知道中国有蒋介石这么一个人。从开始革命到后来反革命。

南方都市报：后来有台湾的朋友来你这儿，谈起蒋介石和蒋经国，你说都看过他们的书。

范用：（笑）我说先总统蒋介石的书我看过，现在的总统蒋经国的书我也看过，他们觉得很奇怪，我说我这个人是"读书无禁区"，都看的。越是有人反对我们，我越要找来看。人家说这个书不好，我就要找这个书来看，知道怎么不好。

南方都市报：你跟李公朴先生有一段很长时间的交往?

范用：我跟李先生很熟的。李先生很喜欢我的。

南方都市报：你还保存了一张郭沫若和李公朴他们当年在重庆被打伤的医院处方笺?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3)

范用：那是在重庆较场口，我当时就在台上，那是国民党捣乱。我们组织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会，李公朴当主席，还没有讲话，特务就跳上去，打李公朴、郭沫若，都打伤了，我把他们送到医院去验伤。整个较场口事件的材料我全有，后来很多群众的慰问信都在我这里，全部送给重庆博物馆去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还被捕过?

范用：为了《文萃》的事情，一共4个人被捕，一个是陈子涛，一个是吴承德，一个是骆何民，我。我那天发现情况不对了，去通知他们转移，特务就等在那里，我一进去就给他们逮到了。他说：“你来干吗？”我说：“我来小便。”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住过。我去前有准备的，晓得情况不妙，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他们抄了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我就一口咬定我是来小便的。陈子涛的钢笔上刻着他的名字，吴承德身上有“七一宣言”的校样，骆何民是被捕过6次了，后来他们三个人都牺牲了，现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我因为身上没有任何证据，最后组织上用了20两黄金把我救出来了。那时候国民党贪污，也弄钱。

1949年8月，范用从上海调到北平，进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后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文革”期间，范用和陈翰伯、陈原被成“陈范集团”。1970年前后，范用和陈翰伯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刊物，设想一旦有条件，要办读书杂志。1979年，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出版人办起《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文章的标题原为《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范用在《〈读书〉三百期》中回忆：“《读书》每期清样我看了才签字付印，直到退休，至今未听说《读书》有什么问题。”

南方都市报：从上海到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了?

范用：中宣部把我调来，我就一直没有离开北京了。从汉口起，我没有离开过书店，一生就干这个。全国要解放了，在香港成立三联书店。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三联书店有一段时期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了，后来独立出来，就让我当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

南方都市报：在三联书店时，你对邹韬奋先生的著作了解得多吗?

范用：我出过一本《韬奋》，韬奋是生活书店的创办人。我当小学生时就看到他编的杂志了。

南方都市报：据说在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期出版界的气氛非常好。

范用：非常好的，生活很艰苦，大家很兴奋啊！

南方都市报：“反右”的时候你没有说话，躲过一劫了。

范用：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因为我晓得是要算账的。我说我这个人是不问政治的，光拉车，不看路的。我什么意见都没有，所以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人都很惨。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跟很多“右派”成为好朋友。

范用：我的“右派”好朋友太多了。后来我说：“‘右派’都是好人。”

南方都市报：在“文革”当中还能读书吗?

范用：“文革”当中就什么书都没有，我家里的书给抄走了。不准看书，除了毛泽东语录、毛选，没别的书看。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都是“毒草”，都不准看。那时候说我就是“勤勤恳恳的走资派”，天天挨斗。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还批陈翰伯、陈原和你是“陈范集团”?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4)

范用：我们三个人被打成“陈范集团”，有一批人要保我们，有一批人要跟着他们整我们。军代表有一个联络员姓蔡的，他们那时候已经反军代表了，先“盛饭”还是先“端菜”呢？后来说，中国人吃饭是先“端菜”的，先批这个姓蔡的联络员，保我们。那时候什么事也干不了。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后，陈翰伯、陈原和你一批老先生要办《读书》杂志。

范用：我跟陈翰伯商量，陈翰伯抗战期间在重庆给我们编过杂志，我们在干校的时候就商量了，后来就出《读书》杂志。

南方都市报：《读书》第一期《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还引起很大的争论。

范用：对，李洪林写的，他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处长。标题是我改的，我这样改，干脆一些。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上面的压力大不大?

范用：压力很大的，说为什么提出“读书无禁区”？我说，我们有一个背景，是针对“四人帮”来的，“四人帮”不准我们看书，我们要打破这个禁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那些老先生十几年没法做事情了，像陈翰伯、陈原、史枚、丁聪都非常有激情。

范用：是啊！丁聪是每一期都画画，画了几十年，一直到最近摔伤了才不画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具体编杂志的有哪些人?

范用：史枚、沈昌文、董秀玉，好几个人。

南方都市报：史枚先生好像是在编辑部里有一次为一件社会事鸣不平，非常激动，回家不久就脑溢血去世。

范用：对。史枚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

南方都市报：现在还看《读书》杂志吗?

范用：我不大看，文章太长了，我看不懂。

范用的出版生涯中，有几本书常常为人提起，一本是巴金的《随想录》，一本是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一本是《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多次遭受删节，范用在三联书店出版时，一字未删，巴金写信给他：“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牛棚日记》的出版在陈白尘去世之后，书稿先被另一家出版社退回，范用和陈白尘的女儿陈虹约好见面之前，被自行车撞断腿骨，陈虹和他的见面是在病床边。《牛棚日记》出版后，范用拄着拐杖亲自把书送到陈家。《傅雷家书》出版前，傅聪依然有“叛国”之名，范用排除各种阻力，使书稿顺利出版，1983年《傅雷家书》出版后，感动了无数读者。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开始看巴金先生的书?

范用：很小的时候，我看他的《家》，《家》非常好。

南方都市报：香港《大公报》在登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时，你就已经留意到了?

范用：《大公报》删改他的《随想录》，他很不高兴，我说你拿到北京来，我给你出版，我一个字都不改！他很高兴。

南方都市报：你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开天窗》，谈巴金先生的文章被开天窗了，不敢编进书里。

范用：是四川一个出版社这么干的。这书还在，巴金的文章《“文革”博物馆》只存目，下面是空白。我在三联书店出巴金的《随想录》，我都给他恢复，一个字都不改，什么问题也没出。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5)

南方都市报：给巴金先生编书和通信之外，见面的机会多不多?

范用：我到上海都要去看他的，最后一次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的女儿叫我不要去看他，看他很难过。

南方都市报：你跟陈白尘先生渊源很深。

范用：他是我的老师，我当小学生的时候认识他。他给我看很多杂志，他后来告诉人家：“范用是我的学生。”我一直喊他“老师”的。

南方都市报：他还说你当时像个女孩子?

范用：他说：“嗳，像个小姑娘的样子。”（笑）

南方都市报：他编的剧本你还演过?

范用：他编过《一个孩子的梦》吧，梦里面打日本。（笑）因为那时候不准喊抗日。他有一剧本《父子兄弟》，我们演过。

南方都市报：后来他写的《牛棚日记》是你给他出的。

范用：出了好几本。后来我把他的书编成一大本。

南方都市报：在你编的书里，《傅雷家书》应该是最畅销的一本。

范用：嗯，印了好几百万册。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出这本书要很大的勇气。

范用：那时候傅聪不是在国外嘛，说他“叛国”。后来我找到胡耀邦的一个批示：请傅聪回来讲学。我有这个批示，这个书就可以出版了。

南方都市报：听说因为傅聪“叛国”，印刷厂的工人一开始还不愿意排这本书?

范用：都是这样的，后来我把胡耀邦的批示拿出来，傅聪回来讲课都没有问题，出书也是没有问题的。

南方都市报：你是和楼适夷先生一起坐飞机的时候知道了这部稿子的?

范用：对，稿子在傅敏那儿，我去找他。

南方都市报：先看了手稿。

范用：手稿真漂亮！后来，我把他的手稿在上海、北京、香港开展览给大家看。傅雷给儿子写信是用毛笔字，工工整整的。

南方都市报：你跟傅聪见面多吗?

范用：他回来，我请他吃饭。

南方都市报：你还喜欢设计书的封面?

范用：我不是搞美术的。因为那时候设计的封面不能用，书又等着印，我就只好自己设计封面。

南方都市报：设计书的封面时你还用了一个叫“叶雨”的笔名。

范用：“叶雨”就是“业余”的意思，三联书店正在弄一本书，是我设计的封面，快要出版了，叫《叶雨书衣》。

南方都市报：在“文革”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三联书店出的书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知识界。

范用：三联书店到现在出书还是很严肃的，不随便出书的，没出过什么不好的书，这个传统下来，到现在没有改变。三联出的书，应该说，都站得住。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6)

南方都市报：以前有三联书店这么一个地盘，可以很多人在一起聊天。现在去三联书店多吗?

范用：一个月去一回，我约10个老同志，都是十七八岁参加三联工作的，我83岁，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当中最大的90岁了。我每个月都把他们请到三联来喝喝茶，聊聊天。

范用乐于广交朋友。他曾对三联书店的同仁说：“我认为出书、卖书的人，自己就要爱书、读书、懂得书，要有一点‘书卷气’，这样才能和读者有共同的兴趣，共同语言，才能谈得来，交得上朋友。”在《相约在书店》一文中，他说：“说是退休会有失落感，我的失落感是再也不能在‘文史馆’接待我尊敬的先生、朋友们，向他们讨教，取得他们的帮助，或者随便聊聊。这种闲聊对我也十分有益，增长我的知识，使我知道如何待人接物。他们的乐观精神，更是感染了我，做人很快活。”

南方都市报：你跟很多文化人成为朋友了，应该把和老朋友交往专写一本书。

范用：我的文化人朋友多了。朱光潜、冰心、巴金、叶圣陶、沈从文、汪曾祺、夏衍、叶浅予、施蛰存、柯灵、启功、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郁风、杨宪益、王世襄、丁聪、黄永玉……

南方都市报：出版人编书时，要跟作者做朋友。

范用：对。首先跟他做朋友嘛。夏衍说：“范用哪里是在做出版社，他是在交朋友。”我说：“夏公啊，我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我一天到晚交朋友。

南方都市报：你在三联书店当总经理时，被戏称为“文史馆长”。

范用：因为我的办公室正对门是一个厕所，所以他们就叫我做“文史（闻屎）馆长”。后来真的“文史馆长”来了，启功来了，启功送我的画，我现在还挂在那儿，我给你看看。（带记者看画）

南方都市报：你和罗孚为了世纪老人郑超麟的书的出版费了很多心力，罗孚为此还卖掉了一幅藏画。

范用：就是郑超麟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我拿给你看。（进书房取书）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送到上海时是中午，但是郑超麟先生在当天上午就去世了。

范用：是呀，他没有看到。

南方都市报：以前跟叶圣陶先生的交往多不多?

范用：我常常去看他。

南方都市报：他是大出版家。你跟他儿子叶至善是好朋友。

范用：我跟叶至善也是很要好的，他不在了。我跟叶至善喝酒。

南方都市报：一起喝酒的朋友有哪些?

范用：汪曾祺、杨宪益、丁聪。汪曾祺喝白酒太厉害了，跑到四川的酒厂里去喝酒，就是喝酒把命送了。唉，我不让他喝白酒，我跟他喝啤酒。我们喝酒的照片就在那儿。我有汪曾祺的画，你看看。

南方都市报：山东画报出版社出过汪曾祺的《文与画》，他的画清雅，有书卷气。

范用：对。他字也写得好，画也好，又会做菜。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到还你家里做过饭?

范用：汪曾祺喜欢做饭，王世襄也到我家里做过饭。

南方都市报：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你去得多吗?

范用：去得不多，那个房子非常小，现在的房子好。

范用：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7)

南方都市报：我在王世襄家里，他特意拿了一封你写给他的信给我看，信的大意是：“三联书店送来《锦灰三堆》，十分欣喜。我告诉三联，《锦灰堆》是他们出书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可谓空前绝后之作。《告荃猷》十四首，感人至深。希望兄能够想得开，保重身体。”

范用：现在老朋友见面的机会不多，只好写信。

南方都市报：我看你写过，跟汪曾祺喝酒，东一句，西一句，不醉也醉，不由得想起另一位仙人——杨宪益。

范用：杨宪益喝酒太厉害了。他从下午喝白酒，一直喝到晚上，就是一杯白酒，老这么喝，不行的。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就开始喝酒?

范用：因为我的外婆卖黄酒的，我就喝喝酒。我父亲不喝酒，家里来了客人，都让我陪客人喝酒。我喝酒也只是喝黄酒，白酒不好。

南方都市报：也不跟人家干杯，慢慢地喝?

范用：从来不干杯。酒慢慢地喝，干杯干吗?

南方都市报：现在还喝酒吗?

范用：葡萄酒。丁聪喜欢喝酒，现在不让他喝了，我送给他干红，干红可以喝，每次我就带一点干红给他，我现在自己也喝这个东西。

南方都市报：看你写的《相约在书店》，丁聪每次都跑到你这儿来改善生活，很有意思。

范用：好久没有看见丁聪了，听说他摔伤了，躺在家里。丁聪被打成“右派”时候，我跟他成了朋友。

南方都市报：你还跟丁聪回过穆源小学，一起去看升旗?

范用：他说：“不是你范用，我不会到镇江这个地方来的。”（笑）穆源小学到现在有100年的历史了。1937年被炸光了，一点都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黄永玉送给你这幅画上的题字，没来你家之前，我就会背了：“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聊。”

范用：他后来说这个画不好，又重新画了一张，要我把这个画换下来，我才懒得去动它。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还有去黄永玉的万荷堂吗?

范用：好久没去了，太不方便了，去那里要花一天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还做过书签，说：“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借出去的书不还回来是不是很多?

范用：我的经验是：大部分都不还回来，都要去要才会还回来。

南方都市报：家里这么多书，以后准备怎么处理?

范用：不知道。大部分都是签名本。

南方都市报：可能中国很少有人像你有这么多签名本的书了。

范用：我的签名本太多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老朋友们在一起借书、喝酒、聊天还多吗?

范用：老朋友不大来往了，我们都老了。走一个少一个，北京的老先生就你见过的这么几个人了。我海外有一批朋友，他们都在很远的地方，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范用：1923年生，江苏镇江人。1938年开始从事出版工作，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曾参与创办《读书》杂志，主持出版《随想录》、《牛棚日记》、《傅雷家书》等。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泥土脚印》续编。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1)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实习生熊雅芳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他化学专业出身，却以漫画名世，

他曾为《观察》杂志和“人间画会”工作，曾因批评教条主义进“牛棚”十年。

他晚年致力于幽默理论的研究，成就斐然。

晚饭前，我打电话给方成先生，约时间采访。“你现在就来我家吧。”他爽快地说。“那就一个小时后见面。”我即刻回答。在这一小时里，匆匆吃饭，和摄影记者会合，赶往人民日报宿舍。摄影记者问我：“方成多少岁？”“88岁。”到了方家，出来迎接的主人看上去大约60来岁。

天热，主人光着上身，顿时没有拘束之感。交谈片刻，便觉方成是豪爽之人，容光焕发，笑声连连。问起养生之道，他介绍：每天6点左右起床，做完体操吃早点，写东西写到吃中饭，中午睡1个小时，又写到7点左右吃饭。晚上大概11点睡觉，睡觉之前看书。“我觉得忙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最好的养生之道，一定要勤动脑子，不然就老年痴呆了。”不仅事多，老朋友也多。“每年都有好多人给我过生日，有时候自己都忘记了，但会收到朋友的电话：‘你生日了啊’。”

方成喜欢到处走走，现在还经常出差：“漫画评选就爱找老头来评，而老头们除了我都不能动了。我最多的是一年出差21次。”在他看来，老蹲在家里伏案工作，很需要外出调剂一下，借此作短期休息，会会各地的朋友。如今几乎每年都回自己的家乡中山，最近一次是凤凰卫视要拍一部讲述中山的片子，请他回老家拍摄。

我想，方成身心康健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多年醉心研究幽默。他写简介，也幽自己一默：“方成，不知何许人也，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填表历来如此写法）。但生在北京，说一口北京话。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是姓孙的。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会。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

除了研究幽默，他还喜欢画水墨漫画，边说边带我们到画室欣赏他的水墨漫画。他笑道：“以前有个日本漫画家到了长城，很高兴，十几分钟画了一张长城的漫画送给我了。按礼数，我得回送他一张，这我可费劲了，我以前一直都画讽刺画，都是骂人的，这次是送人，我怎么画啊？我想到中国的《水浒传》在日本很流行，我就给人家画了一张李逵。我天天练，画了有100多张。我有很多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漫画是逼出来的，写字也是逼出来的。”在他看来，水墨漫画概念虽新，但古时已有，看似用国画的形式，实际是漫画。在他画的一张鲁智深的水墨漫画上，配有打油诗：“虎落平阳被犬欺，洒家不受这个气，做个样子讲明白，和尚不是好惹的。”

方成原名孙顺潮，祖籍广东中山，幼时曾在家乡生活过，9岁时到北京，在北京度过青少年时期。1935年亲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运动画过宣传漫画。1936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经历抗战变迁。1942年毕业，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在读书之余，方成研究和尝试漫画。

南方都市报：你祖籍是广东中山，跟阮玲玉是同乡。

方成：是啊，我们是一个村的。村里有三个大姓，一个是姓孙的，一个是姓欧的，欧家出了欧初，还有一个阮家，出了阮玲玉。中山很有意思，漫画家特别多，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漫画家有这么多的，黄苗子、梁白波，特伟、方唐……加起来有七八个吧。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是在北京长大的？

方成：我是9岁来的北京。听家人说，我本来是生在北京的，但很小的时候就被抱回了广东，在中山老家的农村待了5年。我从小长在农村，所以农村的东西我很习惯，印象也很深。后来到了北京，也很容易就习惯了，现在我也成了老北京了。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2)

南方都市报：后来读书主要是在北京?

方成：高小开始在北京读书。初小的时候就自己在村子里看几本书，偷偷认几个字，念得不多。那时候跟小朋友一起偷着去上夜学，我那时才8岁，好凑热闹，看着其他小朋友去，我就跟着去，我母亲也不知道。后来10岁在北京上高小，13岁开始上初中，接着高中、大学。

南方都市报：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你参加了，这事印象还深吗?

方成：印象太深刻了。“一二·九”的时候，我刚好念高二，是冬天，正在放假。那时候我们校学生会在学联里边有宣传的任务，需要很多人来写各式各样的宣传品。当时我们校就我一个人会画画，他们就说，你会画画，那你就去搞宣传画吧。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特别喜欢看漫画，自己随手学着画个玩儿的，还没有正儿八经画过宣传画。当时的背景是日本策划要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学生们特别恨这个，我就是要用漫画的形式来宣传抗日，反对当局用大刀来镇压学生。说起那个大刀，可厉害了，特别长，要两个手来握。其实这个大刀本来该是去杀日本人的，日本人最怕这个，近战的时候很管用。大刀队最出名的就是29军，那时候蒋介石的部队都撤走了，他们就留下来维持地方治安，那时候他们不叫警察，叫保安队，保安队“维持治安”就是用大刀砍。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还在这次运动中负过伤?

方成：你看我身上这有个窟窿，就是那时候砍的。开始我画的时候还没砍我，砍了别人。“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们学校被军警包围了，消息也封锁了，我们出不去。我们去的是“一二·一六”，也就是12月16日一早出去游行的。那天我穿了很厚的大棉袍，里面穿着厚毛衣，还带了两盒刀伤药——我知道他们肯定要砍人。刀伤药是我叔叔

给的，他是车站的站长，信佛，喜欢给人施药，很多治不起病的穷人他都给治。我带上这个就是想着到时候肯定用得着。我们学校有个女中，我们本来约好了一起游行，可当时她们已经被包围，出不来了。我们在胡同口等的时候，警察就冲出来了，要把我们也给赶走。这个过程中砍伤了很多人，有的脸上胳膊上全是伤。我被砍，刚开始还不疼，就是那个感觉，过了一会儿，越来越疼，疼到受不了。我才用手去摸，哟，一个大窟窿，满手都是血，不过还好没感染。这次伤亡还不怎么严重，砍下来的都是轻伤，重伤的不多。我这个算是比较重的，再使点劲，我这腰就断了。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画的那个漫画是什么样子的?

方成：那个漫画很简单：就画了一把刀，上面滴着很多血，标题是《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意思很明白，讽刺的就是中国人砍中国人。当时这张画就贴在我们学校门口，别的画都拿到学联去了，就我那张还贴那儿。这是我公开贴出来的第一张画。刚学画不久，画得还不是很好。那时候特务很奇怪，都穿一样的衣裳，戴一样的帽子，一看就知道是特务。我看着有特务，但我不害怕，反正就贴了。

南方都市报：从那以后，你就开始画漫画了?

方成：搞漫画真的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我们学校要出个文艺性壁报，6个人，一人负责一个栏。他们又说全系就我一个人会画画，非让我去画漫画。因为我们这个壁报是一周一期，我也就必须一周出一张画，这些画我现在还都留着的。我那时候天天琢磨该画什么东西，怎么画。就这样画了3年，完全靠自学，而且是天天画，后来慢慢地就学会了些技巧。有了大学3年练习画画的这个基础，我就改行了。原来我是搞化工科研的，后来就靠画漫画为生了。

南方都市报：你考大学的时候第一志愿是燕京大学的医科?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3)

方成：这都是受我叔叔影响，我叔叔老替人治病，我也就有了想当大夫的想法。考燕京大学的时候没考上，智力测验不及格。我那时候想，我智力不及格那就干别的吧。就考了武汉大学化学系，想搞搞制药什么的，结果大夫没考上，就搞制药，后来也搞化工科研，搞了4年。

南方都市报：你读的是武汉大学化学系，怎么就搞起漫画来?

方成：这个是老天爷规定的，一点也没有办法，一切让我非画漫画不可。为什么呢？那时候我在四川了待7年了，闷得慌，正好赶上我闹病，老失眠，晚上根本没法睡觉，到了非走不行的地步。而抗日战争也是刚刚胜利，1946年的时候，我就想去上海，想着靠画漫画也许能在上海生活下来。

在四川从事化工研究期间，方成失恋，受不了沉重的精神折磨，夜不能寐。抗战胜利后，方成辞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只身赴上海，改行从事漫画创作。其时上海为中国漫画的摇篮，汇聚了大批知名的漫画家。方成先在一家广告公司任绘图员，后应《观察》周刊主笔储安平之聘，主办周刊的漫画版，从此立足上海。

南方都市报：刚到上海的时候情况怎样?

方成：那时候在上海是很难立足的。抗战的时候人都跑了，胜利后，大家都回来了，都在找工作，所以工作不好找。刚到上海的时候没地方住，没工作，也没钱，找到一个小招待所，床也没有，还得自己去买帆布床。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有广告公司在征聘绘图员。一早我就去应聘，过去一看，一大群人排着队。有人跟我说，广告绘图员是要会水彩的，比如说要做香烟广告就要把烟盒给画出来，牙膏就要把牙膏给画出来，而且特别讲究画大美人，像月份牌那样，这些我全不会。正好来招聘的是美国人，他要是中国人我就完了，肯定不收我了。那个美国人叫我画一个试试，我就画了个漫画，他就说：“哎，就

是你了！”回头就让那些还在排队的人全走了。因为当时在美国用漫画做广告是很流行的，中国还没有，我正好赶上这个喜欢用漫画做广告的美国人了。这不是命吗?

南方都市报：后来在广告公司跟美国人还是闹翻了?

方成：刚进去公司的时候还没地方住，正好有个纸库。我就在纸上铺被子，在那住下了。纸库旁边有个办公室，那桌子还挺好的，我就爱在那里画画。一画就给《观察》，给《大公报》，都是最有名的刊物。慢慢地，登出来的就多了。后来我就跟那美国人打了一架。缘由是我画了一个连环漫画讽刺美国兵，大概意思是：一个老头看着墙上的标语，那墙上用英文写着“美国兵，滚回去！”这老头看不懂洋文，正看着，一个美国兵过来，以为这英文是他写的，“砰、砰、砰”把他揍一顿。他急了，就在墙上用中文写了一句：“美国兵，滚回去！”他自己是不懂英文的，但这么一写，正好给翻译了。晚上的时候我正好在画这个漫画，那个美国主任就来了，他一看，就把纸给抽走了。我马上就急了，要跟他打起来了，拿起一个酒瓶子就上去了。他一看我真狠了，吓倒了，就乖乖地把画还给我了。这样一来，单位我也就待不住了，我只得搬走。

南方都市报：你跟储安平先生怎么认识的?

方成：我出那广告公司的时候，正好储安平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去编漫画版，就用我自己的画。储安平搞的《观察》在当时非常有影响，每期都有十几万份，一版再版的。印象中，他是个很温和的学者，但很勤奋，跟工人们睡在一起，一样干活，送邮局、打孔他自己都做。我跟他的接触不太多，他当时是个教授，我只是个20多岁的学生，又是读理科的。他在英国留过学，有英国式的绅士风度。他平常不大说话的，我话也不多，所以只有过几次交谈，

南方都市报：储安平先生的《观察》那时候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知识界，山西谢泳写了本《储安平与〈观察〉》。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4)

方成：谢泳还问过我。储安平的《观察》有个特点，把作者的名字写到封面上去，像胡适、钱钟书，全国最有名的，都是他的作者。我那时候还不算《观察》的职员，就拿稿费，大概几十块钱吧，在当时正好够我吃饭了。（笑）我在朋友家住。没别的地方去了，我感觉他那儿还挺好的。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你在《观察》画过一个漫画，余所亚还批评过你?

方成：余所亚批评我这张画现在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给弄丢了。是画了两头牛打架，都是受《大公报》影响。我们那时候反内战嘛，说打了老半天都是老百姓苦了。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跟储安平先生还有联系吗?

方成：有啊，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当总编辑的时候又要我过去给他们画。我那时候已经在《人民日报》，去不了。他就说，不要你过来，你就给我们画一些画行不行？我说我没时间，就光给《人民日报》画已经很吃力了。他就让我给他介绍两个人过去。我就介绍两位职业画家，没两天，都划“右派”了。（笑）

1947年底，方成从上海返中山探亲，此时内战正紧，上海白色恐怖加剧，方成便去了香港，仍以漫画创作为业。此时左翼文艺家纷纷避居香港，方成结交了许多文化人，参加“人间画会”的活动。在九龙荔枝角的九华径村，方成与端木蕻良、单复同住，邻居有黄永玉、臧克家、楼适夷、张天翼等人。

南方都市报：你跟香港的渊源很深。

方成：我是1946年去的上海，到1947年底一共待了1年半，我父亲生日的时候特别想我，我就回老家一趟。完了要回上海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别回来了，现在上海很紧张，国民党到处抓人，大家都往外跑了。往哪儿跑啊？只好往香港跑了。我没了办法，只好也跑去香

港。那是1947年底1948年初，刚到香港的时候，我们还是靠画漫画为生。起先住在香港，租了个小房子，一个月100块钱。当时黄永玉在九龙住，他那时候已经结婚有孩子了，住在一个靠海的渔村里。他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过来这边住吧，你们那里100块钱，在我们这里一二十块钱就够了。而且在那里住的还不止他，有好多人，像臧克家、楼适夷、张天翼、阳太阳、陈敬容和蒋天佐两口子……那个村子叫九华径。我当时跟端木蕻良，单复3个人租一个房子，房租一共才30多块钱，分摊下来每人是10块多一点。以前一个月要100，现在10块钱就解决了，我们自己还买了煤炉来做饭。住在海边真是舒服极了，天天能游泳，还可以租船出海，就一块钱吧。我们游泳，端木蕻良不会游泳，他划船，大家一块儿玩，我每天能游个两三千米啊。游完回来后就去山上用山泉水洗澡，好极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香港“人间画会”的活动多不多？

方成：挺多啊。我们经常在一块搞画展。有时候他们也组织我们画漫画。那时候，“人间画会”的会长是张光宇，几个秘书全是共产党员，黄新波、米谷、特伟3个人。有时候要画什么画，都叫我们去。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人间画会”在香港很有影响。

方成：影响是特别的。香港本来没有政治漫画，我们过去以后，政治漫画就起来了。特别米谷画得最好，他经常有机会画这个。他画过一套小人书大概叫《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影响很大啊。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共产党怎么回事，说“共产共妻”什么的，他这套书起到了宣传作用。像我舅父都受到了影响，他是在洋行做经理的，最佩服米谷的画，经常请他吃饭。后来我们也经常画这个政治讽刺画，讽刺国民党，以前没有这样的讽刺画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会从香港回到北京？

方成：后来北京解放了，眼看全国也快解放了，我们就考虑回上海。我和端木蕻良、单复3个人一起去买船票准备回去。可运气很不好，因为吴淞口有只船沉在那里了，怕有国民党战舰进来，所有的船

都进不去了。票买了就不能退，我们在那里等了很长时间也过不去。后来，我们就只好回去了。回去的时候房租就涨价了，我们就又在那儿住了一个月。过了一阵子，听说有船到北京，我们钱没了，端木蕻良跟党内有关系啊，他想办法去了，我没什么党的关系啊，就找人去借钱。我的朋友就跟我说用不着借钱，能帮我弄到船票。我上了船，一看，端木蕻良、单复在那儿了，他们有党的关系。这个船到北京去，有好多民主人士，巴金也在里边。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5)

1951年，方成进入《人民日报》任专职漫画编辑，据他回忆：“在这段时期内，有几年配合政治运动的讽刺画，都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的错误作品。”1957年夏，方成响应号召创作讽刺教条主义的杂文《过堂》，后被指为“毒草”。“文革”期间，方成在“牛棚”监督劳动10年，其妻子陈今言遭批斗，身心备受摧残，1977年猝死在同仁医院。

南方都市报：1949年以后，你还有没有画过政治漫画?

方成：抗美援朝时期，政治漫画很重要。范长江要我们画的，他晚上开车把我、钟灵、丁聪、张光宇几个人接来，当着面给我们讲形式，要表现什么，讲完了就让我们在那画。旁边的朝鲜大使还给我出主意呢，非让我把美国人画得凶一点，再凶一点。

南方都市报：廖冰兄后来回忆，他那时候画了一些违心的画，比如画胡风是两面派。

方成：那时候是政治任务，非画不行。举个例子，“反右”的时候米谷没画，华君武就批评他：你是党员，这是政治任务，非画不行。我在旁边，我听见了。（笑）“反右”我都画了，都讽刺“右派”，后来我一直检讨。我对不住这些好同志，伤了人。那时候老实讲，也没办法，不仅仅是政治任务，我们自己也相信这个。你们现在年轻，没经历过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头脑根本都不敢想的。本来，反“右派”是违反宪法的，有什么罪一定要拿出罪证来，没有这一条啊。批评了领导，马上就变成“右派”，而且当敌人，哪有这事? 哪国都没有。可是那时候的我们头脑里没有，现在才想啊！那时候人家说反“右派”，就是要反“右派”，我们改造思想，一天到晚写检查，挖自己思想，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根本不会想，知识分子就是不行，就是落后，就是反动，自己也认为自己反动。因为他已经神化了，他说话都跟圣旨一样了。那时候大家的头脑都一样，根本都不往那儿想，没有矛盾。你说得对，我都听你的，没有矛盾，没有争执。

南方都市报：你在1957年之后的经历非常坎坷，还下放到广东阳江？

方成：是的，那是1958年。那时候社里有个规定，每个编辑都必须到农村干一年。每次政治运动第一个就抓我，因为我们组里就我是大学毕业，每次都得批我，反胡风我得检查，“三反”、“五反”都得检查。要不然没对象啊！我去农村的时候40岁，身体棒极了。后来县里下了指标，要搞亩产20万斤水稻。当时的条件根本做不了，后来就说亩产10万斤吧，可10万斤也不可能啊。过去我们知道亩产也就几百斤，我看1万斤都不可能。明明知道不行，但不做也不行。那就拼命地下肥料啊，不知道下了多少。（大笑）当然我学化学，知道怎么施肥，我打听到在哪儿搞泥炭土，就让农民把这个挑来和农家肥搅在一起。泥炭土既能吸收养料，它本身又有营养，搅拌在一起以后就跟粉一样，也不臭，起肥效果非常好。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你不能画漫画了？

方成：根本画不了，没条件，就写诗。大跃进的时候非要我们写诗歌贴板报，可我那时候哪会写诗啊，就左抄一句右写一句这么凑合。不搞不行，要贴满墙，累得要死。

南方都市报：聂绀弩在北大荒的时候就写诗。

方成：他行啊，他有本事，我写不了。我的生活一般比较顺利，最坎坷的时候是1957年划“右派”时，我写一篇杂文，是两幕剧形式的。

南方都市报：这篇杂文是《过堂》。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6)

方成：他们正在讨论小品文的危机，我觉得哪有什么危机啊，都是教条主义搞的，就写了两幕剧来讽刺教条主义。后来有人看我这戏很有意思就来演了，结果演我这戏的人全划为“右派”了。我没划，为什么呢？因为华君武是我组长，我们是朋友，有感情的，他没舍得让我戴帽子，那就划“右派”不戴帽子吧。后来“文化大革命”劳改10年，就是因为那篇杂文，搞得我家破人亡。

南方都市报：那10年劳改怎么过来的?

方成：进“牛棚”，天天劳动，一个月发15块钱饭钱，没烟抽，满地捡人家烟头。（笑）幸亏那时候报社造反派都是我朋友，都是年轻人，我们一块打乒乓球、游泳，他们对我都非常好。他们到我们家抄家抄了好几次，但什么都没动，连脏话都没说一句，贴个封条就走了。就是抓我的那个人狠，是跟我同行的，那叫翻箱倒柜啊，把东西都拿出来批判去了，抓我进“牛棚”就是他。后来我不是画了《武大郎开店》嘛。

南方都市报：就是他画得比你差。

方成：嗳，武大郎开店！后来这作品变成河北梆子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第一个太太陈今言也会画画?

方成：她也是画漫画的，原先学的是油画、国画。漫画是我教她的，她很聪明，还画过几张很好的。毛主席还专门提到过她的画，就是当年反右派反浪费的时候说的，他说，《北京日报》那张漫画你们都去看看去，说的就是她画的那张。她非常聪明，画画、戏唱、打球都好，在学校成绩也好，平常很活跃的，下班回家都是一路唱着歌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太可惜，那么早就去世了。

方成：我的老伴就是着急。她是刘仁的部下，她多少年搞地下工作的。她父亲是地主，申请入党不行，后来刘仁问：为什么不能入

党？人家说她出身不好。刘仁说，她搞了多少年地下活动了，她家是地下共产党在城里的一个据点。后来她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各种诬蔑批判，打击过重，才会那么早去世。

南方都市报：你创作最多的还是“文革”结束的时候。

方成：“文革”结束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闭幕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发表祝辞，我一听就明白这下不划“右派”了。然后我就从美术组调到国际部，请假要开画展了。我憋了太多年不能画画了，积了好多年的素材终于可以画出来了。我请假在家专心画画，让他们有事情再来找我，没事我就不上班了。我花了3个月，一共画了100幅画，都拿去开画展了。憋了十几年的画啊，以前是看到了问题比如人员不能流动什么的，可不敢画，这下一下子全出来了。那时候刚打倒“四人帮”，漫画很流行。展出的时候，很多漫画家都从外地跑来看。山东美协的人就在一边等着呢，这边画展一结束，他们马上就把画拿走了。他们一走，上海又来信了，各地都要展出，十几个城市展出，而且每到一处展览，都有大篇的评论。

方成和相声大师侯宝林相交30多年，受侯宝林启发，方成晚年致力于幽默理论研究。从1982年至今，从不间断，出版过多部著作，其中有《侯宝林的幽默》、《方成谈幽默》等。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就喜欢相声吗?

方成：我小时候就爱听，我经常跑去听相声。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听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方成：（20世纪）50年代。当时相声题材很老，而且不够用，需要创新。我喜欢听相声，就主动给他提供了一个素材，虽然他没用上，但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联系上了。这一联系，就是30多年的交情。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迷上幽默理论研究的?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7)

方成：我研究幽默理论已经有20多年了，光幽默的书我就写了10本。这都起源于1979年跟侯宝林的谈话。那天，他跟我抱怨好多演员都不懂幽默，有些包袱不会使。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这么一说，我也开始琢磨这个事，我画漫画也要碰到这个问题。我说：明儿上我家来聊一聊。我们聊了一个上午。侯宝林说：不行，咱们是搞幽默艺术的，怎么能连幽默是什么都不懂呢？我说，交给我了，我上图书馆查书去，一查书就查出问题来了，《辞海》上说，幽默是一种修辞方法。我觉得不对，我画漫画，一个字儿没有，很幽默，可没词儿。侯宝林说相声挺幽默，也不是修辞修出来的。我又去查外国翻译过来的大百科全书，什么都有，全说不对。对幽默，我自己有体会，我画漫画这么多年，也写过喜剧、小说，在人艺也演过，还写过讽刺诗、杂文，都跟幽默有关，所以我看他们都没说准。而我们中国讲幽默理论的书也都是引用外国的词，引用的也不合适。因而，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关于侯宝林的幽默就有一本书。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你就像侯宝林的秘书一样。

方成：侯宝林的事情我知道得多。我的专栏都是讲幽默，光讲理论人家不一定爱看，我就爱用杂文来写。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你都是在做幽默理论研究？

方成：我每天都写，没停过，书写了好多部了，也给报纸杂志写专栏，还到处给人讲课。去年去了美国的大学讲，在电影学院、传媒大学也都去讲。最近我到传媒大学准备讲连环漫画。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动漫发展得很快，但必须要用幽默技法，不会这个，动漫就没希望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的《三个和尚》，我们看着多有趣啊，就是运用了幽默技法。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漫画和幽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方成：漫画就是一种幽默题材，就是有点亦庄亦谐的意思，没有幽默就没有了漫画味道。所以我到处说，没有幽默就别搞漫画。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要怎么运用幽默呢?

方成：语言中可以用，文字中也可以用。我的文章中就经常用到，我没学过文学，底子不行，但我的东西还是有人爱看，正是因为我用了幽默的笔法，能让大家会心一笑。其实，无论漫画、戏剧还是文学，都要幽默，否则很难出精品。再说平常语言上的运用，你看外国的总统都非常幽默，华盛顿、林肯、里根、戴高乐，他们的演讲都很多幽默的智慧。这是一种拉近群众距离的好办法，让人们觉得他们有趣，容易接近。而中国人讲究庄重严肃，演讲都拿本子念，怕说错话。其实，幽默的语言方式是社会文明高度发展后产生的，不是直接地跟你说什么，而是说了以后让你去琢磨，比如相声里面说个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人家一听就都乐了，其实意思很明白，就是说这车太破了。这种语言方式在政治上用得很多，因为政治上有些东西不好直说，要拐着弯说。人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幽默就让人觉得轻松，哪怕批评人也不让人觉得接受不了。华盛顿有一个新来的女秘书，上班的时候迟到了。他就问她：“怎么来晚了？”她说：“哎呀，我表出毛病了。”“那你得换个表。要不然我就得换个秘书。”这意思一听就明白了，你再迟到，人家就不要你了。不是直接批评，拐着弯批评。

我现在一天到晚忙，就忙这个。像其他人讲过幽默理论的解释，我还没看过满意的。查了大百科全书，上面说逗笑的全部是幽默，这样解释哪行啊？有的说，幽默是从英国来，还有的说幽默没法解释，不能定义。好多人这么说，连萧伯纳也这么说，他本人很幽默，但他说不能下定义。所以为这我专门写一篇文章，叫《幽默定义》，登在武汉大学学报的人文科学版。我最近还准备写一批文章翻译成英文出书，我想跟外国的学者交流一下，我下的定义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来，那正好，可以交流啊。所以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的语言方式。

方成：1918年生，广东中山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后成为著名的漫画家。出版有《方成漫画选》、《幽默、讽刺与漫画》、《笑的艺术》等。还有评论、散文选集等数十种。

方平：搞翻译要像袭人那样一心一意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摄影：彭辉特别感谢陆灏先生提供支持

他致力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

他和王科一合译《十日谈》。

他是邵洵美的女婿。

采访完方平先生，我特地到上海戏剧学院校园看那座莎士比亚雕像，雕像是方平用稿酬捐赠的。和我畅谈过的这个老头儿平易得像家里的祖父，他写的莎士比亚论文，浅浅的语言，深深的道理，让我感觉莎士比亚也是一个平常人，一个值得交的朋友。

采访方平之前，我为《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所迷，在邵洵美女儿邵绡红（小红）的笔下，邵洵美的一生有许多可叹之处。而更惊讶的是，方平与邵家有解不开的缘，先和姐姐小玉相爱，小玉病故后，再和妹妹小珠结婚。为什么方平每一次出现在别人写的文章里总让人震撼呢？记得第一次留意方平的名字，并不是因为他的翻译，也不是因为他的评论，而是出现在黄永玉回忆沈从文的《这些忧郁的碎屑》的结尾。黄永玉说，“文化大革命”密锣紧鼓的期间，方平兄从上海来信慰藉，顺便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黄永玉的回信打了一个不合逻辑且经不起推敲的比方，让方平兄有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看了那个比方，顿觉黄永玉是一个天才，而“方平兄”也非凡品。

在方家雅致的客厅里，气氛轻松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先从《这些忧郁的碎屑》说起，方平说，他认识黄永玉和王世襄，都是老朋友曹辛之介绍的。黄永玉送了他好多画，还邀请他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无数山楼”玩。回忆写信慰藉黄永玉之时，方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我是靠边的群众，要编《法汉辞典》，就把我借出去了，后来就编《英汉大辞典》，跟革命不大相干。”

谈起《我的爸爸邵洵美》，方平说，邵绡红现在北京，常通电话。方平原名陆吉平，他和小珠的女儿陆玉澄，儿子陆宇清，两个名

字合起来就是“玉宇澄清”：“因为生他们时我已经40多岁了，我怕他们还没有长大我已经过世了，很希望他们姐弟俩能互相照顾，所以我考虑他们的名字是‘玉宇澄清’。”陆玉澄定居美国。陆宇清在上海，是知名摄影师，一家与方平合住。正谈间，小孙女放学回家，一点儿都不见生，在我们面前又跳芭蕾舞，又拿出她画的画给我们看。客厅有一架钢琴，是方平买来送给小孙女的。方平说，他很喜欢京剧，也喜欢西洋音乐：“我的耳朵是音乐的耳朵。”

这个如叙家常的下午，话题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邵洵美，一个是莎士比亚。方平笑道：“翻译莎士比亚一辈人很沾光的，我现在有很多莎士比亚版本。”起身带我们到书房看他收藏的莎士比亚版本：英文原版的、台湾版的、拍成电影版的。在他的书房里，朋友莎士比亚就在身边。

诗人岳父邵洵美(1)

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上，邵洵美的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出身名门，是一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你认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许多文化人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邵洵美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和杂志曾影响一代人，而他和项美丽的跨国情缘更是许多人的谈资。方平是邵洵美的女婿，据《我的爸爸邵洵美》介绍，方平先和邵洵美的大女儿小玉相爱，正当谈婚论嫁之时，小玉于1956年9月2日因哮喘病发作去世。几年后，小玉的妹妹小珠由贾植芳的夫人任敏作伐，与方平结合，方平终于实现了“娶一个洵美先生的女儿为妻”的愿望。在邵洵美晚年，方平与他交往甚深，回忆岳父的晚景别有一番滋味。

南方都市报：你原来写诗，1948年出过诗集《随风而去》？

方平：后来倒退了，就向翻译方面发展，也写一点散文，主要是赏析文章，我对比较文学感兴趣。我在上海生长，祖上是苏州。我喜欢英语，小学已经开始学英语，只读到高中毕业，没有读大学。在1949年之前，我在南京、厦门的银行当会计，解放后上海出现了许多私营出版社，介绍苏联文学、外国文学，我就离开银行，参加私营出版社“文化工作室”，后来公私大合营，合并到新文艺出版社。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样的机缘认识邵洵美的?

方平：新文艺出版社离邵洵美的家很近，我常去看看他，就认识了。他人很好，很会谈话，谈笑风生。后来我跟他的大女儿小玉谈恋爱了，小玉聪明伶俐，我很爱她，她也很爱我，我们感情很好。她身体不好，后来过世了。

南方都市报：《我的爸爸邵洵美》里说，你们已经谈婚论嫁，准备在1956年10月1日结婚。

方平：那时候我们感情已经很深了。她过世之后，我很悲痛，有20年还没忘掉她。我自己从来不写古体诗的，也写了几首古体诗来悼念她。要到20年以后才淡忘。

南方都市报：在1956年9月2日，小玉发病去世了。

方平：她气喘。这是遗传，她的妈妈也有气喘病，但是家里人都没有她这么严重。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邵洵美有没有跟你谈起他以前的事情?

方平：我是从来不问他的。也许他不愿意谈。据说他过去生活是非常豪华的，他出去坐什么颜色的车子，他穿的衣服也是要跟它配套的。（笑）这是他的好朋友跟我说的。邵洵美有时谈起项美丽，说：她学英文是我教她的。邵洵美教过项美丽写论文。

南方都市报：邵洵美和项美丽感情外面渲染得很厉害，但是《我的爸爸邵洵美》里面谈得不多。

方平：书里是避而不谈。项美丽倒是写过myChinesehusband（《我的中国丈夫》），我没有看到。

南方都市报：你起初跟邵洵美接触主要是因为翻译的事情?

方平：因为有共同语言，他后来也搞翻译了。他过去也不大翻译，后来他也没有收入，经济方面比较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约他翻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在我们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心目中是高不可攀的，你写信给他们说想翻译什么，他们是不大理睬的，好像高高在上的。他们主动找邵洵美，对他很尊敬。他也很高兴，也很认真。他翻译完了把拿来让我看看，翻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是非常难的，其中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一般人不可能翻译的。邵美洵的翻译功力我是很佩服的，他的翻译的确很好，很有才气！这给我感触很多，一般的纨绔子弟都不是这样，他也是很风流，也是很会玩的，但是他拿得出这样的作品。要是他不是生在富贵人家，而是生在一般的中等家庭，要为自己生活奋斗，他会在文学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做出更大的贡献。

诗人岳父邵洵美(2)

南方都市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形势下主动约邵洵美翻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呢?

方平：这个事情我估计是夏衍帮忙的。邵洵美跟我提到：“作家对他的firstpublisher（第一本书的出版者）是非常感激的。”夏衍的第一本书是他出版的。盛佩玉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夏衍来家里看他，对他经济很照顾。夏衍原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到北京当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离开上海之前，特地来看望他。

好像小红还提到夏衍跟周扬去看邵洵美。邵洵美没有跟我讲起周扬。后来邵洵美被关在牢里，1962年，有一次北京要开高校文科教材交流会，我们上海的周煦良去开会，会议可能是周扬主持的。在会议休息的时候，周扬问周煦良：现在上海的邵洵美怎么样？周煦良就说他已经被关押了。周扬就说：要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不必了。那么，周煦良回来以后就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汇报，马上就把邵洵美放出来了。

南方都市报：邵洵美从监狱出来以后有没有谈起被关起来的缘故?

方平：邵洵美从监狱出来，我去看他，他就说，他有一个弟弟在香港，没有钱，希望哥哥能接济他。那么，邵洵美就给项美丽写了一封信，他说过项美丽欠过他的钱，希望项美丽能寄点钱好接济香港的弟弟，我想是用英文写的。这封信托叶灵凤带出去寄给项美丽，叶灵凤把这封信交给海关了。这样邵洵美就被抓起来了，审问也没有什么证据，他大概被抓了两三年，关在提篮桥监狱，跟贾植芳关在一起。

南方都市报：贾植芳的回忆文章中有一篇《我的难友邵洵美》，谈到跟邵洵美关在一起的情形，邵洵美托他两件事：一件是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访问，邵洵美是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萧伯纳不吃荤，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参加宴会的有

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和邵洵美等人，由邵洵美付账，但是上海的报纸所有报道都没有邵洵美的名字，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希望贾植芳写文章纠正记载的失误；一件是鲁迅在文章中说邵洵美是“捐班”，花钱雇人代写文章，是天大的误会，邵洵美的文章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请贾植芳代为说明一下。

方平：我也看到贾植芳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邵洵美从监狱出来以后，生活是什么样的?

方平：可能石西民也关照他。他一出来，我们新文艺出版社就要我代表出版社去看他，请他翻译书，答应他每个月都送去200块，作为预支的稿费。他那时候关了两三年，身体不好。邵洵美跟我说，他在要放出来的时候，他们给打了很多补针，要放出来，人如果瘦得不得了，他们也没有面子。根本没有什么罪名可以交代，就不能让他太瘦，就每天给他打了好多针。出来以后，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南方都市报：以前你看过邵洵美的诗吗?

方平：看过，他的诗当然是唯美的，有感而发。抗战胜利之后，老百姓很失望，邵洵美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南方都市报：邵洵美一辈子最喜欢的诗人是徐志摩。

方平：他们是好朋友。他不大跟我提到过去的情况，我也不大问。但是偶尔提到徐志摩，我感觉他的声音有点悲伤。我自己感觉邵洵美跟徐志摩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徐志摩死得太早了，要是徐志摩多活几年，会引导邵洵美在诗歌上继续发展，让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可惜了。

南方都市报：邵洵美画过一幅画，题了：“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你见过陆小曼吗?

方平：没有，我们出版社曾经有人去看过她，回来说：哎呀，陆小曼老了，跟当年的风韵不一般了。

南方都市报：黄苗子谈到邵洵美在上海创办时代图书公司，影响了一大批人，对当时的文化有很重要的贡献。

方平：还有，他引进了最好的印刷设备，解放之后卖给北京的《人民画报》。

南方都市报：没想到他晚景会如此寥落。

方平：邵洵美要不是这么富贵就好了，他的确是有才华，感情也很丰富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和太太结婚是贾植芳的太太任敏从中牵线的。

方平：我太太就是小珠，邵洵美的另一个女儿。小珠在上海卫生出版社当校对，贾植芳的夫人任敏是她的同事，贾植芳跟我是有来往的，我也到贾植芳家中吃过饭，后来贾植芳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案子关进去了。后来任敏出来了，在卫生出版社，她鼓励小珠跟我往来。

南方都市报：以前你跟小珠熟吗?

方平：以前没有什么来往。我们结婚的时候很紧张，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

南方都市报：你跟小珠生了几个孩子?

方平：一男一女。我儿子在上海，搞摄影，女儿在美国定居。

南方都市报：小珠是在1982年病逝的?

方平：是的，我那时候在昆明讲学，我出去的时候她身体还是好的。我出去大概半个月吧，后来电报来了，说她病了，我赶紧回来，回来两三天她就去世了。

莎翁精神在心中(1)

方平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国际莎协执行理事，多年致力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他主编的诗体译本《新莎士比亚全集》，共收方平翻译戏剧21种、合译3种、叙事诗1种。他著有莎剧论文集《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莎剧论文《安东尼奥的下场》2003年获第十八届“田汉戏剧奖”。方平曾在文章中说：“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是莎士比亚的独特的艺术禀赋，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从事戏剧创作的一种指导思想。更进一步，不妨说，这份热爱人生、拥抱人生，和众生融为一体的亲和力，体现了剧作家装得下万家灯火的一种宽广胸怀——也许可以称之为‘莎士比亚精神’吧。”

南方都市报：我听陆灏说，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谈到：搞翻译就像袭人一样，侍候老太太和宝玉时都是一心一意侍候的。无论是合译薄伽丘的《十日谈》，翻译勃朗宁夫人的《爱情十四行诗》，还是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你都是一心一意地投入工作?

方平：我是一心一意对待我的工作。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因为我是爱翻译，一般翻译得不好，我也不大高兴翻译。像翻译莎士比亚，总是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扑上去。

南方都市报：第一次看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方平：第一次大概是看梁实秋和孙大雨翻译的，解放前出版。后来才看英文版。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

方平：1953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

南方都市报：在你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名家翻译莎士比亚了。

方平：有曹禺、梁实秋、朱生豪、孙大雨、吴兴华、卞之琳等人。曹禺在解放前翻译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为了四川的剧团演出的。一般我们的翻译都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曹禺是第一个拿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戏剧来翻译的，作为舞台演出。莎

士比亚的戏剧就是用来演出的，不是专门作为文学作品出版的，他是剧团的编剧，就是为了演出的。为了演出而翻译，首先要朗朗上口的。朱生豪几乎把生命都贡献到翻译莎士比亚上，很年轻就去世了，这是很遗憾的。第一个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是梁实秋，他译了30多年。当时有一笔基金，由胡适来主持，胡适请两个人翻译：梁实秋和闻一多。闻一多翻译诗体的，因为闻一多是诗人，后来闻一多没有翻译。梁实秋在大陆译了一些，最后在台湾译完。翻译莎士比亚的人命一定要长！（大笑）

孙大雨和卞之琳也译过诗体版。孙大雨是第一个用诗体来翻译，但是孙大雨后来已经老了，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卞之琳翻译《哈姆雷特》用诗体，是很精彩的。我们这个《新莎士比亚全集》是一个诗体版，我们根据莎士比亚原来诗体的格律，翻译了一个新的全集。朱生豪的译本已经没有版权了，现在有几个出版社就用这个版本，有些出版人把他的译本夸得不得了。我对朱生豪是很敬仰，但是我们的工作应该比前人更进一步。朱生豪把意思讲明白了，他的出发点也是这样的。我现在想把我这个已经出版的版本再修订一遍。

南方都市报：你原来写诗对翻译诗体的莎士比亚有没有影响?

方平：有的。原来我的诗没有写好，后来放弃了，但是对用诗体来翻译莎士比亚是有帮助的，对语言的感觉有影响。莎士比亚的诗写得很好。

莎翁精神在心中(2)

南方都市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花了你翻译生涯最多的精力?

方平：翻译莎士比亚要你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到这里来。以后还要继续花精力，有一种寄托。我翻译莎士比亚是最花精力的，但是最受欢迎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十日谈》，是1958年出的，这个很怪，1958年是政治形势一浪高一浪，这个书被一些人看作“黄色小说”，居然顺利出版了，很多人喜欢，贾植芳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对我说：我的夫人给你做媒，我很喜欢《十日谈》，想请你送一本。我当然很快就送去了。曹辛之、黄永玉等朋友也喜欢这本书。另一本是勃朗宁夫人的《爱情十四行诗》，我的许多读者朋友很喜欢这本书，有个法国的朋友专门打电话来，说翻译得很优美。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说“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

方平：“文革”结束之后，可能是1980年吧，第一个在北京公演的莎士比亚戏剧是《威尼斯商人》，广告牌很大：“指导：曹禺，翻译：方平。”那是中国青年话剧团演出的，很受欢迎，但是在《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位机关干部的来信，指责这个戏“违反公德，有伤风化”，主要是戏里男女主人公当众搂抱接吻。后来又刊出一封来信，指责这个戏的台词“俗不可耐，不堪入耳”，举例是最后一幕的台词：“天哪，我们还没有当丈夫，先就当上王八了。”我完全根据莎士比亚的原著来翻译的。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就是《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他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莎士比亚是什么样的朋友?

方平：好像每个人都向莎士比亚敞开心，而他能够把每个人心里想的话都说出来。你原来想表达而没有办法的，他替你表达了。他都了解每个人，他对人了解得非常深刻。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翻译成88种语言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要做什么工作?

方平：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活动不多，有点名存实亡。（笑）第一任会长是曹禺，第二任是我。曹禺的人非常好，他自己是戏剧家，对莎士比亚理解很深，明白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为了演出的。曹禺也跟我通信，一些英语上的问题我帮他解决，他也很高兴。

南方都市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退休之后，你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莎士比亚的翻译和研究?

方平：我退休的时候已经68岁了。退休以后也是致力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我想出一本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集。我想把莎士比亚重新修订一遍，对翻译工作得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一个字都不能放松，一字一句地琢磨过来。

方平：原名陆吉平，1921年生，翻译家。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国际莎协执行理事，2001年香港翻译学会授予荣誉会士。曾任上海师大文学院外国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青岛大学客座教授。翻译莎士比亚戏剧20余种，主编《新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十日谈》、《爱情十四行诗集》、《呼啸山庄》等。著有《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等。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1)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实习生熊雅芳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他致力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曾获“高尔基奖”。

他从事绘画，是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

他曾主编《世界文学》杂志，“文革”期间饱受磨难。

高莽先生的家名为“老虎洞”。高莽和妻子孙杰同岁，都属虎，家里摆放了各式各样的老虎模型和绘画。

在“老虎洞”里，我见到了热情豪爽的“老虎”一家。十年前，孙杰双眼失明，女儿正在巴西工作，回来探亲时看见母亲的样子，毅然留下来照顾双亲。高莽说：“我女儿是我们的厨师、清洁工、护士、秘书，还是我的‘电脑’员，什么事情都是她管。”

高莽看上去精神抖擞，不过60来岁的样子，却对我说：“我开玩笑说，除了妇科病，我什么病估计都有了。我爱人虽然失明，但身体比我好。”他喜欢给她照相，让她在花开花落之间留影，期盼着她的眼睛好了以后，看看自己失明时的样子。“这10年里，她看不到我，不知我头发白了多少，脸上长了多少斑，但我能看到她一天天的变化。所以无论我女儿多么孝顺，我还是想活到把她先送走，不是我贪图多活几年，而是想圆满地走尽一生的路。但现在看起来未必能做到，我身体不如她。”

高莽说：“一生当中有3个女人对我影响最大。”除了现在身边妻子和女儿，还有他的母亲。老太太活了102岁。母亲90岁时，高莽从干校回来，记挂着小时候的鞋、袄都是母亲做的，便亲手给她做了一身衣服。夜里，高莽见母亲屋里灯亮着，悄悄过去一看，发现她把衣服全拆了。高莽纳闷，后来实在憋不住了，一问，母亲说：“你扎的线不直，穿在身上会不舒服的。”母亲一辈子不认识字，临终时对儿子说：“我死后，在我身上放本书吧！我一辈子想识字看书。”旁边的小

曾孙说：“您不识字，看不懂书，还是给您放本字典吧！”这本是玩笑，但老太太欣然接受了。

谈到数十年的经历，高莽给我讲了冈察尔的小说《永不掉队》：“这个故事在我一生中影响很深，无论我干什么，都不能掉队。翻译上如此，当编辑也是这样。后来把我调到《世界文学》杂志，对我来说是个新的行业，我在较短时期内，掌握了做编辑的基础知识。”在《世界文学》杂志工作时，他画画的名字是“高莽”，做翻译的名字是“乌兰汗”，有读者来信：“偌大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人员很多，你们怎么找了个搞绘画的人当主编？”

离休后，高莽最大的兴趣是画画。“画画是一种陶冶。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专搞绘画，有人又问我为什么不专搞翻译，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专搞写作，我觉得这是相互的关系，可以彼此促进。”边说边请我欣赏他画的表现巴金和梅兰芳的两张大画，画中有一言难尽的故事。

1926年初冬，高莽出生在哈尔滨市。他回忆：“从我记事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饱尝的是家乡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辛酸、民族的灾难和家庭的屈辱。”期间，他入读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10年，从教科书上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和艺术。

南方都市报：你早年在哈尔滨生活，当时哈尔滨的情况是怎样的？

高莽：我1933进基督教青年会，到1943年毕业，在那儿念了10年书，这10年正处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时期，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那时候日本人通过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统治民众。东北资源富饶，日本人想吞并中国，想把东北变成他们的粮食产地和物质供应处，所以很早就派了日本浪人过来，进行暗地活动。而哈尔滨是个国际城市，很多国家的人都流亡到这里来，特别是俄罗斯人。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在东北修筑铁路，十月革命后，许多俄国人留在了哈尔滨，有白俄，也有红俄。另外还有从欧洲流亡过来的，有波兰、法国、爱沙尼亚、犹太人等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侨民。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2)

南方都市报：在1945年之前，日本人对待哈尔滨的平民百姓怎样?

高莽：特别不好。我亲眼看到醉醺醺的日本人，在马路中央一边嚎叫，一边撒尿。他们是侵略者，要改变我们的民族。他们把日本字强加到中国汉字里，把中国的文化变得不伦不类。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协和语”，就是日语和汉语混合的意思。

南方都市报：你在基督教青年会读书的情形如何?

高莽：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名义上是个教会，其实是个学校。在敌伪统治时期，我受的教育非常有限。教会学校的学习用的是外文，所以毕业出来的中国学生很多都在各地从事翻译工作。这个学校最早是美国人办来做宣传基督教的场所的，但主要教职人员是俄国人。当时汉语是作为外语来学的，因为学生主要是俄国孩子。1941年美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回国了，日本人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期，很快就投降了。我们上课基本上用的是俄文，开始还讲英语，后来全部用俄语了。到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又加入了日文。不仅我们学校，其他人办的学校都是这样的模式，以外国孩子为主，也吸收一些中国孩子。我进这个学校带有偶然性，我们房东的儿子在这个学校里读书，他说这个学校挺好，离家又近。我也就跟着上了这个学校。家长把我送进那个学校，等于把我放在一大群外国孩子堆，虽然有个别中国人，但通用语言是俄语，所以我是在俄罗斯孩子群里长大的。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挺难过的，我听我妈说，我那时回家尽哭，因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融入这种环境呢?

高莽：那时候我爱画画，父母就让我去跟一个俄国画家学画画，一方面是满足我画画的愿望，另一方面是让我去练习俄语。老师是俄国人，不会讲汉语，教画时全都是用俄文。我那时候还小，小孩子学

语言就是快，过了一段时间我多少可以讲俄语了。在学校里，我对文学艺术特别感兴趣，当时觉得文学讲的都是故事，很吸引人。当然也是由于老师讲得好。他们有个爱好文学的团体，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格雷佐夫就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他们的文学素养都比较高，善于把文学作品里的思想感情很好地传达给学生。很多俄国的寓言诗都是我幼年时从课堂上学来的，还有普希金的童话诗，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和诗歌的韵律感染了我。我在学校里打下了俄语、绘画和文学的基础。俄罗斯文学较多地反映的是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的生活，课堂上讲的也是这些内容，给我印象很深。从那时候起，我就接受了一种民主主义思想和一种自觉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被奴役人民的爱护和关心，这是我无形中受到的一种教育，对我后来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对苏联了解吗?

高莽：不了解。我们在课堂上讲的都是俄罗斯文学，讲到十月革命就结束了，讲到契诃夫就不讲了，高尔基似乎都没有讲过。外国学校对我来说有个好处，使我避免了在沦陷区接受更多的日本奴化教育。日本就想把中国人、朝鲜人都变成他们的奴隶。但我在外国学校，有很多外国人，奴化教育就行不太通。同时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接触不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脱离，这是我到后来才意识到的。比如绘画，我小时候是跟俄国老师学油画，油画本身有一套理论，讲科学，讲透视、光暗面、距点、地平线等。我接受西洋画法以后，对国画就排斥了，觉得国画透视不对，又没有阴暗面，画人体也不讲究解剖学，一直到我50岁才渐渐理解中国书法和绘画的不同寻常的意义。

1943年，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刊出了高莽的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他开始了多难又多彩的翻译生涯。抗战胜利后，高莽在中苏友好协会工

作，翻译了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由此也找了终生的爱人孙杰。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3)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样走上翻译道路的?

高莽：我在学校没学到过中文，但我学习从事翻译挺早。我非常欣赏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觉得很美。1943年，我17岁，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读了他的散文诗，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其实远不理解该诗的深层含意。屠格涅夫晚年远离祖国的生活背景，跟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受奴化毒害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感受到俄罗斯语言的伟大，让人着迷，给人以力量。那时候，我认为能看懂，拿起笔能用汉语写清楚，就算是能翻译了。可翻译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越到后来越觉得不简单。我是越来越不敢翻译了，因为觉得看着文字都懂，可文字深层的东西就体味不出来。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剧本也好，这些文字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方面我有很多教训。

南方都市报：有什么样的教训?

高莽：那时候觉得能看懂俄文作品，能把作品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就是翻译成功了。投稿，发表了，得意洋洋。直到后来翻译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才发现了问题。那是1948年，剧本中全部是人物对话，对我而言翻译对话比较容易，因为我的小时候跟俄罗斯同学们讲话一直用俄语。剧本翻译好了，在当地演出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这部话剧时，发现里面有不少东北土话，尽管编导已经改了很多，但仍有东北腔调。这时我才明白：语言是种艺术，搬上舞台更要注意语言的文采，外国剧本不能变成中国地方戏。

南方都市报：后来如何提高自己的水平?

高莽：翻译确实不容易。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一种科学，一种艺术。我有过很多教训。1947年，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举行了一次苏联图片展览，参观的人很多。从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看过之后说我翻译的图片说明语言不纯。

我知道自己中文功底薄弱，但没有想到语言的纯与不纯。这件事情给我敲了一个警钟。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阅读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不仅读，而且还琢磨和研究遣词造句，并开始有意识地注意表达方式。草明的批评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让我在中文上下了一番苦工夫。

还有一次教训，是30年后了。1951年我出版过一本译著：《龚查尔短篇小说集》。“文革”结束以后，我把这本小说集补充了一些篇章，再次出版。有一位女编辑看了以后，说：“高莽，你的文字30年没有进步。”我一想挺奇怪，我一直搞文字工作，怎么还说我没有进步呢？她指出我用词造句方面的毛病，译法缺少技巧，文字缺少时代感。于是我专门认真学习我们一些老作家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经验，他们是怎么理解原著，怎么进行翻译，怎么运用汉语来表达原文精神的。我很用心，花了一段时间，我不仅承认自己没有进步，而且发现其他缺陷。在那以后，在翻译上走的路稍为平坦一些。1979年我收到巴金先生的一封信，他说：“您的俄文好，中文好……”“为什么不同时译几本沙俄小说呢？”我所崇拜的老作家对我的鼓励和文学的肯定，让我由衷地感动和欣喜。我更意识到文学事业上无坦路，今后需要更加努力。

南方都市报：1948年，翻译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高莽：那时候我在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哈尔滨当时是解放区最大的城市，靠近苏联，党的力量能在这里扎根。中苏友好协会以群众团体的形式出现，实际上还做很多工作，其中有一条是改造再教育一些受奴化影响和有正统思想的青年。所谓正统思想观念就是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日本投降以后，哈尔滨有的青年盼望正规军，也就是国军来接收敌伪政府。国军穿的衣服都是正规的，八路军穿的是破棉袄。我那时候既受过奴化教育，又有正统观念的影响。我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是因为我会俄文，追求进步，向往美好的世界。中苏友好

协会领导下有书店，有电影院，有合唱团，有各种文艺组织。我什么都参加。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4)

我给电影院画广告，给书店画插图、画封面；给合唱团译苏联流行歌的歌词，反正什么都干。我的办公室和睡床都在一个屋里，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什么时候喊我，什么时候就去工作。那是个革命浪漫主义时代，工作热情很高。

我还管理过友协的俄文图书，那些图书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给友协的。有一天我发现有一部剧本叫《保尔·柯察金》。那时我还没看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一看那个剧本，很震惊：天下还有保尔式的人！完全崭新的一个人物形象出现在我面前。从年轻的时候献身革命，为人类解放事业进行艰苦的斗争。他当过工人，红军战士，打过仗，负过伤，身体残了、眼睛瞎了，还坚持革命事业。这对我来说是太新鲜了，我没见过这样的人，过去见的尽是些世俗的人。所以看过剧本以后，就非常喜欢保尔这个人物。我把剧本译成了中文。我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打算，也没想到这是一部特别有影响的著作，纯粹由于喜爱。我的译文很快印成了书。我也没有想到这是我最早翻译的一本作品。哈尔滨教师联合会文工团有人看了以后，觉得很好，决定演出。演出非常轰动，因为这是在中国大地上演出的第一部革命作品，过去在上海、广东等地也演出过俄罗斯的话剧，但是像这样富有革命思想的剧本，恐怕还是第一次。当时大街小巷都在谈论保尔，哈尔滨青年掀起学习保尔的高潮。

南方都市报：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你的爱人孙杰?

高莽：是的。她当时是哈尔滨马街小学分校代理校长，她在《保尔·柯察金》剧里扮演的冬尼娅。她来我们中苏友好协会，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要演出苏联革命戏剧，而她完全不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我接待了她。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给她讲了，包括生活习惯、家居摆设以及服装等。我记得我还把案头上的一尊列宁雕像借给了她的演剧组，还有一件乌克兰的衬衫，反正能提供的东西都尽量给她。就这

样，我们认识了。但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保尔·柯察金》是我翻译的。认识以后，就越来越熟了。新中国一成立，她就想到北京考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得到市教育局负责人的批准。她来到北京，到中央戏剧学院报名，有关人员看了她简历，知道她演过戏，还扮演过一些重要角色，就让她直接参加了剧团。新中国刚成立，需要的不是学员，急需的是工作人员。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谈恋爱了吗?

高莽：那时候已经有感情了。我那时已调到沈阳，在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她从哈尔滨路过沈阳去北京时，我在沈阳接待了她。我们之间多少有了一些苗头，但还没有明确关系。1953年，我出国回到北京后，代表团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是演员，大伙就说，趁着代表团还没解散，干脆结婚吧！大家这样一起哄，我们就成了夫妻。婚后，过了没几年，1957年底到1958年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夫人赖莎来到中国。那时候我已经在北京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外联络部工作。我是代表团的翻译。赖莎得知我翻译过剧本《保尔·柯察金》，而我妻子演过冬尼娅，就想见见我妻子。我妻子来了以后，赖莎拉住我们俩的手，看了半天，说：“我祝福你们，要记住，我是你们的媒人。”还送给我们一张照片，背面写着：给高莽、孙杰，希望你们的生活幸福得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微笑那样迷人。以后她给我写信、寄书，都署名“你们的媒人”。老太太很富有幽默感，懂得人生乐趣。她向我国青年人做报告时，特别轰动。我记得在北京大学，在中山公园礼堂里，大家的掌声使地板都颤了。

还有一次，我给苏联女英雄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做翻译。她一上台就对着中国观众说：“我的黑眼睛黑头发的儿子们和女儿们。”她的话刚一传到听众中，大家的眼泪就“哗”地流了出来，我也就控制不住了，哭了，翻译不下去了。我知道，做翻译不能随着演讲者的感情而波动，我可以尽量地表达她的内心感情，但我不能哭，这就耽误工作了。所以这对我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5)

南方都市报：在你的翻译工作中，戈宝权先生给了你很大的启发?

高莽：戈宝权先生是我的前辈，我的师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派戈宝权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他路过哈尔滨，看到哈尔滨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撰写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他特别细心，就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要跟大家交流交流。我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他说：“你们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啊？约好了时间开会怎么没人来？”我就问他还有哪些人，他把本子掏出来给我看，又把人名读了一遍。我说人都到齐了，因为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不想做翻译。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这个印象很深。我怎么能去干这个职业呢？可是我自己又喜欢俄罗斯文学，又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以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宝权先生。他讲了一些道理，然后概括成两句话，大意是：关键看我翻译的是什么东西，是为谁翻译的。这两个问题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翻译？之后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就改成了笔名“乌兰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20世纪50年代初，高莽从东北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作为翻译人员，高莽有机会多次随代表团出国，接触到中苏等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也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后工作了27年，从一般的

编辑到主编，1989年离休。期间，翻译工作给高莽带了许多苦难和思索。

南方都市报：你还记得第一次去苏联的情况吗?

高莽：我第一次去苏联是1953年。过去我只是从文学作品中、电影中和报刊上知道苏联。记得莱蒙托夫写的《莫斯科全景》一文曾使我着迷。很想看到那里的克列姆林宫，看到红场，看到列宁墓。第一次见到独具特色的大教堂，听到那悠悠的钟声，看到匆匆忙忙的行人，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那里的大街宽阔，广场上耸立着各种历史人物的纪念碑。街上的汽车都是国产的。那时对苏联、对莫斯科充满幻想、充满希望，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国家。那时，我们住在豪华大旅馆，外出有车接待，苏联人盛情、真挚、友好。

多少年后，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才知道当时的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从外表上没有看到生活。

俄罗斯人朴实直爽，文化修养高。这可能与俄罗斯19世纪文学艺术的高峰对人们的影响分不开。俄罗斯民族不管生活多么艰苦，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后来，我发现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要深得多。我们有些人可能不懂俄文，但看过俄罗斯的小说、苏联电影和戏剧等。他们的年轻人对中国情况，很少知道。

南方都市报：20世纪50年代，你多次随中国代表团访苏，又多次参加接待苏联代表团，可曾发现两国人士之间有不同的观点?

高莽：那时，苏联是老大哥，处处向苏联学习，交谈以友好为主。但也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比如，1955年10月，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率团来中国。有一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接待了他。茅盾当时兼任《译文》杂志的主编，他提到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苏尔科夫作为苏联作家，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界领导人物，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抱有很大的成见，他就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海明威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

有天壤之别。另外，《老人与海》写的是一个渔夫在大海里与鱼搏斗的情形，他认为这是个人主义，这个小说对青年读者会有负面影响。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6)

茅盾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人的坚韧和勇敢。茅盾那时候就已经没有唯苏联是从了，没听从他的那一套，很温柔地说：我认为这个作品是好作品，我们要发表。苏尔科夫就坚持认为这个作品不宜发表。我们发表了这篇小说。多年以后，苏联意识形态起了变化，才发表了《老人与海》。这说明在认识上，我们的作家在很多方面并不比苏联老大哥差。同样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文学家，但茅盾看得更深更远，他看文学作品不仅是看阶级属性，更看其文学特征和思想内容。

南方都市报：后来，中国和苏联关系变化以后，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高莽：有影响。开始是什么都好，忽然苏联把专家撤了，意识形态发生了分歧。中苏两国人员来往大大减少了。两国的分歧由不点名地相互批判，转向指名道姓的攻击。我们接触苏联人也往往进行一些争吵。

那时，凡是苏联肯定的文学作品，我们就斥之为修正主义的。《世界文学》批判修正主义时就不再登苏联的作品，批判帝国主义时就不登英美的了。后来只剩下亚非拉国家的，那些作品水平差些。有一段时间我们编辑出版过黄皮书，为反修提供资料，黄皮书中登载的作品过了若干年又作为红皮书来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批修的余波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刊登苏联作品时，还附一篇批判文章。

南方都市报：你在“文革”中受过冲击?

高莽：“文革”以前，凡是工作过的知识分子，谁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过冲击？更何况我长期作翻译，给赫鲁晓夫当过翻译，给刘少奇当过翻译，给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们做过翻译。红卫兵、造反派、军宣队让我交代跟他们的反动关系。我只是为他们作过翻译，是工作关系，有什么反动关系？他们说我是“苏修特务”，还拿照片让我把照

片上的人逐个逐个地写他们的反动言论，有的照片上有三十几号人，我怎么写？以前我挺喜欢搜集照片的，从那以后我就把我出国的照片全烧了，我怕他们从我身上找到的照片来交代“罪行”，我说不清楚。这种诬陷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曾想过自杀。多亏妻子一直在身边劝慰我，她说人死了，很多问题就更说不清了。她是对的。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事，她的外号叫“小鸟”，调走了，大家都给她写信，我也给她写。我画了一群鸟，各种各样的。后来军宣队拿着这封信要我来交代，说我下命令让她逃离大陆。本来是同事间的玩笑，怎么说得清？那位女同事家里有人在香港，她也申请过去香港探亲。这与我有什么关系？硬把她要去香港的事栽在我的头上，说是我给她下的命令，让她逃离大陆。还不止这些呢，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家是我避风的港湾，在这港湾得到很多安慰。不然在单位上批判你，回家再批判你，就真活不下去了。

南方都市报：20世纪80年代再去苏联，你看到的苏联有没有什么变化？

高莽：80年代以后我几次去苏联。苏联解体以后又去过俄罗斯联邦。我是在相隔20年后再去莫斯科的。莫斯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建了一些高楼，增加了不少新的纪念碑，特别扎眼的是教堂都进行了修葺，变得崭新。莫斯科一些高楼上出现了日本、韩国及西方公司的广告牌。街上奔驰的也尽是外国的轿车。社会两极分化比较突出。青年男女的衣着变得时髦了，可是街头上，地铁通道里出现了不少衣衫褴褛的老年妇人在兜售家庭的用具或服装。她们显然是穷了，但出售身边的货物时，保持了人的尊严，不投机取巧，也不低三下四。

意识形态混乱，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我觉得青年当中民族主义意识在扩大。文学艺术方面正处于转换时期。过去被禁止的作品大量出版，流亡到国外的文学艺术家的作品纷纷回归，加上无选择的开放，什么性质的书都出版，使人们的头脑有些混乱，出现了一种多元化文化。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7)

我熟悉的老朋友所剩无几，新的一代人对我国更是不了解。有人还用“文革”时期的眼光看待我们欣欣向荣的今天。他们的媒体在报道我国现状时，做得很差。

南方都市报：在俄罗斯作家里面，有没有给你印象深刻的人物?

高莽：有。比如女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她命运多舛，生活坎坷，但从来未停止过创作。1948年，我翻译过一篇批判她的报告，批得一塌糊涂。想象不到那时候苏联党中央会这样直接地去干预一个作家的创作，骂阿赫马托娃是“半尼姑半婊子”。她早期有些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心理，对爱的幻想和破灭的感受。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她的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被枪毙了。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诗人，“白银时代”的一个首领。多少年后，为她平了反，说她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反苏联的话。阿赫马托娃的第二、第三个丈夫也是或被关押，或被长期监禁，她儿子也被关进监狱。三四十年代她写了《安魂曲》。在苏联表面强大、繁荣、光荣、幸福的情况下，她胆敢写出关于苏联监狱的作品，这是需要有远见有才气的。那时，她写了下诗句却不敢留底稿，读给人听后便烧掉。所以，她有些作品是别人的记忆，后来给她整理的。1948年，我是从负面认识了她，觉得她就是一个该批、该骂、该唾弃的堕落颓废的女诗人。1954年苏联召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时，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那时候没遇到她，我想如果遇到了她，我恐怕还会抱着苏联党中央决议的精神来看待她。“文革”以后，很多外国图书开放了，我读到了阿赫马托娃的原作，发现她是那么出色的一位诗人。所以，我老觉得良心上对她有愧。我开始翻译她的诗，越译越多。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译过李清照的词，翻译得很好。她不懂中文，她根据汉学家逐字的翻译来安排文字。她还翻译过《离骚》。《离骚》是汉学家费德林逐字逐句译成俄文的，然后请阿赫马托娃艺术加工，将译文润色，这是非常难得的。多少年后，我有机会来到她

的墓前，献上鲜花，倾诉了自己的遗憾。我还为她画了一幅大的肖像，题名为《白夜》。

文学翻译和创作之外，高莽还从事绘画。他说：“绘画是伴我一生的业余爱好。”1949年，高莽创作的讽刺漫画受到批判，华君武曾对他说：“我扼杀了一个漫画家。”他则说：“你救了一条人命。”而后，高莽着力于肖像绘画，其中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肖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巴尔扎克、井上靖等人的肖像为国外文学馆或纪念馆收藏。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迷恋上绘画的?

高莽：我从小就爱画画。我记得小时候看小人书，根据小人书上的人物画出来，再一个个剪下来，摆成一排，调换地位地玩。后来跟俄国老师学画，先后跟过3位老师，一位是学校的老师，挺有名气，但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他不大醉心于教课，他醉心于自己的创作。一位老师教我基础的知识，怎么做画布，怎么调油彩，主要教我临摹。他本身是一位临摹画家，哈尔滨有的宾馆、大电影院挂的一些俄罗斯名画都是他临画的。还有一位是比较有名的画家，对我影响最大。他教我写生、创作等。这位老师是我主动找上门的。他看了我的作品，就把我安排在大班里。几个学生聚集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学生做模特，坐在不高的台上，大家就画他。老师在旁边指导。画完了以后，这个学生模特可以在我们中选任何一幅作品归他所有，作为对他的报酬。

南方都市报：我留意到，你在绘画中与普希金的形象有不解之缘。

高莽：1937年是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在哈尔滨俄罗斯侨民们举行了一次很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们学校是一个文化中心，纪念活动就是在我们学校举行的。大会上有报告，有讲演，有朗诵，会后还有演出，演出了普希金的诗剧。我那时候还是孩子，上了三四年的课，那次纪念活动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8)

由于我那时候学过油画，老师就让我临摹一幅普希金的肖像。我画了以后挂在教室的墙上，上课时我总是偷偷看它，觉得普希金在跟我说话。我那时就想，长大了一定要画一幅我想象的普希金。过了几十年，我画了一张又一张的普希金肖像，还画了一套由12幅画组成的组画。1999年在他诞辰200周年时，俄罗斯请我去参加盛大的庆祝活动，我把那组画带去了，展出了，把另一幅大的《普希金在长城上》送给了普希金博物馆。这幅表现的是我想象中、理解中的普希金。普希金曾经迷恋过中国，他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周围有一些仿中国式的楼阁。欧洲有一段时期特别迷恋东方文明，客厅里摆些瓷器，学得不像，显得不伦不类，但说明他们对中国向往。普希金有一段情绪低落时期，想随同俄国传教士一起来中国。这就成了一个源头，让我把他和中国联在一起，我这张画给普希金博物馆馆长的时候，他愣了一下，说：没想到普希金到过中国。我给他解释，是我把普希金对中国的向往表现在这幅画里了，是现实和浪漫的结合。诗人李瑛在画上题了一首诗：

未了的心愿已成历史的隐痛

至今，不朽的诗句仍在叩敲长城

有的如长风浩荡

有的似山草青青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画过漫画，还出了事?

高莽：我画过漫画，那已是快60年前的事了。华君武、蔡若虹还批过我。1949年，我为哈尔滨市青年团《学习报》画了7幅反浪费的漫画，刊出4幅。开始大家都反映挺好的，后来不知那位同志写信给市委宣传部说：那些漫画丑化人民，画的作者思想立场有问题。开始追究责任，把我给拉出来了。新中国成立了，《文艺报》根据那封信开了研讨会，委托华君武、蔡若虹撰文批判我。《文艺报》从第一版到第

八版都是批我的，还有我的检讨、报社的检讨、读者的来信，并附了我的4幅漫画。所幸那时候是刚解放，批得还不厉害，在我之后开展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玲、批判“陈企霞反党集团”等等，步步升级，那就要命了。即使如此，对我的打击也是挺大的。那时我还在东北，还没到北京来，领导看到中央的报纸在批我，便让我检讨，我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受的教育是教会学校，生长在敌伪，反正什么都不好。从那以后我学乖了，再也不画漫画了，若讽刺就讽刺帝国主义。我跟华君武关系一直很好，他跟我说：“我扼杀了一个漫画家。”我说：“你救了一条人命。”要不然的话，凭我那点小聪明，一直画漫画的话，肯定会出大问题，那些运动里面我不去画漫画才怪呢。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后来我有几次机会和丁玲、蔡若虹一起出国，我老想问问他们为什么批我，但都没好意思问。最后有一次我去看望蔡若虹老先生，他说不记得批判我的事了。2000年华君武写了一篇《老友高莽》，检讨自己对我批评有些过头，最后说：“可见批人容易，批己难。”

南方都市报：受了这次教训之后，画风有没有变化?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9)

高莽：受了批判之后，我再也不画漫画了，再也不进行讽刺了。我只画美化人的作品，歌颂性的作品。记得我母亲说过：“画男人要画年轻一些，画女人要漂亮一些。”她的话非常灵验。凡是按她的标准画的肖像，都会得到好评。但有两位大学者对我说：“按你母亲的要求作画，不会有好的作品。”他们的话很有分量。美化现实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文革”期间，我们下放到农村，除了马恩列斯毛的作品，其他什么书都不让看。偶然一个机会我得到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回忆录。我发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人情、亲情、爱情，而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得什么情都没有了，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时代。这些感触促使我通读了马恩著作，并画了马恩两家人，后来扩展到他们的战友们、他们的事业。我当时想画50幅，因为身体不太好，我估计只能活50岁，结果画了57幅，看起来还能多活两年。我在干校里躲着在蚊帐里画。回来后接着画，一共画了7年，画完了以后给美术出版社的人看，他们说好，就给我出版了。组画曾在中山公园展出，各种媒体都作了报道，观众反响甚好。后来我较多地画了画作家肖像，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几十年来，回头一看，都没想到自己画了那么多肖像，仅中国的作家，有他们签名的，我就画了200多位，俄罗斯作家也有100多幅。

南方都市报：你原来在学校接受的是俄罗斯的绘画教育，后来对中国绘画又有新的认识，这对你的绘画有什么影响?

高莽：我十几岁开始学画油画，画了40多年。后来我妻子对油画颜料突然过敏起来，我就抛弃了油画，开始画国画。我妻子最初认为绘画不是我的正业，不应当占用那么长时间和精力。她对我绘画的理解是因为碰到一件事，使她改变了看法。有一次，她带一个艺术团去美国访问，那时候中美还没建交。她作为团的工作人员，要编一本演出说明书。她编了以后，我觉得太死板，就给她加了几个小插图。最

初她还不肯用，说领导没有这方面的指示。后来他们领导看，还挺满意。到了美国，美国接待人员问她：这个画画的人来了没有，想跟作者认识一下。我妻子没想到这小配图居然能引起西方文艺界的重视。后来艺术团去香港访问，香港重新印刷这本说明书，我的小小配图就不是配图了，印成一个整版。这时我的妻子对我才刮目相看，觉得我的画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为了妻子，我放弃油画改画国画。这时我才慢慢了解国画的深奥。中国的笔墨纸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画国画必须要有很深的文化根基。有一位外国画家朋友来了，想试试用毛笔作画，不行，一抹就是一片黑。中国画超越了焦点透视、阴暗等，没有足够的中国文化修养，是画不好国画的。我在这方面有很多欠缺，我在努力学习。

高莽：1926年生，哈尔滨人。毕业于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长期在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及其所属单位工作，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有《久违了，莫斯科！》、《灵魂的归宿》、《圣山行》、《俄罗斯美术随笔》、《文人剪影》、《心灵的交颤》等；译有《保尔·柯察金》、阿赫马托娃长诗《安魂曲》、鲍·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体自传《人与事》等；在绘画方面，画过许多文学家肖像画，为国内外文学馆、纪念馆所收藏。曾获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称号、俄罗斯作家协会“高尔基奖”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授予的“友谊”勋章。

何满子：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摄影：彭辉特别感谢陆灏先生提供支持

他外号“江湖散人”，却因文章屡屡惹祸。

他遵行“三不主义”：不做官，不随人俯仰，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

他笑称:“我的生命从60岁开始。”著作等身。

何满子小传

何满子，原名孙承勋，1919年生，浙江富阳人。曾任记者、编辑、书店总编辑、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早年从事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音乐、戏剧研究，后致力于古代小说、文化思想史研究；也从事杂文写作，曾获首届鲁迅杂文奖。著有《论〈儒林外史〉》、《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古代小说艺术漫话》、《中国酒文化》、《画虎十年》、《如果我是我》等。

何满子先生的书房名为“一统楼”，取意鲁迅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安静的“一统楼”临近繁华的上海徐家汇，这里不仅是读书写作的地方，还是客厅、饭厅、课室。房中挂着聂绀弩、赵朴初的字，陈从周的画，一件件说起来有亲朋同乡之缘。

由聂绀弩的字说到他的旧体诗，不免感慨。何满子曾写诗赠聂绀弩：“先生越老越风流，千首诗轻万户侯。不独文章惊海内，更奇修炼出人头。”回忆起来，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就认识了，聂绀弩当时在《桂林日报》当副刊编辑。“‘文革’结束后我们才重新见面。他吃的苦比我们多。他后来不写杂文，写旧体诗，其实诗也是杂文。”何满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号“江湖散人”，笑道：“聂绀弩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

这位“江湖散人”，曾经阐明处世的信条：“要我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这是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从我进入人生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了三条。也可说是‘三不主义’吧，我始终遵行着的：一是不做官，神气一点叫做不羡权势；二是不随人俯仰，高攀一点叫做坚持独立思考；三是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这条大概没有什么好名目可攀附，只是图个尽量少受约束。”如今回望数十载风雨，还是没有躲过天地间的罗网。

拥有一个安定的晚年，在“一统楼”中教书和写作是何满子的乐事。早些年给研究生上课就在这个书房里，一直到70多岁时才不再带

研究生。何满子感慨多年的运动把文化切断了：“我们这一代以后没有机会念过什么书。文化一代一代传下来，名师才能传高徒，不然越教越坏。”曾经，他每天要写一篇文章，近年慢慢减少写作。

何满子晚年写得最多的是杂文，文风犀利，自称“常青筋暴露，偏激浮躁，极欠蕴藉”。然而，跟他漫谈了半天，却感觉“人不如其文”，这是一位忠厚可爱的老头儿。谈话中，他烟不离手，笑道：“医生叫我不抽烟，我还是抽。我原来喝酒很厉害，现在戒酒了。住了一个月医院，医生说，你再喝酒的话，就不要来了。”我笑着提起：“吴中杰的文章中说，你跟章培恒喝过三次酒，都被打败了。”他忙道：“不是被打败了。我不能喝黄酒，我喝白酒，他是喝黄酒的，黄酒没有味道……”

抗战前后(1)

何满子原名孙承勋，1919年生于浙江富阳，祖父孙蓉第当过南昌直隶州州判，大外祖父是前清道员，为杭州巨富，人称“陆半城”，是两浙师范学堂创办人之一。何满子童年多在外祖父家居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何满子随胞姐孙晓梅（革命烈士）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何满子到达延安，几个月后离开，辗转各地从事文化工作。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家学渊远，一直有很好的读书环境。

何满子：我小时候多数住在大外祖父家里，在杭州长大，一直到抗战，正好18岁。我只念了一年初中，一年高中，其余都是在家里读书。我从小喜欢读书，七八岁开始读小说，我妈妈念《西游记》给我听。那时候家里有钱，教我外文的老师，一个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一个教数理化，一个教外国地理历史文学。我的一个老师因为火灾摔断了腿，生活已经无趣，能教学生是很开心的事情。教中国传统四书五经是一个举人，我通读过《二十四史》，15岁之前，前四史已读完了。

南方都市报：你还有几年的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读书?

何满子：我外祖父去世，我就有几年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每天都去。历史、外国文学读得多。我外祖父家在抗战败掉了，房子全部让日本人炸光了。

南方都市报：你姐姐孙晓梅是烈士，她是如何参加抗战的?

何满子：我姐姐跟冼星海的老婆钱韵玲同事，钱韵玲是钱亦石的女儿，同在一个杭州的小学教书。抗战时我姐姐到新四军去，29岁牺牲了。

南方都市报：你1938年到了延安，怎么去的?

何满子：抗战一爆发我就到上海浦东参加钱亦石领导的战地服务团，日本人打到上海，我就跟着逃到武汉，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里，

后来到《大汉晚报》工作，武汉危急，我在沙千里介绍下，到延安去了。到延安要有一个有资格人士介绍，我认识沙千里，沙千里介绍我去了延安。我十五六岁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向往，1938年9月到延安。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看到的延安是什么样的景象?

何满子：觉得很新鲜，满街都是歌声，唱着抗战歌曲。不过我不能适应，书太少了，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翻译的版本。有莫斯科出的几本中文的列宁著作，还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讲课的主要是何干之、李凡夫等人。张闻天经常来讲课，他讲哲学，讲得好。毛泽东也来作报告。他们来讲课都是露天的。陕北公学原来是基督教教堂，有大会堂，不大用，中共中央开会都在那里。年底时，总校搬到分校里去了，成仿吾是校长。第二年5月我就离开了。

南方都市报：同学中有哪些人?

何满子：张春桥跟我同一个队。（大笑）那时候他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没什么特别。

南方都市报：离开之后曾被国民党抓起来了?

何满子：到西安时，这时反共已经开始了。我被抓起来，送到青年招待所，那不是一般招待所，后来改成了青年劳改营，幸亏我碰到一个老师，他是洛阳《阵中日报》的主编，我是作者，他认识我，帮我出来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到了成都。

何满子：在成都《黄埔日报》当副刊编辑。

南方都市报：在那时候认识你太太吴仲华?

何满子：她当时还在念书。

南方都市报：听说当时很多人追她。

何满子：（大笑）给我骗了。（大笑）

南方都市报：她家里也是书香世家?

抗战前后(2)

何满子：她的祖父是有名的，叫吴光耀，搞金石文字，国家图书馆有一个他的专柜。他写过一本《慈禧三大功德记》，歌颂慈禧的。

南方都市报：怎么认识你太太的?

何满子：当时我在当编辑，通过作者的关系认识她。后来我出了事情，国民党要抓我。

南方都市报：出了什么事情?

何满子：我的作者都是“左”倾人士。正好那时“皖南事变”，听说黄源死了，我就写一篇《悼黄源》，因为我认识他。国民党就觉得：怎么国民党的报纸上悼念共产党？要逮捕我，有人通知我危险，当时好在换一个地方就完事了，我赶快走了。我姐姐孙晓梅在新四军，我准备到那里去，经过衡阳，打仗，过不去，我就在衡阳定下来了，在《通俗日报》当编辑部主任。这些事情都巧得不得了！我一到衡阳马上丢了钱，500块钱丢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简直要上吊了似的。一出来碰到陕北公学的同学程嘉哲，他是衡阳人，把我留到家里去，由他的哥哥介绍到《通俗日报》。在衡阳时我常常到图书馆，当时长沙大火以后，所有的图书都搬到衡阳的一个中学，正好我碰到一个熟人，几乎天天去。抗战时很多经历是很奇怪的。在衡阳、桂林这两三年里，我专门搞音乐，读书记笔记。在衡阳、桂林、长沙这一带来来往往。混到1944年，我回到成都。我们结婚了。

南方都市报：先是住她家里去了。

何满子：住在她家里，后来才结婚。结婚之后找不到事情，我就到空军通讯学校的印刷科工作，混饭吃。又出了事情。（笑）毛泽东到四川跟蒋介石谈判，《新民报》发表了他的《沁园春·雪》，好多人和他的词，我给这首词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唱就完了，没想到印刷厂印了几百张，拿到书店去卖了，有些人传，一下子卖光了。就引起人家注意，当时虽然说是国共合作，上面哪里是这么想的？我尽快想

办法调走，避了一下。曾敏之当时在重庆办过一个小报，他曾经写过一条消息。我老是闯祸。

南方都市报：你一直对音乐很感兴趣?

何满子：因为钱韵玲的缘故，她是冼星海的老婆，我跟冼星海接触之后经常谈音乐，我去到延安，他们两夫妻也到延安去了。有一两月在一起，冼星海去世的时候，我写过悼歌，我写的词，谱的曲。以后还写一个冼星海的电影剧本，1955年“胡风事件”被没收了。

南方都市报：你跟广东人很有缘，跟马思聪也熟?

何满子：熟的。马思聪家里很有钱，抗战快胜利时他到贵阳去当艺术馆馆长。马思聪在广东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好朋友叶帆带到我去看他，他说我很懂音乐。其实我哪里懂？马思聪是拉小提琴的，我写了提琴曲小品，请他看看。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跟马思聪通信，我写了冼星海的剧本请他看，因为他们在巴黎时认识。马思聪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指出我的剧本里巴黎哪些街道写错了。我在1955年以后，就没有跟他来往了。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之后，你在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又闯了一次祸?

何满子：（笑）天津《益世报》采访主任孟秋江是有名的记者，想请我去天津《益世报》，我说天津我不去，他就让我在南京当特派员。后来天津《益世报》并入南京《益世晚报》，我当采访部主任。在我晚报上面写了一部小说《西国水神梦》：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混在一起，一天一段，写了一个月。这是游戏文章：有一个老先生，抗战时跑到山里面去，一下雨，这五本书混在一起了，其中的人物就互相来往了，里面写到唐僧追王熙凤，讽刺当时天主教南京区的大主教于斌。他是“政治和尚”，正是《益世报》的老板，他就把我开除了。我第一天离开，第二天就去了《大刚报》。（笑）《大刚报》原来在衡阳办的，后来去了南京，这是陈立夫的报纸，我管你什么报纸，有饭吃就行了。后来

《大刚报》停办了，我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就到了上海，后来就一直在上海了。

“胡风事件”

在上海安定下来后，何满子夫妇有了颇为理想的工作，妻子吴仲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何满子则在朋友贾植芳的力荐下，到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贾植芳多次请何满子去见见胡风，何是“江湖散人”，并没有去。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爆发，自以为和胡风没有一点关系的何满子被捕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跟贾植芳认识的?

何满子：解放的前一年，我们认识是梅林介绍的，梅林曾是抗战文协的秘书，老舍是文协总务处主任，梅林是老舍的大管家。贾植芳在苏州，我在上海当一个书店的总编，他翻译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我出版了这本书。我们俩喜欢喝酒，常在一起。到了1951年，贾植芳在震旦大学当中文系主任，我也到震旦大学教书。我不同意院系调整。当时思想改造，我是反对的。大学是通才教育，清华大学原来是很好的大学，变成工科大学。院系调整时把我派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我不去。我家在上海嘛，我的爱人在电台工作，我就去了上海高中教师训练班。1955年“胡风案”就被抓进去了。

南方都市报：贾植芳让你去看胡风，那时候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他呢?

何满子：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胡风的文章我老早就看，他的文章当然写得好，他的一些意见我也很同意的，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在桂林的时候我是见过胡风的，但是没有来往，通过一两次信。当时他是“诗坛领袖”，他说我的新诗不是诗，是分行的散文，我就从此不写诗了。后来他写信邀请我去谈谈，我心想我又不写诗了，我就不去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有一个外号叫“江湖散人”。

何满子：这个外号是梅林取的。（大笑）他要我参加文协，我不参加，任何协会我都不参加，我连工会都不参加。除了机关单位里面

要吃饭，要拿工资，其他的我都不参加。到现在我也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也不是任何协会的会员。

南方都市报：1955年5月，“胡风集团事件”发生了。

何满子：1955年5月13日是星期五，很不吉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提供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些材料》，我5月17日就被关起来了。我以前觉得我跟胡风没有一点关系，《七月》和《希望》上面我没有写过一个字。上海的贾植芳、耿庸、张中晓，我都是认识的，往来也不是很多，老贾是我的同事，其他人也不大联系。所以我大吃一惊：舒芜怎么这样干？星期五《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东西，星期天，王戎通知我：你要写个检查。我说：我凭什么写个检查？他说：不是我要你写的，是吴强让你写的。吴强是市委文艺处处长，就是《红日》的作者。

我回来以后，那时候我们几家人才有一个电话，16日下午，人家告诉我一个姓吴的打电话，我就知道是吴强。我打回电话过去，吴强不在，我说他要向我讨教什么事情，他自己骑车方便，他来找我。

第二天，5月17日早晨，一家人刚刚起床，我那天没有课，有人敲门进来，我说：“你找谁啊？”“你是何满子吗？”我说：“是啊。”“你被逮捕了。”我说：“凭什么？”他就拿出逮捕证来，市公安局长许建国签署的。带我上了车子，兜来兜去到了一个地方，我一进去，听到耿庸的声音，他要抽烟。我才知道原来怎么回事。

南方都市报：在里面关了多长时间？

何满子：从5月17日到第二年9月28日，我说你们给我结论，没有，说是给我宽大。走遍了全国去查，对我一点毛病也找不出来，他们说：为了你花掉几万块钱，也好。

南方都市报：“二流堂”专案组在查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何满子：（大笑）他们对我说：“花了那么多钱，把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对你是好的。”

出版工作

1956年，何满子获得自由，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在社长李俊民的领导下，出版社汇聚了金性尧、鲲西等一批文化人。何满子后来在《李俊民的人品》一文中回忆：“俊老是经学和小学宿耆黄侃的弟子，又编过报刊和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新旧文化都懂行，在他领导下做事，人人都顺遂愉快。俊老要求把出版社办成大学和研究单位的规模，常常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应该是可以胜任的。”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同仁们的得意之作是出版了陈寅恪的著作。

南方都市报：得到自由以后还能教书吗?

何满子：不让我教书了，第一线不行了，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1956年冬天成立的。社长李俊民是个好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很多同事都是有学问的读书人，鲲西说很怀念那段日子。

何满子：金性尧、鲲西，好多读书人。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等著作是那时候出的吗?

何满子：李俊民原来是写小说的，鲁迅都肯定他的。他很不满意郭沫若。

南方都市报：郭沫若曾说：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何满子：他的意思是新的一批学者瞧不起老的一批学者。李俊民就想办法把陈寅恪的书拿到我们这里来出，通过蒋天枢。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晚年最信任的弟子。

何满子：蒋天枢对陈寅恪讲，这个出版社是可信的。陈寅恪那时候眼睛已经瞎了。

南方都市报：陈先生说过：“盖棺有日，出版无期。”那时候国内没有其他出版社出陈寅恪的书。

何满子：就只有这个出版社敢出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你们理解陈寅恪的价值何在吗?

何满子：陈寅恪本来就很有名，清华四导师之一嘛。那时候全国只有三个出版社出古典的书，另外两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

南方都市报：这套书都有哪些同事编辑?

何满子：鲲西、我，还有另外几个同事合编的。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觉得陈寅恪的东西怎么样?

何满子：当然好了，大师！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印了多少？在学术界有什么反响?

何满子：印了上万册了。实在说，在以前当然有影响的，但是没有这样广泛。后来才有“陈寅恪热”。

“右派”生涯

好景不长，何满子在1957年当上“右派”，一家人发配到宁夏。1964年调回上海，“文革”爆发后，何满子被遣送回乡，一待12年。1978年底，何满子回到上海，已近花甲之年。有一次经过淮海路四明里时，何满子突然想起去看一看赵景深教授。赵景深在楼梯口端详他一下，脱口而出道：“何满子，你还活着！”从这时起，何满子写下大量文章，著作等身。

南方都市报：“反右”的时候你又出事了？

何满子：1957年我又被定为“右派”，罪名是：给“胡风集团”翻案。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没有写文章?

何满子：没有写文章，也没有发表意见，任何意见都不讲。搞知识分子总是要搞的。

南方都市报：1958年离开上海发配到宁夏了，你和太太、两个女儿都去了。

何满子：我在拉车。我爱人原来是上海广播电台的编辑，到离城十几里的小学里去教书。两个孩子还在读书，都一起去宁夏。我待到1961年回到上海来医病了，我关在劳改场里休克过去了，医好了又不得不回去，一直到1964年才调回到上海。上海文教书记石西民亲自督办的，他人很好的，他在《新华日报》当编辑部主任的时候，我写稿子，是他的作者。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编《群众》，我又是《群众》的作者。我在宁夏后来没有办法了，这边不要我了，我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就写信给石西民，我说：中国不要我，我就要跑了，我带地图一张，准备从蒙古出境，假设给哨兵打死了，你有责任。（笑）石西民写信来，叫我赶快回来。本来李俊民让我回古典文学出版社，上面不让，让我去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那里面都是“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徐铸成他们都在那里。

南方都市报：1966年你又出事了。

何满子：这个事情很滑稽的。（笑）当时发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要大家读的。我的书红卫兵一抄家全抄走，包括马恩全集都抄走，我说：“马恩全集怎么可以抄走呢？”他们说：“这上面有你的笔记，有很多反动言论。”我就发牢骚了：“马恩全集都不许看，只能看看ABC吗？”有人马上就报告了，说我讲“毛泽东的书是ABC。”当时我们集体宿舍有3个人，那个报告的人指出了，红卫兵就说：“谁讲的？”这个事情不得了，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我说：“他胡扯，他要我介绍女朋友我没有介绍，他生气，他报复。”（大笑）另外一个人说：“他讲不讲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见。”这样就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遣送我回原籍，一回就12年。

南方都市报：在家乡主要做什么？

何满子：我也不会务农，还不是灌灌水、管管山林，轻微劳动。

南方都市报：家人能在一起吗？

何满子：他们比我早一年被精简了，只好回去了。

南方都市报：还好一家人在一起，而且避开了上海这12年的风云。

何满子：不幸中之大幸。乡下人老实，他也不管你什么皇亲国戚，中国老百姓还是好的。

南方都市报：在乡下没什么书读，你的大女婿王土然给你找到了《资治通鉴》和《苏轼全集》。

何满子：这两套书消磨了一年多，反来复去地看。在这之前什么书都没得看，可以看的书我不看的，什么《金光大道》。王土然那时候还没跟我女儿结婚。

南方都市报：王土然知道你喜欢书，投未来丈人所好，高！（何满子大笑）

何满子：这12年只到上海来两三次。一次是机器坏了，来上海修机器，农民很相信你的，知道你是知识分子。一次是我有病到上海来

开刀。最后一次是1978年底，毛泽东去世了，来上海看看情况，讲好了，马上让我回来，是李俊民让我回来的。

南方都市报：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满子：这几年也在上海上上课，在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挂一个兼职教授的名字，带带研究生。

南方都市报：带研究生是这个书房上课的吗?

何满子：就在这里。

南方都市报：主要教什么课?

何满子：古代小说。我教古代小说是很奇怪的事情，在院系调整的时候，知识分子改造，有两个老先生，一个是周而复的老丈人，他不干了，就没有人教古典文学了。文学院长过来跟我商量：课不能不教啊，明清小说戏曲离不开的。我就搞明清小说戏曲，写了几本关于古典文学的书了。李俊民知道我，这样就到古典文学出版社了。（笑）

南方都市报：写得最多的时期还是1978年底回到上海以后。

何满子：是啊，我的生命从60岁开始。（大笑）我是1919年生的，到1979年正好60岁，之后才写很多书。（起身带记者到书架前介绍自己的著作）我们这辈人的经历，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写100万字的小说。你们幸福啊！你看，我18岁就抗战，到处跑。解放以后以为好了，从1955年起一直到1978年，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1)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特约摄影：林顺利

她致力中国植物的研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她被誉为“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

她有“凉茶专家”和“百草婆婆”之称。

“我每天8时，准到办公室来。如果到了10点钟还不见来，就一定是死在家里了。”在童元方的新著《为彼此的乡愁》中读到胡秀英的这句话，我决定拜访这位近100岁的老太太。

见胡秀英前，在香港听过关于她的种种传说。听过她的名字的，知道她是“百草婆婆”；见过她的形象的，知道她是著名电视节目“杰出华人系列”中唯一入选的女性；和她在一起走过森林的，感慨那是人生中一次难得的经历；而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则骄傲地说：“她是我们的‘校宝’”。

真正见到胡秀英，觉得她就像老祖母一样平易。她也不会说什么富哲理或专业的话，句句都是家常话。在她的办公室里，学生送来的各种小玩艺儿把这里设计得有一种家的感觉。她是把这里当家的。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早上8时她会到这里，工作到下午4时离开。她是基督徒，礼拜天不做事，到教堂做礼拜。

胡秀英讲话中气十足，始终面带微笑，有时讲到一些词语，只记得英文写法，当告知她的中文写法时，她会说：“谢谢！”谈到兴起，她突然问：“想不想看看标本室。”推开办公室旁边的一道门，竟有一个新天地。由她一手创建的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里，存放着全香港最完整的植物标本，这些都是她走遍香港的每一个角落亲手采集来的。随她穿行其中，翻开一个个标本细看，仿佛听她在讲述自己儿女的故事。

胡秀英说自己是运动家，喜欢玩，爬山和打球是强项。问起她的养生之道，她报以一笑：“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放松，做不到的不要

老放在脑子里。”她的生活十分简朴。据说，她在美国家中洗过东西的水要拿去花园浇花，纸张定要填满。而她节省下来的钱，大部分用来帮助别人上学，捐款给学校、慈善机构。她是穷苦人家出身，一直靠奖学金读书，如今看到后辈有机会受益于奖学金，她很快乐。

办公室挂满了后辈为胡秀英祝寿的贺词，从90多岁到100岁，几乎年年都有。在谈话中，胡秀英不止一次说：“我今年105岁了。”而问起她的出生时间，她清楚地记得是1908年：“我是清朝人，经过3个时代。”和她聊天，会感觉她超然于3个时代的变幻，一心一意地埋首于自己研究的领域。亲身在她的办公室坐过，在她的标本室走过，会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敬畏之情。

1908年农历正月元宵，胡秀英生于江苏省北部徐州农村，兄姐中已有3人死于脐风（即破伤风），父亲从没有行人足迹的雪地跑到外面的村镇，买了防脐风的中草药给她服用，使她健康成长。胡秀英4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不识字，但很开通，不让她扎脚。胡秀英在基督教会办的正心女子学校表现出色，取得助学金，1926年到南京入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修化学及物理学学位，后转读生物学，并跟随金陵大学施德蔚教授（Dr.AlbertSteward）学习植物分类学（TaxonomyofHigherPlants）。两年后回乡任体育教师，以报学校助学金之恩。1930年又重返金陵继续学业，1933年正式毕业。

南方都市报：你家里是信奉基督教的，在家乡读的是教会学校?

胡秀英：我在洪泽湖畔出生，我是湖边人，不是山里人。我的家里在农村，我的祖先都不认得字。到我的父亲这一代，我的父亲是农夫，父亲的弟弟读了中学，我家就从我的叔父起头读书。我4岁时，我的父亲推一个土车从乡下送一个小米杆做的床垫到城里给我的叔父，当天夜里得霍乱，活人推着土车进城，死人抬回家。这样，我4岁就没有父亲，跟着妈妈在乡下，我的妈妈又贤惠又能干，全村第一号能干人。我6岁进学校，在乡下，是美国教会学校。我的祖母信教。

南方都市报：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2)

胡秀英：我在基督教小学读书，在家里吃饭、睡觉，不花多少钱。读完4年班，我跟着邻村一家人进城读书，我一个小孩要走50里路，从早上走到下午才到，累得不得了。一到晚上找妈妈，妈妈不在，就哭了，所以我在那一个学校的名誉是“哭的小孩”。哎呀，真苦！找不到妈妈怎么办呢？一直过了两个多礼拜，稍为习惯了一点。妈妈在农村织棉花，不能进城，等棉花收完了以后，才能进城。

南方都市报：当时接受的已经是新式的教育了？

胡秀英：都是新式的教育，已经用英文上课了。后来金陵女大和岭南大学都是用英文上课，没有用中文的。不然我的英文不会这么好，不可能到哈佛大学去念书的。

南方都市报：在中学的时候，你已经对植物学感兴趣吗？

胡秀英：我是乡下人，在中学什么都读的，没有兴趣不兴趣的。到金陵女大我才读生物系，我本来进去是要读物理学，因为中学老师教物理学，我去读以后，生物系的老师教得很有趣，我就换了。老师吸引学生。

南方都市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老师呢？

胡秀英：老师都是外国人，（大笑）因为是教会学校。所以我逼着我说英文，我不说英文我就没有话说了。

南方都市报：课余有什么活动？

胡秀英：那我活动得多。每个礼拜六我都不读书，（笑）到城墙上、山坡上到处走，得走3个钟头，就是不读书。（大笑）所以现在身体还是蛮好。

南方都市报：年轻的时候很喜欢锻炼？

胡秀英：体育场上都有我。打baseball（棒球）我接球，打棍球我是captain（领队），凡是玩的都有我。

1933年大学毕业后，胡秀英本打算回乡下的中学执教，但大学的植物学老师向她推荐当时拥有全国最大标本室的广州岭南大学。在岭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胡秀英师从莫古礼（F.A.McClure），同时担任助教。由于她一直希望能找出是什么中草药，使她没有像3位兄姐一样死于脐风，所以在岭南大学的第一项研究及毕业论文就是《中国之补品》。胡秀英取得硕士学位时，正值抗战，1938年与母亲到四川成都，任华西协和大学生物系讲师（后升为副教授）。在成都教学期间，胡秀英多次带学生上川西雪山采药。有一天，她在重庆九峰山发现一棵小红果，绿叶高3丈的植物，疑是冬青（后证实非冬青）。结果她带着标本到重庆中国科学院标本馆做了3个月研究，并发现南京农学院标本馆所展示的冬青标本，均无订名，于是按冬青权威专著一一鉴定。其后胡秀英写下300篇有关冬青的论文并发表了《成都植物名录》和《成都生草药用植物之研究》，受到哈佛大学E.D.Merrill博士（在美国有“植物分类之父”之称）赞赏。抗战胜利后，胡秀英取得奖学金，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南方都市报：读完金陵女大，你就到广州来岭南大学读书了?

胡秀英：是的。因为读完大学成绩还不错。（笑）他们说你来，有个研究院，可以一边教书一边读书。那就去做助教，读学位，3年才念完。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岭南大学学风非常好?

胡秀英：是的。抗战以前大陆的教会大学是顶呱呱的，读完大学可以直接到美国去。

南方都市报：你本来有没有打算读完就去美国留学的?

胡秀英：我没有想。读完就打仗了，我就逃难了，逃到四川成都，那里有个教会大学需要人教植物学，我刚拿到植物学的硕士学位，正合适。教了8年，在华西协和大学生物系。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3)

南方都市报：在华西协和大学的时候，要不要经常跑警报?

胡秀英：当然。我的房子完全炸完，到朋友家里住3个月。成都有条大河围着城，那炸弹掉到河边的房子上，把房子炸得干干净净。我带着3个学生回家，想介绍给我的母亲，我母亲出来没一会，我在当中，3个学生在后边，炸弹来了，看一看1个学生死在旁边。3个学生死1个，我母亲天保佑，没有受伤。

南方都市报：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吧?

胡秀英：艰苦得很。房子坏了，我自己找个梯子爬上去修，把瓦搬一搬弄好，让它不漏雨。什么都做。我母亲喂鸡生鸡蛋，我们就不必买鸡蛋了。本来100块钱一个月的薪水，慢慢薪水不值钱，买9袋米，我一个人怎么办，请一个包车推到家，什么事都辛苦。香港人不懂那个辛苦。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以后，你是怎么会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

胡秀英：我英文好。（大笑）受英文好的福气，在成都，很多国家的人都集中在这里，有个国际妇女会，他们找我做会长，因为我既懂中文又会说英文，我成了成都国际妇女会的会长。有美国的军队来联合中国打仗，我们妇女会的人就联合起来，请美国的军官到家里来吃一顿饭，明白中国人的习俗，做一种交流。我就很忙，要联合中国的家庭和外国的军官。但是认识的人很多，就认识一个人回国到哈佛大学去，他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我请他把我的成绩表、报名单带到哈佛大学去报名。哎呀，真是神的恩典！整个的奖学金，所以我念哈佛大学没花一个钱。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念了3年，没花一个钱！

胡秀英在哈佛大学女子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致力中国冬青的研究，是当时在美国唯一研究中国冬青的研究员。1949年获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优秀学生奖，从此成为冬青专家，在国际植物学界

有“HollyHu”之称（Holly是冬青的英文名）。毕业后，胡秀英留在美国哈佛大学安诺树木园从事研究工作，包括植物分类、植物地理及植物资源的利用。胡秀英为当时全球仅有的7位从事野外采摘女植物学家之一，每天背着背囊，翻山涉水，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还访问了欧洲、美洲、澳洲、亚洲的大植物标本馆，查看中国植物标本。1957年，胡秀英受太平洋科学研究会的邀请，开始撰写《中华食用植物》，同年获得美国科学成就奖。

南方都市报：在哈佛大学的博士生活很愉快吧?

胡秀英：我年岁也不小了，那时我三十几岁了，我想回中国做点事，所以书念得相当快。在哈佛大学3年拿到一个博士，哈佛大学以前没有这个记录。（笑）

南方都市报：本想念完书回国，后来为什么还留在哈佛大学?

胡秀英：当然想回国，但是那时候回不来。中国的学生在美国，他们不准你回国。念完，哈佛有一个植物园，他们给我一个工作，都是做中国的植物。1900年到1910年，他们到中国采了很多标本。我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叫我做，我只做中国的东西，不做外国东西。

南方都市报：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工作是怎么样的?

胡秀英：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做研究，写几本书，所以忙得很。我的老师看我没有回家，第二天到我的研究室看我，忙得很，做整夜的工作。在哈佛大学工作也不容易。找到工作不比他做得好，他看不起你；比他做得好，他妒忌你。在外国工作还是不容易。

南方都市报：你在哈佛大学一直都是研究中国的植物?

胡秀英：哈佛有很多中国的植物，我只做中国植物。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发现冬青的?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4)

胡秀英：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冬青，我拿给你看一看。（在书柜中取出博士论文）我1948年完成的，1950年成书。冬青这种植物很有用，中国用来做药，做成“三冬茶”，含三种冬青。

南方都市报：你在哈佛大学时交的中国朋友多不多?

胡秀英：不多。没有什么中国朋友。忙得很，哪有交朋友？礼拜天做礼拜。

南方都市报：你跟你先生徐明远是在哈佛大学认识的?

胡秀英：对，我们在哈佛结婚的。他是医生。他留学英国，后来到哈佛医学院。

南方都市报：你有孩子吗?

胡秀英：我没有小孩。我结婚很晚，三十几岁才结婚。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还有什么亲戚?

胡秀英：我有1个哥哥，哥哥有两个儿子，有5个孙子，都在美国。都是到我家里读书，读中学、读大学，读完以后他们就找了工作，做了美国公民。我的家现在是在美国，我也是美国公民。

南方都市报：你在美国生活习惯吗?

胡秀英：美国不是我们中国人住的地方。在美国，家在乡下，家里有3部汽车，两夫妇一人一部汽车，去工作的时候，把汽车开到火车站，放在那里，坐火车去上班，回来到火车站把汽车开回家，忙得很。大家吃了饭，睡觉了，见不到人，所以我不回美国了。美国不是我们养老的人住的地方。

1967年时，香港政局不稳，很多教育界人士离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生物系正值闹教授荒，纽约基督教大学基金总会代表芮陶庵博士夫妇（Dr.AndrewT.Roy）写信力聘胡秀英出任植物学高级讲师，她毫不犹豫便答应下来。1968年，胡秀英正式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任高级讲师，教授普通植物学、植物分类学，并作野外采集考察。

课余踏遍香港山头，采得标本2.4万份，分送北京、哈佛、密苏里及丘园。期间往返哈佛大学6次，鉴定收录了9000种香港标本。胡秀英积极推动中文大学的中药研究与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促成“中药研究中心”的建立，其中“三冬茶”研究计划，用茶内含有的三种冬青科植物对抗传染病感染，突破凉茶传统。

南方都市报：在哈佛大学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怎么会到香港来?

胡秀英：1968年，香港的形势不好，很多老师离开香港到欧洲、美洲去，崇基学院教植物的老师离开了。学生又没有念完，崇基学院的外国教授问我能不能来帮忙，我给我哈佛的上司说谎：“我要去香港。”“你去香港做什么？”“我采标本。”（大笑）香港那时候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到香港采标本，容易，我是中国人，合适。我就到了这里，礼拜一、二、三、四教书，礼拜五、六、七采标本。我采了24000套标本，建设这个标本馆。我没有来，没有这个标本馆，所有的书籍都是我本人的，给了中文大学。这个标本馆就是我的实验室。

南方都市报：来了香港中文大学之后，你在哈佛大学那边还有教职吗?

胡秀英：我采的标本给哈佛。（大笑）我没有离开哈佛，我的办公室仍然在哈佛。

南方都市报：香港每一个有植物的地方你都走过了?

胡秀英：高山、海边、湖边。香港没有我没走过的地方。年轻的时候有力气，运动家。

南方都市报：发明“三冬茶”是怎么回事呢?

胡秀英：因为只有冬青在冬天可以生活，所以大家相信能在寒冷的天气生活的植物就可以治病。我研究用三种冬青做凉茶，把研究的结果做出来，向政府注册，只有从政府拿到执照才能做，所以这“三冬茶”就出名了，这个“三冬茶”的执照卖了100万元，这100万元给崇基学院做奖学金，我心里舒服。（笑）

胡秀英：“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5)

南方都市报：“三冬茶”对人体的作用是什么?

胡秀英：它是凉茶，中国人喜欢喝凉茶，身体健康，是保健的东西。香港人到处都喝啊。你想看看冬青吗?

南方都市报：当然想看看。

胡秀英：（带记者到实验室）所有的香港冬青，我都可以给你看看。这里面的标本凡是绿色封面的都是香港的，红色的都是大陆的，黄色的是世界别的地方的。这是冬青，这个在香港的，冬青绿的，果子红的，好看。

南方都市报：冬青在欧洲是做什么用的?

胡秀英：没有食用的，只有香港把它做茶。外国人圣诞节的圣诞树就是冬青。（笑）美国有从中国运去的冬青，所以美国南部冬青会，年年聚会，请我去演讲。

南方都市报：除了研究冬青之外，你还研究了很多香港的植物。

胡秀英：所有的标本都是我亲手采集的，都是我研究的。研究发明是很小的地方，扩大是很大的地方。整个的标本馆，所有的书籍，大都是我慢慢从哈佛搬过来的。

南方都市报：你写了很多关于香港植物的书。

胡秀英：那多了，你看一看。（走到书架前，取出书）各种不同的论文，差不多200种。这是一个专著，是在哈佛时写的。这是美国的杂志，我是advisor（顾问）。这是植物学的论文。这是云南的一个画家，他在那里画，后来到哈佛，他提供的图，我写的文字。

1975年，胡秀英在香港中文大学荣休之后，除担任哈佛大学荣休高级研究员外，还担任中文大学生物系名誉高级研究员、中文大学中医学院荣誉讲座教授等职。退休后，胡秀英以不支薪的方式继续研究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野外采集、压标本、写作等，行踪遍及世界各地。多次回内地讲学访问，走遍全国东南西北1.6万多里路。她

还特别购买了60万粒西洋参种子，送给黑龙江省植物园，成为中国引种西洋参的开端。1992年，全美冬青学会以“胡秀英”命名一个卓越贡献奖。2001年，美国哈佛大学将胡秀英编著中国植物志所搜集得来的资料文献，制成158844万张卡片，称为HuCard，并发放在互联网上，让全球学者参考。2001年，胡秀英获颁香港特别行政区铜紫荆星奖，为香港电视台“杰出华人系列”中唯一女性。

南方都市报：在香港做研究之外，你在内地的仙湖植物园、华南农业大学等都担任顾问和教学?

胡秀英：仙湖开园我是顾问，现在我老了，我不做了。

南方都市报：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你去得多吗?

胡秀英：我是honorprofessor(荣誉教授)，我在那里教过书。

南方都市报：你在中文大学的学生现在教书的多不多?

胡秀英：以前的学生，现在代替我教书的，毕培曦比我聪明，是全班最聪明的学生。现在是生物系教授，教植物学。

南方都市报：今年春天中文大学给你做一个庆祝活动。

胡秀英：100岁的时候，做一个大的party，所有来的人签名。生日的聚会，有200多人。在图书馆做一个图片的展览，但是图书馆的事，我没有负责。他们把我的书拿去。

南方都市报：你经常在学校组织学生去考察森林吗?

胡秀英：学生有功课，他们的功课不是我决定的，是政府决定的，学生忙得很，所以不能带太多学生出去。一学期出去一次两次差不多了。

南方都市报：你去山里采集植物标本时的习惯是怎样的?

胡秀英：我不带水，吃的带一点，也不带多少，吃饱喝足做一天，要到山上去。工作累了就回来。回来还不能玩，采标本后要压起来，压起来后要封起来，要烘干，订起来放在标本馆里。所以回来还是有很多事，生活不容易啊。不能很多人做这种生活。

南方都市报：现在你去走森林还多吗?

胡秀英：我现在什么都不做，就闷在屋子里做研究。

南方都市报：你在国际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在国际上也是很有影响的。

胡秀英：我去意大利开会。开完会，我的朋友说我们去吃中国餐，我说好。到中国铺子里，点菜的人说：“你姓胡。”“你怎么知道我姓胡？”对方说我在电视看过你，“杰出华人系列”。可以做“杰出华人”也是一个荣誉。

胡秀英：1908年生，江苏徐州人。植物学家，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士，广州岭南大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仍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胡秀英是国际著名的冬青专家，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多篇，曾获全美冬青学会荣誉?。数十年致力研究撰写《中华食用植物》；20世纪70年代促成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建立，成功研制“三冬茶”；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采得香港植物标本2.4万份。曾获美国科学成就奖、香港特别行政区铜紫荆星奖。

黄永年：做学问不赶时髦写文章要补空白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李怀宇

感谢完颜绍元先生提供支持

他是吕思勉的学生，童书业的女婿，沐浴一代学风。

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写文章与陈寅恪商榷，后有书信之交。

他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建树，著作等身。

这篇访谈完成一个月后，2007年1月16日，黄永年先生逝世。

黄永年小传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2007年1月16日逝世。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著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学苑零拾》、《树新义室笔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

2006年12月7日，农历大雪。西安的早晨很冷，进入黄永年先生的家，有书，有微笑，有平常谈，顿觉一室皆春气也。

黄永年先生的声音很微弱，有些谈话需要他的儿子黄寿成在一旁解释才能听清。谈起童年旧年，似有无限向往。对自己的学术成就，则只是轻轻带过。偶尔谈及学界中看不起的人事，言语顿显锋芒。谈得最多的是昔日师友：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启功，这些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尽在追思里。

在黄永年看来，吕思勉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他专门提到自己的新著《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版）的第一篇：《吕思勉先生〈古文观止〉评讲录》。这份看似平常的评讲录，在黄永年心中并不平常。“我记得上第一堂‘国文’课，吕先生就宣布用《古文观止》作教本。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我在十三四岁时就选读过，不久买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有了点文学史的知识，早薄《古文观止》为村塾陋籍。何以吕先生这位大学者忽然要用这种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着吕先生就作解释了，吕先生说：所以用这部书，正是因为它选得坏。”经吕思勉一一评讲，黄永年有茅塞顿开之感，因而在几十年后，还把当年的讲课笔记印出。

对“疑古派”创导者顾颉刚，倒未及细谈，黄永年只说：“顾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学问我很佩服。”而对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黄永年颇不以为然，曾写文章商榷，言谈中又多次提起。

童书业是黄永年的岳父。黄永年的回忆文章里曾有妙笔：“有一次我和他到光华大学宿舍去看吕思勉先生，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来，原来裤带断了，我一看，已烂得无法接，好在不在大马路上，赶快到附近小杂货店买了一条给他换上。不过他对我却还关心，我每次去看他，谈到中午，总是请工友从附近饭馆里买一客茄汁牛肉饭给我当午餐。每次都不变，因为他爱吃茄汁牛肉，以为我一定也爱吃。”黄永年也谈起启功：“启功和童书业是朋友，我称他为世叔，他总是把我当成朋友，所以我请他题什么东西都很方便。”边说边取出启功题签的《文史探微》。

黄永年擅书法，爱刻印。他说：“书法是小时候学起，到了中年，看看清朝人的字，能写几笔文人字，不难看。刻印是小时候刻着玩的，又向郭则豫先生学习，后来出了《黄永年印存》。”黄永年买书有一习惯，不想让服务员在书上盖图章，他笑道：“像在猪肉上盖图章一样。”

晚年，黄永年很少出门，每天在家看闲书，最爱看回忆录。生活上不讲究，近年喜欢吃点北方食品，尤其是面食。我望着家里珍贵的古书问：“这些书以后怎么办？”他淡淡地说：“不考虑。我的儿子也是搞这种东西，他还可以用。”

2007年1月16日，黄永年逝世。

师从学者吕思勉

黄永年童年在常州读书。抗战之初，他在常州地摊上买到吕思勉的著作《经子解题》，大受启发。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做文言文。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有幸听了吕思勉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4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那么多钟点。”到了改革开放之初，黄永年执教陕西师范大学，他感慨：“现在，我也是五十好几的人，已接近当年吕先生给我们讲课时的年龄了，也勉强在大学里带着几位唐史专业研究生。可是扪心自问，在学问上固不如吕先生的万一，在为人处世上也深感吕先生之不易企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

南方都市报：常州百年来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像瞿秋白、赵元任，还有在世的周有光先生。

黄永年：我是江阴人，从小在常州长大。常州比较大，原来是一个府。我家在农村，属于江阴。我老家也可以讲两句，这在我讲课时也讲过。中国过去是封建地主，不是领主，欧洲过去是封建领主，是世袭的，中国的封建地主是经常变的。我出世的时候，祖父已经归天了。据说，他在太平天国时是没有财富的，只有一头牛，他牵着牛逃走，也不参加革命。太平天国平定以后，他变成3000亩的大地主。有种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我祖父是“鲨鱼精”转世，他是经营江边的沙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挖到太平军留下的金银财宝，这个也有可能。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接受的是新式的教育?

黄永年：完全是新式的。和一般的小朋友一样，不读古书的。后来请了一位懂古文的先生，那位先生可能是中过秀才，就开始读《孟子》，对古书感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12岁时抗战爆发了，生活有什么变化?

黄永年：当时是小孩，最恨的就是东洋鬼子，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提到东洋鬼子没有什么仇恨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是“哈日”。

黄永年：我们当时提到东洋鬼子是深仇大恨。沦陷以后，我就逃难。

南方都市报：逃到哪里?

黄永年：逃到家乡农村，在一个江心沙洲。后来到常州城里安定下来。东洋鬼子一占领是杀人放火的，但也不能天天杀人放火，他们自己也搜刮民脂民膏，要吃饭，就平定下来。我就回来念书，当然那些学校都是在东洋鬼子控制之下，但是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说汉奸话。

南方都市报：接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

黄永年：是的。唯一不同的是，加了一门日语，日语老师是中国人，到日本留过学，他要我们知己知彼，反对日本也要了解日本，所以我学日语倒是认认真真学的。学校是东洋鬼子统治的，但是实际上东洋鬼子也管不了。这些老师从现在的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我自己还是用功看书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读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

黄永年：看吕先生的书是在常州城里稍为平静了，当然还是东洋鬼子统治的，那是上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在地摊上买到《经子解题》，5分钱，一看，做学问应该这样做。这以后，就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时候就知道要读些什么书。自己看了不少古书。这些古书不是从头到尾读，但是至少要翻一翻，所以我买的古书都翻过的。上初中自己作文，都是文言文，基本上文言文是过关的。眼光比较开阔。

南方都市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吕思勉先生到常州来教书了。

黄永年：我听到很高兴，因为之前我已看了吕先生的《经子解题》。这样我听了吕先生一年的课，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学的教授有这样的水平。吕先生给我们开课，是“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另外是“国文”、“本国史”。

南方都市报：吕思勉先生上课的风度如何?

黄永年：我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吕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几岁了，但是在课堂上从来不坐着，总是站着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课。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每次写在黑板上的内容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现在我的著作《学苑与书林》中收了我抄写吕先生《古文观止》评讲录的内容。

缘系童书业千金

师从吕思勉后，黄永年在闲谈时向吕思勉请教：“《古史辩》这本书怎样？”原来此前黄永年听说《古史辩》把治水的圣人大禹说成一条虫。不料吕思勉却回答：“此书颇有道理”。并说此书的第七册是他和童书业合编的。黄永年马上向母亲要了钱，寄往上海，托人到开明书店买了一部《古史辩》第七册来细读。后来认识童书业，黄永年执弟子礼，他回忆：“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讲给别人听，虽然有时不择对象，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但我认为总比某些人喜欢在学问上、资料上留一手好得多。”黄永年入读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时常向童书业问学，后来更有缘分：“在解放的前一年，他托当时已在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兄做媒把他的大女儿教宁介绍给我。我和教宁没见过面，但马上表示同意，不过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就在抽斗里翻了半天，翻出一张教宁十二三岁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我寄到常州给我母亲看，我母亲也居然回信满口同意。解放后不久，我们结了婚。从此童先生和我除师生外又加上一层翁婿关系。他没有儿子，所以后来还当我亲儿子看待。（《记童书业先生》）

南方都市报：怎么认识童书业先生的?

黄永年：我一个在念劬中学读书的老同学介绍的，童先生在那儿教过书。我在家里请他吃过饭，这以后，我就称他为老师，他也称我为学生。就在这时候，我把《古史辩》看了。吕先生讲课的时候告诉我，《古史辩》的第七册是他和童先生合编的，我就买来看。现在有些人把“三皇五帝”抬出来，是反动的，拍做官人的马屁，不要脸！我对赶时髦的东西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

南方都市报：后来如何和童书业先生的女儿结婚?

黄永年：这是童先生主动提出来，请另外一个朋友做媒，当时我在上大学三年级，她上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大学毕业以后才结婚。

南方都市报：你读大学经历了一番曲折?

黄永年：本来我不想读大学，大学有些东西不见得高明。原来有人给我介绍工作，很抱歉，只有高中文凭，不行。高中文凭只能当助理员，去助理谁呢？老子不干！后来去读大学，本来想读北大。结果没有去，只读了一段时期的中央大学，伪中大。（笑）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当时没有读北大？

黄永年：当时已经打内战了，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不放心。我想读光华大学，因为吕思勉先生在那里当系主任，光华大学是私立学校，贵得不得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考复旦大学呢？我说复旦算什么。以前我妈妈她们讲到复旦大学是非常鄙视的，因为复旦大学抗战前是私立学校，说它是野鸡大学。光华的学费很贵，我妈妈借了点钱，东拼西凑。人家跟我说，复旦大学现在是国立大学，不收学费。我一听，这还不错。所以读了复旦大学。

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里的老师有蒋天枢先生。

黄永年：他是中文系的。还有陈子展，我的国文考卷是陈子展批的，给了100分。

南方都市报：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

黄永年：是的。他教我“大一国文”，我为什么选他的课呢？因为我高中时看过他写的《全谢山年谱》。

南方都市报：你在年轻时对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看得多吗？

黄永年：我买过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当时读不懂。后来才慢慢领会。陈寅恪先生的书我都看，就是《柳如是别传》没看完，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写过和陈先生商榷的文章。

黄永年：看了之后，有不同意见写文章商榷是很正常的。就是《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他有错误的地方。我写的东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家没有讲过，而那个东西又比较重要的，我填补空白；还有一个是人家讲错的，我加以纠正。如果

是人家讲过的，我再讲一遍，不是等于公共汽车上当扒手吗？这种事情不能做。

南方都市报：陈先生看了文章之后还请他夫人代笔给你回信？

黄永年：头一封他就回了，我一看，是他夫人写的，字比他写得好。按现在做法，他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他回信，还送给我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长恨歌笺证》。

潜心治学读好书(1)

1950年，黄永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1956年随迁校至西安。第二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被划为“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79年起，黄永年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等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而过于在名和利上计较实无多大意义。再是研究历史主要得把史实弄清楚，在此基础上能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自更好，而哗众取宠或卖论求荣者终将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南方都市报：在复旦大学毕业之后，你怎么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教书?

黄永年：是统一分配的，教政治课，当时当然不愿意干，但是没有办法。当时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不服从分配是不行的。教了几年，到了被打成“右派”，就不叫我教了。

南方都市报：1956年从上海到西安来了?

黄永年：到西安来，我是很赞同的，因为对上海也没有什么留恋。上海有什么好？都是玩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我是从来不玩的。我到现在不会跳交际舞，对电影也没有什么兴趣，上海还有什么呢?

南方都市报：但是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买了很多古书?

潜心治学读好书(2)

黄永年：这倒是，当时古书实在便宜。当时我一个月80多块，我记得在学生食堂吃很好的饭，一个月才12块钱。所以可以买书，一本明版书3块5块就可以买。我看着实在便宜，买着玩。当时几块钱的书现在涨到几万块了。当时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如果有的话，现在发大财了。（笑）现在这点书也不卖，留着玩玩吧。

南方都市报：后来这些在上海买的书都搬到西安来了吗?

黄永年：都搬来了。打成“右派”以后卖掉一些。一些自己留着。

南方都市报：这些书对你后来研究有没有影响?

黄永年：没有关系，买这些是玩的。

南方都市报：1956年搬到西安，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

黄永年：当时有一些学生、教师闹着要回去了。我是不主张回上海的，明明是“左”派，最后把我打成“右派”，当时没有道理好讲的。

南方都市报：打成“右派”以后做什么?

黄永年：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他们说，老黄不是坏人，是好人。前前后后劳动了4年，先是在农村改造了两年，回来以后在学校当工人，干了两年。后来放到图书馆。

南方都市报：劳动改造那几年能看书吗?

黄永年：可以看书，自己偷偷摸摸看。

南方都市报：回来以后，到图书馆里干什么?

黄永年：就是一般的工作，在图书馆里也没有什么书可以看。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以后到陕西师范大学开设了那么多方向的课程，这些学问从何而来?

黄永年：学问是自己弄的，一个是靠吕思勉先生的引导，第二是靠自学。我在图书馆工作到改革开放，从西安交通大学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当时西安交通大学还不放呢。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以后，史念海先生和我合招唐史研究生。

南方都市报：你在学术研究上的重点是什么？

黄永年：我有几个东西可以成为代表作的：《文史探微》、《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学苑零拾》。重点是研究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因为人家研究有很多错误。另外有一点是版本目录，这个完全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完全是泡书店泡出来的。懂线装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买书的，一种是卖书的。卖书的如果不懂，不到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了。买书的，太多钱不行，没有钱也不行，一定要稍微有一点钱，我就是这种人。

“败坏”书香门第，带出“卖艺人家”

黄宗江：“败坏”书香门第，带出“卖艺人家”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他就读南开中学和燕京大学，沐浴自由学风。

他卖艺江湖，写戏军中，见证时代风云。

他和妹妹黄宗英、弟弟黄宗洛皆为表演艺术家，人称“卖艺人家”。

黄宗江小传

黄宗江，1921年生，原籍浙江瑞安，生长于北京。曾就读南开中学、燕京大学西语系，均未能毕业。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上海、重庆为职业话剧演员。4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写剧为主，并及散文，著有戏剧戏曲作品选《舞台集》、电影剧本选《单枪匹马集》、《卖艺人家》等。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弟弟黄宗洛皆为表演艺术家，人称“卖艺人家”。

春天在上海的华东医院采访黄宗英，谈得愉快。“你有没有到北京我哥哥家里去过？”黄宗英说，“现在我哥哥总说：‘我妹妹15岁，我19岁，兄妹卖艺江湖。’我说：‘大哥，我16岁才出去演戏的。’他说：‘那不可能，你16岁我就不可能是19岁。’我说：‘大哥啊，我15岁你可能是19岁，我16岁你也可能是19岁。’他说：‘这个算术题我做不懂了。’我说：‘我反正是1941年演戏，我是1925年生的，这是不可更改的。’他说：‘你15岁我19岁，这是不可更改的。’于是现在两个版本，我自个儿写就16岁，他写我就写15岁。”

居然有这么逗的一对兄妹。临行时，黄宗英送了一本《卖艺人家》。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三人文图并茂，煞是好看。黄宗江的题记说：“我家祖上三代翰林，晚清清流。父亲于清末留日学电机，回国考了个洋翰林。至我，败坏书香门第，下海从事剧影，且影响弟妹，成了‘卖艺人家’。”从此想见见这位败坏书香门第的江湖人物。

到了夏天才给黄宗江家里打电话。“你有没有看我新出的《我的坦白书》？”黄宗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豪爽地定下采访时间。几天后的清早，当我们来到八一电影厂，黄宗江让保姆到大门口接我们进厂。一进门，黄宗江谈起罗孚先生因《我的坦白书》一书在香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马上找出来让我们看。

当摄影记者准备拍照时，黄宗江取出新近拍的一套艺术照，和摄影记者讨论其中的拍摄水平。谈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当提到黄宗江

的老朋友时，他总会起身在书堆里找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当他到里屋找资料时，摄影记者悄悄说：“再提起他的老朋友，怕一个早上都在找东西了。”我笑道：“没关系，这样也好玩。”

又谈了一会儿，黄宗江主动提起老朋友黄裳：“过几天我要到上海参加黄裳的研讨会。”趁着这个机会，我向他求证钱钟书赠给黄裳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的事，黄宗江一本正经地说：“‘黄裳’这个名字本来是我的，我这次到上海要澄清这件事。”——后来毛尖在文章《老头儿开会》中记上海黄裳研讨会所见：“黄宗江先生开门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在座还有比我更老的老头，然后，忙不迭地抖料，当年容鼎昌跟我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他帮我起名‘黄裳’，可我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华丽，觉得还是父亲给的名字好，就没用。没想到，容鼎昌马上将‘黄裳’收作自己的笔名，一用60年。本来，我猜黄宗江先生的意思是想一次性终结‘黄裳艳说’，可是，比他更老的老头、还有4个月就90岁的谢蔚明先生才不管，抢过话头，‘黄裳’分明是‘黄宗英的衣裳’，怎么成了你黄宗江的衣裳？我们台下坐的，多是荤人，也都愿意相信那是黄裳一片冰心在笔名，再说了，钱钟书赠送的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当事人黄裳也没反对啊。”

黄宗江说起最近有哪些年轻人到他家里吃过饭，语气中不无寂寞地说：“我的老朋友都是无车阶级，跑不动，很少来往。”当我提起找不到沙博理的联系电话时，他马上到里屋找出电话本：“我给沙博理打一个电话。”打了几个电话都找不到沙博理后，接下来的谈话中他神情若有所失。几天后，我在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那里得到沙博理家的电话。

“败坏门风”学戏剧

1921年，黄宗江生于北京。黄父黄曾铭是浙江温州瑞安人，清末留日学电机，归国获洋翰林衔，民国时任电话局工程师，兼工业大学教授。1934年，父亲伤寒病故于青岛，黄宗江随母亲投亲北返。1935年，黄宗江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教师中有张中行和李尧林，同学中有黄裳和周汝昌。

南方都市报：你的父亲是工程师，清末留日，为什么家里后来成了“卖艺人家”?

黄宗江：这是败坏门风了。（大笑）我们家是三代翰林，我曾祖父、祖父都属于清朝的清流。我父亲是清末留日的，回来还有最后的一次科考，考洋翰林。我的姐姐嫁给林家，是洋状元之家。过去我以为洋状元、洋翰林是小说里的，后来知道是真事，他们最后一科考了洋翰林。我父亲就在北京电话局当总工程师。可是，我们家是高度民主自由的。我父亲没有说过一个字“自由”、“民主”，可是我们家风如此。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黄宗江：小时候没挨过打，不但没挨过打，也没挨过骂，也没挨过说。我13岁，父亲去世了。我父亲的朋友说：“老大，以后好好读书。”我说：“这个人怎么骂人哪？”我们家连“好好读书”这句话都没有。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你们兄妹几人后来都走上戏剧影视的道路?

黄宗江：那是因为我带头，我喜欢演戏，黄宗英、黄宗洛就跟上来了，没有什么系统的教导。我在北京，父亲就带我看京戏。我父亲很开通的，说：“老大，你这么喜欢京戏，送你去学戏吧。”我嗓子不行，我幸亏没有到科班，到科班唱不出来。我小时候学京戏很有根底。当年曹禺的《雷雨》出来了，对我们这一代影响很大。我就在学校里演戏，当女演员。“文革”后，重庆举办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活

动，秦怡、白杨和我都去了。重庆有一个南开中学，请我去演讲，因为我是南开中学毕业的。校长就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那时候，开头没有男女合演，我们都演大戏，周恩来演得最多了，曹禺演大戏，我也演大戏。我在南开中学时就接近戏剧了。后来上燕京大学也演戏。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在北京长大，后来怎么到南开中学去读书了？

黄宗江：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大姐的公公就是那个洋状元给我们家寄钱，因为温州人“十里一表”，都是表亲。我母亲就带了我们到天津，我上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比南开大学有名——周恩来题词“我是爱南开的”，南开大学也用了，南开中学就说：“这个题词是我们的。”

南方都市报：黄裳、周汝昌都是你在南开中学的同学。

黄宗江：我在南开中学时，黄裳跟周汝昌很好。我不跟他们一组，我跟周一良的弟弟周杲良——后来在美国很有名的神经学教授——是一个组。那时候我跟黄裳不熟，后来到上海才熟。现在我跟黄裳还是常有联系的。周汝昌写文章有点学霸的味道，他写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在吹捧自己，所以讨厌。我跟他在学校里来往不多。

南方都市报：当年你的老师有张中行先生。

黄宗江：张中行没有教过黄裳和周汝昌，教过我。那时候张中行从北京大学刚毕业，就到南开中学去教书。他完全是北京大学的做派，不穿西服，穿中服、布鞋。一上来，拿了点名册他就不高兴：“我们北大根本不点名的。”杨沫讲，张中行受胡适影响。其实，张中行在文风上受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张中行倒没有宣传过胡适，对袁中郎、周作人是很佩服的。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有杨沫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还以为是谣言呢。他跟杨沫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张中行教书时，我当时已经自由命题了，张中行在班上就说我的文章好：“当代文学家不过如此。”（笑）我那时候十四五岁吧。后来我一直没有见到张中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一个顾随的纪念会，我和张中行又

碰上了。张中行写了一篇文章谈黄宗江的“卖艺人家”。他完全是中国的旧文人，他有一点好处，始终就没有说过杨沫一句坏话，就说：“她是革命的。”他当然跟杨沫道不同。这种是非现在都很难说了。

南方都市报：南开中学的老师还有巴金的哥哥李尧林。

黄宗江：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自由的作风不下于北大，他上课也不屑于点名。我的老师给我的教诲不是哪一篇、哪一页、哪一行，而是潜移默化的。南开中学整个是很民主自由的。最近得了500万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叶笃正也是南开中学毕业的，他说：“我说老实话，旧社会我们的教育比现在好。”当然学生运动的时候，校方都要出来稳定一下，基本上还是同情的。

大学生涯以爱为主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飞机炸毁了南开中学，黄宗江到英租界耀华中学念了一年下午上课的特班，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黄宗江回忆：“自己在校园的生活或可以说是演剧为主，读书为辅，更准确地说，以爱情为主。”失恋后，燕京大学三年级的黄宗江离开校园，到上海演剧。

南方都市报：抗战期间你怎么考的燕京大学?

黄宗江：“七七事变”以后，学校被炸了，我就到耀华特班上了一年，考大学，考上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到了重庆，既见了蒋介石，又见了周恩来，都拜托他们，在沦陷区开大学。原来燕京大学就招200人，1938年招了700人，我们当时只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可以考，我17岁就上了燕京大学。

南方都市报：在燕京大学的校园生活是怎么样的?

黄宗江：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基本上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我的旁边就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我什么也不是，我是醉生梦死。后来我一个女朋友要为别人自杀，我就去了上海演戏了。燕京大学念了第3年就走了，回来念第9年大学，也没毕业。

南方都市报：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你跟司徒雷登接触过吗?

黄宗江：接触过。司徒雷登跟学生很接近的。当时我游泳是横渡昆明湖冠军，他一见我就要提：“怎么样，最近游泳没有啊？”当时有人说他是“老狐狸”。其实他是爱护学生的。后来我要走了，我就去找文学院院长，我说：“我有抗日问题，我要休学。”他说：“你等等，我研究一下。”他就报告司徒雷登了，司徒雷登下午就找我。当时日本人占领北京了，司徒雷登跟日本人是不合作的。司徒雷登跟我说：“你不离开校园，我保证你安全。”那时候日本人不敢进学校。而我根本就没有抗日问题，我胡诌的：“我非走不可。”等1946年我参加美国海军回

来时，校长已经是陆志韦，司徒雷登当美国大使了。陆志韦是张东荪的学生，当然是靠拢共产党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南开中学演戏，在燕京大学也演戏?

黄宗江：南开中学有戏剧传统，燕京大学是我们搞起来的，我们南开中学来的同学搞起剧社。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我演《雷雨》，这是学生活动。

南方都市报：孙道临跟你是燕京大学的校友，你是西语系，他是哲学系?

黄宗江：孙道临是学哲学的，孙道临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孙道临长得很帅，是我拉他演戏的，他有一篇文章说：“假如没有黄宗江，我根本不会演戏。”孙道临现在已经有一点脑萎缩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西语系主要读什么?

黄宗江：主要读英文、法文。我已发现不止一个人了，为什么读西语系？杭州有一个徐朔方，听说已经老年痴呆了，温州有一个唐湜，九叶派诗人，都读西语系，因为觉得中文可以自修。我们在上中学时《诗经》、楚辞都念过了，觉得不用上课，但是西语我们需要上课，我们上西语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搞中文。我当时已经对写作感兴趣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感觉燕京大学的学术风气怎么样?

黄宗江：燕京大学基本上是洋人多，还是民主自由，幸亏有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绝对是好人。吴兴华跟我同班，后来打成“右派”，“文革”被迫害致死。

南方都市报：燕京大学的生活对你影响大不大?

黄宗江：民主自由的空气很浓，爱国的空气很浓，这些都是潜移默化。南开中学和燕京大学都是这样的。

参加抗日剧团

1940年冬，黄宗江离校到上海参加丁玲、黄佐临等领导的抗日剧团。黄宗江回忆：“我这充满周冲型幻想的十九岁少年，憧憬江湖、海洋，憧憬广阔的世界，却被这世界的广阔吓倒。不久，我就投奔上海剧艺社，那显然是个左翼抗日团体，能隐约其实也够明显地感到地下党的领导。”不久石挥也参加了剧艺社。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也来了，起初管管服装，不久因演员生病，她被拖上台，演了《蜕变》中的“小的”，从此当上演员。黄佐临让这3个年轻的流浪艺人占据了他家楼下的客厅和饭厅。

南方都市报：你们兄妹初到上海卖艺江湖，穷得叮当响?

黄宗江：最后也不阔。（笑）那时候演电影很阔。

南方都市报：当时有一段时间住在黄佐临先生的家里?

黄宗江：我们演戏，就认识黄佐临，他是导演。那时候很不容易，你想，咱们现在年纪大了，招几个年轻人住在家里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石挥、宗英3个人晚上演完戏回到黄佐临家里，饿了就打开冰箱，吃完了各自倒在床上。我和宗英睡在里间靠近厨房冰箱的饭厅里。忽然听到外间客厅石挥在喊：“宗江，咱们忘记关冰箱里的电灯了吧？”我们3个人连忙起来，打开冰箱，果然是亮着的，却找不到关灯的电门。关了又开，开了又关，冰箱里总是亮着。我们折腾了大半夜，只好回去睡了，这一觉睡得不踏实，老是想着冰箱里的电灯没有关。

南方都市报：黄佐临先生原来是读经济的，后来搞戏剧?

黄宗江：对，读商科的。他热爱戏剧，为人是真而又真。听说“文革”时斗黄佐临，人家问他：“刘少奇请你吃过饭，你是怎么想的？要说真话！”他回答：“我感到很光荣！”结果可想而知。

南方都市报：你和石挥在黄临佐先生那里受益良多?

黄宗江：我曾在别人面前戏称，石挥和我是“佐临门下登堂入室两大弟子”。太平洋战争之后一年，日本人统治的电影公司找我主演电影《秋海棠》，当时石挥主演话剧《秋海棠》红极一时，我放弃了和他一较高低的机会，从地下党那里拿到旅费，到了重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上海戏剧界的抗日情绪很高?

黄宗江：太平洋战争以后，租界里照样演《岳飞》、《文天祥》。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一样，就觉得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是资本主义所不能实现的，觉得共产党能实现。我们所以靠着共产党，一个是抗日，一个是共产党民主、自由。那时候后方也很腐败。那时候的腐败是意内的腐败，现在的腐败是意外的腐败。

离而未休于军中

1942年冬，黄宗江赴重庆参加夏衍、张骏祥等领导的剧团。1944年秋，湘桂失陷，黄宗江忧愤国事，又遭失恋，巧逢交通大学学生近百人参加了千名老兵组成的“中国赴美参战海军”，黄宗江加入后去美国受训。在迈阿密与关塔那摩学习了基本海事，又到过古巴、墨西哥、巴拿马等地。1946年夏返抵南京下关，读报见闻一多被刺，因怕被提为军官，乃称患肺病，离开海军到北平复校的燕京大学读第9年大学。数月后，黄宗江患病，卧床两年，还是没有在燕京大学毕业。他回忆：“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从病床上起来，不久就参加了憧憬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也可以说是我一生最后一次有所奔向的出走吧。”其后，黄宗江在军中从事写作，参加了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战争，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离而未休于军中”。

南方都市报：1949年怎么想去参军?

黄宗江：那时候参军最先进，我早就靠拢共产党。当时我因为肺病躺了两年，我刚起床。在我们那个年代，参军是最革命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从1949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部队?

黄宗江：没有离开部队，不能出走了。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出走，现在出走，就叛国了。（笑）也离不开了，没有必要离开了。

南方都市报：和你的许多老朋友一样，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都很坎坷了?

黄宗江：黄苗子、丁聪这些人在白区的时候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可是都被整得一塌糊涂，我幸亏在军队里，跟他们牵连不多，否则我都会卷入疑案。他们都比我大嘛。我要是没参军，在地方上，跟他们交往一定比现在还多。“二流堂”像我这种人，只能算外围人物。“文革”的时候把我打成“30年代反动文人”，我说：打成“30年代反动小孩”还可以。历次政治运动我都经历了，太多事了。没事，老百姓谁不想过太平日子。

南方都市报：你在军中当了几十年专业电影编剧，原来演戏，后来怎么会写剧本?

黄宗江：演员是天才的事业，我不是天才。我很早就觉得我将来要写剧本。参加解放军之前，我也写过剧本，不过得到最多赞誉的是解放后我写的第一个剧本《柳堡的故事》。编来编去，也就成了终身的编剧了。

南方都市报：1986～1987年你到美国讲学，是用英文讲的吗?

黄宗江：我以为我已经把英文忘光了。因为语言跟骑自行车、游泳不一样，骑自行车、游泳不容易忘记。我居然还能讲，但是我讲的是中国戏曲、中国电影。说明在中学也好，大学也好，我的英文还是用功的。现在不行，我见到外国人，英文会好一些，见到中国人我就说不出来了。那次到美国给我感触很深。美国可以反政府，不能不爱国。我们谁都想着过太平日子，没想反政府。美国人对中国的无知，超过中国人对美国的无知。世界越来越小，不能强调文化冲突，文化会慢慢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要保持一个国家民族的个性。